



# 第一章、導論

## 一、問題源起與研究動機

筆者為臺中縣清水人，因此一單純緣故，原先只想對清代牛罵社（主要分佈在今清水鎮境內）之歷史變遷與漢人拓墾作一探討，但是當初步去翻查、收集相關文獻史料與契約文書後，開始注意到牛罵社與沙轆社間似乎有許多關聯性，例如從契約文書中發現兩社有些地目是相鄰的，很難去劃分清楚。<sup>1</sup>另外，漢人的拓墾開展似乎也不會依循著番社的界限而有所限制，例如在牛罵社境內的漢人墾號也會將其勢力拓展到沙轆社。<sup>2</sup>而再進一步查閱清代地方志書中的記載，發現沙轆、牛罵二社曾合稱為「沙轆牛罵社」，而番社餉亦是合併徵收。<sup>3</sup>另在乾隆 53 年(1788 年)實行的屯番制，牛罵與沙轆社也一同編入阿里史小屯。<sup>4</sup>

上述種種現象，讓筆者開始思考兩社之間似乎有某種聯結存在，似乎關係密切？也讓筆者思考到，獨以牛罵社做分析，恐有不足之處，似乎尚須考慮到被劃歸同一語族的其他三社——沙轆、水裡、大肚。或許社群之間的土地界限或人際互動不是那麼分明，尤其在地緣接近的情況下，是否有某種社群的聯結關係存在？互動形式為何？以及同一語族內部互動關係是否有別？是否在同一語族或說同一地域內部存在有內部的差異性，而這樣的差異性為何呢？

---

<sup>1</sup> 對於牛罵與沙轆二社社地範圍的界定與劃分，在下一章中將做探討，此不先贅述。

<sup>2</sup> 例如清水地區同發號家族在清代所經營收購的土地主要在牛罵社地域，但部分也包括了沙轆社地域。參閱楊玉姿，〈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發（1760-1890）〉，《高雄師院學報》14 期(1986)，頁 71-90。

<sup>3</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1960），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38、卷五賦役志，陸餉，頁 135。

<sup>4</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1963），頁 1045。

## 二、研究主題的成型

近年來的清代平埔歷史研究中，研究者已漸不採慣用之「語族」分類，而以單一「社群」為分析單位。研究者認為「平埔族群現行的分類系統與原在歷史文獻中特定時空下的人群分類在瞭解上是有距離的」；<sup>5</sup>換言之，還原到當時歷史時空脈落「社」之稱呼，並以其做分析單位是較適當的。這也是近年來平埔歷史研究之重要趨勢之一，研究者以單一社群做歷史分析，或是探討某一區域內的族群、社群歷史變遷與各社群間的互動整合關係。

透過上述研究趨勢的啟發，讓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區域逐漸成型，筆者開始將研究對象擴大到拍瀑拉族（Papora）<sup>6</sup>四主要社群：牛罵、沙轆、水裡、大肚，將此一拍瀑拉族四社群生活之地域空間合稱為一「拍瀑拉地域」，其所對應的空間即今大肚臺地及以西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兩地理區。<sup>7</sup>雖無論就內部地形還是語族劃分來看，此一地域空間——拍瀑拉地域——都顯現出相當的均質性，<sup>8</sup>但本研究卻試圖探究內部可能存在的差異性，而這也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換言之，筆者試圖藉由拍瀑拉社群地域的研究，來究明臺灣內部歷史發展與區域發展的差異性、雜異性，並非一體同步的現象。<sup>9</sup>而地域內部的差異性是否顯現在各社群

<sup>5</sup> 劉益昌、潘英海，序：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無頁數。

<sup>6</sup> 此一語族分類，始於日據時期學者伊能嘉矩。參閱伊能嘉矩，《臺灣番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sup>7</sup> 此區域範圍主要包括今臺中縣清水鎮、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與大肚鄉五鄉鎮。

<sup>8</sup> 人文地理學中對均質區（formal region）的定義為：一區域顯現出某種程度的同質性、一體性或特徵；其界定標準如地質、氣候、植被、人口密度、土地利用等等（原文如下：A region showing a degree of uniformity with respect to any one of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or criteria; e.g. geology, climate, veget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land use, etc.）。由此標準來看，拍瀑拉地域是一個在地形上顯現出均質性的自然地理區。參閱 John Small and Michael Witherick, *A Modern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5). pp. 94。

<sup>9</sup> 筆者區域內部差異的想法，甚受施添福的啟發與影響，他對竹塹地區土牛溝和區域發展的研究中，最後即認為「在臺灣歷史地理的研究上，如果竹塹地區都不是一個同質的研究單位，那麼，

彼此間的互動整合上？漢人在進入拍瀑拉地域拓墾，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社土地流失現象，是否也顯現了各社群地域空間的不同呢？

### 三、相關研究的回顧

#### （一）清代平埔族「區域」與「社群」研究的討論

近年來歷史學者清代平埔族的相關研究，漸不採以族群的概念來討論，亦即研究者跳脫慣用「語族」、「族群」之分類框架，回歸歷史文獻中以社群為單位之稱呼。另外，歷史學者亦開始援引地理學中空間概念與區域分析的觀點，<sup>10</sup>研究

---

就更沒有理由將臺灣視為一同一單元了」。參閱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卷4期（1990），頁61。

<sup>10</sup> 將地理學研究方法與觀點融入到歷史之研究中，為歷史地理學之研究領域。而傳統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是以「環境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與「區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等三項為分析主軸。目前國內歷史地理學之研究首推施添福，他對區域的界定方式為：強調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理與歷史條件下的交互作用，會賦予各個不同地區相當的獨特性，而要去界定一個地理區的範圍，需探究人群在地域上長期而多變的互動關係。他在對岸裡地域的研究中即認為地理區不是一片不證自明的已知空間，也不是學者為了研究方便而切割出來的便利空間，而是需要經過歷史發展過程的闡釋才決定其空間範圍，而岸裡地域便是由眾多族群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建立起來一個跨越自然地理空間，且具有內部關聯性的地理區。筆者認為施添福對岸裡地域的界定方式類似人文地理學中所談之功能區(functional region)，功能區定義為：區域的認定是藉由各組織、部門間的聯結統合，或是互相依存(原文如下：A region distinguished by its unity of organization or the interdependence of its parts)亦即強調的是各組織部門間的互動往來與互補、互賴性。另外，施添福對族群、歷史、空間三者的注重亦類似 Edward Soja 所說之三元辯證性(trialectic)，即為在空間形塑過程(spatialization)中社會性(sociality)、歷史性(historicity)與空間性(spatiality)等三者的互為影響與辯證關係，彼此間的關係是互相決定與對立整合(mutual determination and oppositional unity)。Soja 對空間性的強調，意在批判歷史主義(historicism)長久以來偏重歷史性與社會性的傾向，而犧牲忽視了空間性。參閱 Kären Wigen, *The Making of Japanese Periphery, 1750-1920*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18; 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為例〉，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

某一地域空間內平埔族群、社群的歷史文化變遷。「區域研究」、「社群研究」可說為近年來清代平埔歷史研究之重要趨勢。以下筆者將選取數篇以清代平埔族社群與區域研究為主題的文章做討論，雖不免有所疏漏，不能概括所有之研究面向，然希望透過以下數篇文章之討論，俾能瞭解近年清代平埔族社群與區域研究之研究面向與成果。

詹素娟對北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中，發現就地域或文化傾向而言，馬賽、雷朗／凱達格蘭、龜崙三群人存在某些更次級的區域性地緣團體關係，而可以區別出更多個社群，而這些「地域社群」的邊界，可能才是社群內人們認同的範圍，與社經關係運作的有效空間；此一邊界，且與婚姻圈、土地所有範圍有關係。<sup>11</sup>詹素娟在馬賽三社的研究中，則進一步對上述「地域社群」之概念做檢驗，指出馬賽三社之內部關係為：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因地緣接近，較有社會、經濟或人際的互動關係，其形式可能為通婚、土地買賣或遷居等。而不具地緣關係的毛少翁社，卻在清廷通事／土目的編組下，與金包里社、大雞籠社重新整合成一可以有效運作的團體，表現在社會事務、經濟關係上。<sup>12</sup>或許詹素娟對「地域社群」概念之釐清仍未很明確，尚需透過更多經驗證據的支持，然我們可看出，基本上她強調地域內社群之互動關係，其互動生成之因一為地緣相近，另一為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之運作整合。似乎詹素娟意圖在社群分析的框架外，找出一新的分析視角，來對社群之整合與互動做分析；換言之，她認為社群的界線有可能不是那麼分明，社群內人們認同的範圍是有可能跨越此一界線，透過社經因素的運

---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頁 38-71；John Small and Michael Witherick, *A Modern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pp. 98；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後現代地理學和歷史主義批判 (Postmodern Geographies and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ism)，殷寶寧、王志弘、黃麗玲、夏鑄九合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 期(1995)，頁 1-29。

<sup>11</sup> 詹素娟，地域與社群：大臺北地區原住民族的多群性，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合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 年 5 月 1-3 日。

<sup>12</sup> 詹素娟，地域社群的概念與檢驗：以金包里社為例，發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0 月 14-15 日。

作將各社群整合成一「地域社群」。<sup>13</sup>

張素玢對南崁地區平埔族的研究，指出交通路線對區域發展的重要性，海上交通為商業之路，南北縱向交通為漢人拓墾之路，域內交通，即南崁溪流域聯結而成的水系網絡則牽引出坑仔、南崁、龜崙社彼此間的族群互動與婚姻圈。<sup>14</sup>亦即張素玢以交通網絡為切入點，觀察其對區域發展與社群互動整合之影響；與上述「地域社群」的概念相似，同樣關注區域內部社群之整合與互動。張素玢另對彰化地區平埔社群東螺社與眉裡社的研究中，透過文獻、契書重新考定了兩社的社址與社域範圍，並以水文的穩定性為基礎，將彰化縣區分為三地理區：穩地區、次穩定區、不穩定區，來解釋平埔社群遷移的原因。她認為彰化地區平埔社群的遷移原因，與社民所處的自然環境因素，即水文的變化有密切關係。<sup>15</sup>張素玢之研究可視為歷史地理學中環境分析法（environmental analysis 或說人地關係[human-land interactions]）之體現。

梁志輝對雲林地區平埔社群的研究，也同樣將自然環境的因素列入考量，他區分雲林地區的平埔族群為斗六丘陵地域社群與濁水溪沖積扇地域社群，探討社群在不同地理環境表現出不同生活文化，此表現在房屋的形式、土地所有權的不同上。<sup>16</sup>鍾幼蘭重新思考 Hoanya（洪雅族）之族群分類研究中，以濁水溪沖積扇及其周邊平原區為一區域研究單位，並將沖積扇內之社群視為一大的「族群互動圈」，她認為或許可再細分出小的族群互動圈。<sup>17</sup>鍾幼蘭文中雖未明白闡示族群

<sup>13</sup> 詹素娟「地域社群」的概念及村落間互動形式的分析對本文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性，讓筆者思考到同樣地緣相近的牛罵社與沙轆社間是否存在互動關係？而如果有，是以何種形式存在呢？

<sup>14</sup> 張素玢，南崁地區的平埔族，《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61-96。

<sup>15</sup> 張素玢，平埔社群空間地圖的重構與解釋：以東螺社與眉裡社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辦「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0 月 23-25。

<sup>16</sup> 梁志輝，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群討論，《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41-162。

<sup>17</sup> 鍾幼蘭，平埔研究中的「族群分類」問題：再議 Hoanya(洪雅族)之適宜性，《臺灣開發史論

互動圈的概念，然將此說法對照上述詹素娟、張素玢兩人的研究，我們發現都有相近之關注點：分析在一區域內之社群互動整合關係。另外，鍾幼蘭對是否可再細分出小的族群互動圈的提問，也與詹素娟前述所謂次級的區域性地緣團體的概念相似。另洪麗完在「岸裡大社地域」的研究中，同樣也關注在內部的社群關係，以之為切入點，探討該地域的社群關係網絡與村際互動，而其互動形式有婚姻關係、土地買賣及遷居活動。<sup>18</sup>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項重點：

- (1) 以區域或社群為一分析單位，對區域的界定一般是以人群生活之自然環境做劃分，例如水文、地形等因素。
- (2) 注意到自然環境因素與地理位置（如地緣性）對社群、人群互動與區域發展的影響。
- (3) 注意到區域內社群間的整合與互動，社群之運作整合有可能為自然環境因素與地理位置，然更重要的是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的運作將各社群整合成一互動群體，即所謂「地域社群」或說「族群互動圈」。

本研究中，基於上述三點之觀察，也將試圖瞭解拍瀑拉地域內之社群互動整合關係。拍瀑拉社群之生活空間東至大肚臺地，西濱海，南抵大肚溪，北界大甲溪，四至相當分明且形勢方整。而在此一地域空間內，筆者基本上認為內部社群間的互動可能會呈現差異性，是否可再區分不同之社群互動群體？亦即牛罵、沙轆兩社間的互動較強，水裡與大肚社為另一互動群體？牛罵、沙轆兩社的互動關係已如前述，那水裡與大肚社的互動關係為何？由番社餉的徵收來看，兩社是劃分在同一稅收單位，<sup>19</sup>另外在契約文書中，也可見其同屬一通事掌管治理；<sup>20</sup>此

---

文集》(臺北：國史館，1997)，頁 137-166。

<sup>18</sup> 洪麗完，〈地域、社群與村際關係網絡：以大社庄為中心之考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辦「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10月23-25。

<sup>19</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1962)，卷五賦役志，餉稅，頁98。

顯示出，水裡、大肚二社似有某程度之聯結關係。對此一問題，在論文中將作進一步的探究與釐清。

## （二）拍瀑拉社群研究的討論

國內目前對拍瀑拉族社群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者，或說投注時間較久且成果較豐的是洪麗完。在《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一書中，探討了沙轆社社名變遷與社地範圍變化，認為日據時期後，沙轆社活動範圍，僅餘番社埔與養馬埔附近土地。另外，亦藉由沙鹿鎮現存的十四姓祭祀公業的成立與運轉，考察其社史發展，及沙轆社的若干傳統社會經濟特徵；而祭祀公業的存在，另方面可說明戰後尚有部分社民留居今沙鹿鎮。洪麗完且認為沙轆社或有零星量少的移居者（如移徙花蓮、埔里等地），似未有舉族遷居之舉，多數社民仍留居原地，學習漢人生活方式。<sup>21</sup>

另外，洪麗完最近對「牛罵頭地域」<sup>22</sup>內牛罵社的研究中，探討此地域內牛罵社、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平埔關係網絡與族群勢力消長。在平埔關係網絡之部分，洪麗完主要以中部平埔勢力消長此點來觀察，認為牛罵頭地域內之平埔社群，十七世紀主要統合在柯達王為中心的跨部落聯盟下，而在大甲西社事件後，由岸裡社群取而代之。在族群變動之部分，她提出漢人的大量入墾改變了本區的

---

<sup>20</sup> 對於水裡與大肚兩社間的互動關係，在第三章中將做討論，此不先贅述。契約文書參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古文書室收藏古文書（以下簡稱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4；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古文書編號 5、21。

<sup>21</sup> 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鄉，1997），頁 145-252、頁 222、頁 222 註 106。

<sup>22</sup> 洪麗完在此對研究區域的界定與前述研究者透過地理環境的界定方式有所不同，她是以行政劃分為依據，即以今清水鎮域為廣義的牛罵頭地域，來探討清代平埔各社群在此區的歷史發展與變遷。不過這樣的方式似乎沒有還原到當時之歷史時空脈絡，且若要以行政區劃方式來界定此研究區域，清代時的行政區劃稱呼大肚上堡或許更為合適。

族群結構，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sup>23</sup>筆者認為基本上洪麗完本文仍承接上述近年來平埔研究之趨勢，即意在探討某一地域內的族群、社群互動整合關係。不過，本文對地域內各社群彼此間更明確的互動形式及關係網絡其實著墨不多，日後仍有可再延伸探討的空間。

除洪麗完外，尚有一些學者也有相關的研究論述，在此不一一列舉，僅舉重要數篇如下：計文德在《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一文中，以契約文書為分析文本，來討論拍瀑拉四個社群土地權利的流失與漢番關係。<sup>24</sup>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一書中，藉由古文書的解讀，對大肚社的社址與社域、部落組織、社人名制等項目做逐一之探討。<sup>25</sup>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一書中，附錄部份對水裡社活動範圍與相關契字的初步分析。<sup>26</sup>翁佳音、中村孝志二人對 Quata 王(大肚番王)的研究。<sup>27</sup>

綜觀上述之研究，可發現並未有研究者對拍瀑拉各社群內部之整合與互動關係做探討。洪麗完在牛罵頭地域之研究中，雖對牛罵頭地域之平埔關係網絡做分析，然主要是以社群勢力消長此點來觀察，並未對沙轆、牛罵、岸裡等社之互動關係做進一步分析。因此，透過本論文對拍瀑拉地域內社群關係之互動整合分析，希冀能為清代拍瀑拉社群之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與觀察，及藉此引出更多的探討、對話空間。

<sup>23</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發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2000年9月14-15日。

<sup>24</sup>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86-186。

<sup>25</sup> 書中收錄了八十件之大肚社古文書，對日後的研究者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研究資料。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

<sup>26</sup>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213-232。

<sup>27</sup> 兩人同時指出在十七世紀時，臺灣西海岸拍瀑拉族的根據地曾經存在一個跨部落族群的王，統治過十幾個村社。參閱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卷4期(1992)，頁145-188；中村孝志，〈荷蘭統治下位於臺灣中西部的 Quatang 村落〉，《臺灣風物》43卷4期(1993)，頁203-238。



### （三）拍瀑拉地域漢人拓墾研究的討論

除社群關係外，本研究另一重點在討論漢人拓墾方式及其影響，故以下將選取數位學者對本區漢人開墾之研究，做一簡介。洪麗完對大安、大肚兩溪間漢人拓墾史的研究中，在溪南海岸平原（即本研究所指稱拍瀑拉地域）開墾的部份，探討了清代本區漢人的拓墾路線及進程、開墾組織、水圳的開發與影響。文中分述大肚、水裡、沙轆、牛罵四社地域的漢人拓墾大勢，她認為就此一大範圍觀之，大致而言，海岸平原以地利之便，移民登陸較早，其中河口港及沿河易於取水的濱河（溪）地帶，每為移民首拓之地；而大肚臺地西側由於有豐富湧泉，亦為移民首先選擇建立聚落之處。<sup>28</sup>

溫振華對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建立的研究中，探討大甲溪以南沿海地區（清水、沙鹿、梧棲）的開墾大勢，並透過契約文書說明漢人的開墾方式、爭水灌溉糾紛。<sup>29</sup>戴寶村在清代海岸平原開發的研究中，同樣亦分析本區移民的拓墾進展、水利的開發、漢人街庄、港口的發展。<sup>30</sup>除就整個區域做討論外，尚有對內部各個社群地域做探討的文章，例如楊玉姿對牛罵地區開發及同發號家族拓墾過程的研究。<sup>31</sup>另外，洪麗完亦有對牛罵、沙轆二社地域漢人拓墾過程的研究。<sup>32</sup>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一書的研究，也讓我們看到山腳林家在水裡地域的開墾與土地擴張過程。<sup>33</sup>

<sup>28</sup> 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台灣文獻》43卷3期（1992），頁165-259。

<sup>29</sup> 溫振華，〈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台中縣大甲溪流域開發史》（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126-131。

<sup>30</sup> 戴寶村，〈海岸平原的開發〉，《台中港開發史》（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87），頁23-47。

<sup>31</sup> 楊玉姿，〈清代牛罵地區的開發〉，《高雄文獻》24、25期（1986），頁53-102；〈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發（1760-1890）〉，頁71-90；〈清代同發號的成長〉，林淑玲等撰稿，《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62-76。

<sup>32</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14-17；《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160-163。

<sup>33</sup>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25-140。

綜觀上述之研究，顯示出一般對漢人對本區（拍瀑拉地域）漢人拓墾史的研究，常見以此一大範圍做分析，來探討內部的漢人拓墾過程，換言之，似乎將之視為一同質且齊一性發展的地區，未注意到內部可能有差異性的問題。例如是否有可能漢人的拓墾方式在不同之社群地域空間會呈現不同之現象？而造成不同之影響？因此，在本研究中，將針對各個社群地域的漢人拓墾過程與方式做逐一之檢視，注意是否有互異的現象。另外，在漢人大量拓墾後所造成的番社土地流失問題，是否內部各社群間有相同或差異的現象，以及所造成之影響，也是筆者所要探究與瞭解之處。

## 四、研究目的

若以地理環境與語族劃分來看，本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範圍，顯現出相當的均質齊一性，不過，筆者先不將拍瀑拉地域視為一均質的空間（或說暫時拋開均質且齊一性發展的想法），而試圖透過歷史事件的分析來呈現（或說探求）其內部可能有的社群地域的空間差異性，而這也是本研究所關注與所要突顯之處。拍瀑拉地域內部更細緻的圖像為何？如何顯現在各社群彼此間的互動整合上？另漢人在進入拍瀑拉地域拓墾，及其衍生出的各社土地流失問題，是否也呈現了各社群地域的不同？而其影響為何呢？

在社群關係的部份，筆者試圖瞭解拍瀑拉地域內牛罵、沙轆、水裡、大肚四社間的互動與整合關係，易言之，在同一地域空間內的四個主要社群，其彼此間互動關係為何？是否可再細分不同的地緣團體與互動聯結的存在？是否牛罵社與沙轆社間的聯結關係較緊密，而水裡社與大肚社又是另一互動群體？而在漢人拓墾的部份，將探討拍瀑拉地域內部漢人拓墾進程與方式，以及漢人拓墾所生之番社土地流失現象，是否亦有社群地域上的差異，及其影響為何？以下將本研究所要達成的幾項目標，列舉如下：

- (1) 瞭解拍瀑拉地域之地形大勢與清代的自然景觀，並考定拍瀑拉各社群社址位置與社域範圍。
- (2) 瞭解拍瀑拉地域內各社群間的關係為何，是否存在某種互動整合，及其互動形式為何，是否可再細分不同之地緣團體與社群聯結。
- (3) 瞭解漢人拍瀑拉地域的拓墾進程與方式，在不同社群地域是否顯現出互異的現象。
- (4) 瞭解各社在面臨漢人大量拓墾後，所生之土地流失現象，以及是否影響各社的遷移與否。

## 五、史料介紹與論文架構

### (一)運用之史料介紹

本研究主要運用分析的史料為清代牛罵、沙轆、大肚、水裡四社之各類型契約文書（如「墾耕字」、「典契」、「借銀字」、「杜賣契」、「找洗字」、「鬮書」、「合約字」等類型<sup>34</sup>）。筆者主要透過各社相關的契約文書，來分析社址與社域範圍、社群互動關係、漢人拓墾過程與類型、番社土地流失現象等幾個面向。拍瀑拉四社相關的契約文書收集自日治時期所編輯整理的《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私法物權編》，以及戰後由王世慶收集編製的《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近年來研究者所田野搜集，並集結成冊之古文書專輯，如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洪麗完編《臺灣古文書專輯》(上)(下)、《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沙鹿鎮志》中收錄之契約、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中收錄之契約。另外，也利用中央研究

<sup>34</sup> 對各類型契約文書之類別與常用重要術語介紹，參閱洪麗完撰稿，《臺灣古文書專輯（上）》（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13；陳秋坤，《臺灣古書契（1717-1906）》（臺北：立虹，1997）。

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古文書室收藏之契約文書，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收藏古文書微捲資料。筆者將透過這些契約文書來考定出牛罵、沙轆、水裡與大肚等四社之社址與社域範圍，且進一步探討社群間的互動聯結，分析其關係網絡為何。另外，也將透過各社契約文書，探討漢人在各社地域的拓墾路線與進程、拓墾類型與方式、番社的土地流失現象及其影響等問題。

此外，也將運用清代官方編修的地方志(如《諸羅縣志》、《彰化縣志》、《臺灣府志》等)；遊記、筆記、文集類史料(如《稗海記遊》、《臺海使槎錄》等)的記載，來重建清代本區之自然景觀，以及清政府對本區的統治管理情形。在地圖使用方面，筆者將運用明治 37 年（1904）所繪製之《臺灣堡圖》為輔助工具，來與契約文書上之地名位置相互對照，在堡圖上還原劃分出各社之社址與地域範圍，以及漢人之街庄聚落。<sup>35</sup>

## (二)論文架構

本文第一章為「導論」。第二章為「拍瀑拉地域的地理環境與社群分佈」，將首先對清代本區之自然景觀，以及地形大勢做一介紹。接著，將主要透過契約文書來考定各社之社址位置與社域範圍。第三章為「拍瀑拉地域內的社群關係」，首先以清政府對本區的治理為切入點（社餉徵收、通事的設置），分析所呈現之社群聯結，接著再透過契約文書的分析，探討拍瀑拉各社群間的互動整合關係及互動形式，瞭解是否有地域內更次級互動群體與社群聯結關係的存在。第四章為「拍瀑拉地域的漢人拓墾」，將探討漢人本區的拓墾路線與進程，及拓墾的類型

---

<sup>35</sup> 施添福即認為「聚落研究有賴於地形圖做工具和做為史料。借助地形圖，不但能更確實地釐清拓墾範圍、設施、路線以及地名所指涉的地域範圍；同時亦能更有效更正確地地理出古文書等史料的時空順序及解讀其蘊含的意義（底線筆者所加）。何況地形圖本身所提供的眾多相關自然、人文地理資訊，更是建構聚落建立、發展與變遷論述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參閱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張炎憲、陳美蓉合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臺北：自立，1993），頁 155。

與方式，分析漢人在不同社群地域所呈現的拓墾大勢與方式是否有差異。

第五章為「拍瀑拉各社土地流失問題的探討」，將分析在漢人大量拓墾下，所衍生各社土地流失的現象。第六章為「四社遷移與否與社群的聯結關係：以入墾埔里事件為例」，將分析因土地流失下，各社是否遷移的問題，以拍瀑拉各社入墾埔里為例，探討各社入埔與否與背後之原因，接著分析道光年間本區各社群入墾埔里所顯現之社群聯結，瞭解是否依循原有之社群互動聯結關係而行，還是另有其他的現象。最後，在第七章「結論」中，將總括上述各章之研究結果，分析所呈現之意義，並指出一些研究上的不足與限制處，及將來待解決與再深入探究之課題。

## 第二章、拍瀑拉地域的地理環境與社群分佈

在開始本研究的討論前，將先透過清代文獻中的描述，來呈現清代本區之自然景觀，另亦加入近代地理學者對本區地形的描述。在第二節中，則主要透過契約文書，來分析本區的社群分佈狀態，瞭解拍瀑拉各社群社址位置與社域範圍，對其做一劃分與界定，俾為以下諸章節之討論基礎。

### 第一節、清代拍瀑拉地域的地理環境

清代地方志書中，並未對本區之地形加以描述或介紹，僅常見在《封域志》卷目下有對山川之描述，《諸羅縣志》(1717)中對本區山川形勢有較詳盡之描述：

東北為貓霧揀山（東有曠埔，漢人耕作其中），東南為貓羅山。……逾大肚溪與寮望相對峙者，曰大肚山（山後為貓霧揀社）。北而沙轆山、牛罵山、崩山（土多塌陷，故名）、鐵砧山（頂圓而平，故名），……東插乎沙轆、牛罵二山之間者，為岸裡山。<sup>1</sup>

由上引之描述，對照《諸羅縣志》中《山川總圖》（參見圖 2-1），可大略看出清代本區之山川名稱及位置。如依現今地理學者的劃分，拍瀑拉地域可大分為大肚臺地及以西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兩區。以下將分別對兩地形區作一簡單介紹，以及描述清代兩區所呈現之自然景觀。

<sup>1</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9。

圖 2-1 拍瀑拉地域清代山川形勢圖

資料來源：周鍾瑄，《諸羅縣志》，附 山川總圖，頁 11-12。

圖 2-2 拍瀑拉地域現今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張勝彥編纂，《台中縣志》卷首第一冊（豐原：台中縣政府，1989），頁 11。

## （一）大肚臺地

依地理學者之研究，大肚臺地為一長方形臺地，北由大甲溪南岸起，南至大肚溪北岸為止，總長約 20 公里，平均寬約 7 公里，呈北北東至南南西的走向。海拔多在 180 公尺以上，最高點在臺地之中央，為 310 公尺。<sup>2</sup>大肚臺地大致呈一傾動地塊，具有由西向東之傾動方向，故其西坡係一斷層崖，主斷層線（清水斷層）乃大甲斷層之南方延長，經過臺地西側之山麓線。順此斷層線有豐富而良質之泉水湧出，如清水之埤仔口泉，沙鹿之番婆井泉、番公井泉以及龍井之龍目井泉等。<sup>3</sup>

臺地西麓斷層線一帶因有天然湧泉，取水方便，此地域內之平埔社群或漢人自然會選擇此作為聚居處，因此沿斷層線容易形成平埔族番社與漢人街庄聚落。至於臺地上在清代所呈現之自然景觀，可由以下郁永河之描述，大略得見。康熙 36 年(1697 年)為採硫而來臺的郁永河在行經沙轆、牛罵社時，因連日大雨，不得前行，而留置牛罵社時曾登上社後之山，所留下對當時臺地上自然景觀的描述，內容摘錄如下：

余榻面山，霾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睹其麓；忽見開朗，殊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為藩籬，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荊拂草而登。既陟巔，荊莽繆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聯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視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底線筆者所加）。惟有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咳；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不得；而修蛇乃

<sup>2</sup>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1993），頁 820。

<sup>3</sup> 林朝棨，《臺灣地形》（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 297。



圖 2-3 大肚臺地地形圖

資料來源：洪敏麟等撰稿，《臺中縣大甲溪流域開發史》（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頁 31。

出蹠下，覺心怖，遂返。<sup>4</sup>

由郁永河之描述，我們可看出當時大肚臺地上的景象為「林木如蝟毛，聯枝累葉」，且「荊莽繆結，不可置足」，可見康熙年間臺地上仍處於荒涼未開墾狀態，應仍為平埔族人之鹿場。

不過上述荒涼的景象，在道光年間吳子光的描述中，已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大肚山無首無尾，如人臥地上，只一副腰腹空殼，別無精神血脈之留。山以大肚名，肖甚亦陋甚。山長三十里有奇，寬二十里有奇，有屯，有市，有田畝。有果蓏，多秀色，有草木，多異香；臺山之最膏腴者也（底線筆者所加）。<sup>5</sup>

依吳子光之描述，大肚山上出現有市集與田園，他並稱為「臺山中最膏腴者也」。對照上述康熙年間荒涼未開墾之景象，臺地上之景觀已起了大變化，此代表道光年間，漢人已入墾大肚臺地，在其上開闢田園，建立起漢人的聚落空間。

## （二）清水隆起海岸平原

依地理學者之研究，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分布於大甲溪新沖積扇與大肚溪之間，東側以 140 公尺左右之切割斷層崖，與大肚臺地為界，西臨臺灣海峽。東邊（斷層崖下）南北長約 16 公里，西邊（海岸線）長約 11 公里，寬平均 4.5 公里。本平原屬於隆起未久之幼年海岸平原初期，坡度甚小，東緣僅海拔 10 公尺，故隆起量亦 10 公尺。因為大肚臺地係向東傾斜之傾動地塊，其西坡之順向河谷（切割斷層崖之河谷）短小而無水，坡度亦大，形呈乾溪之狀態，且水量極少。<sup>6</sup>

<sup>4</sup> 郁永河，《裨海記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1959），頁 19-20。

<sup>5</sup> 吳子光，《臺灣記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1959），頁 1。

<sup>6</sup> 林朝綏，《臺灣地形》，頁 354。

圖 2-4 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地形圖

資料來源：洪敏麟等撰稿，《臺中縣大甲溪流域開發史》，頁 33。

由上段敘述可知，發源自大肚臺地流經平原之河流，均為短小河流，水量極少，這應為清代漢人在平原地帶開墾過程中，需克服之不利因素；因漢人之土地開墾即土地水田化之過程，水資源的取得極為重要，常為土地開墾是否順利的重要關鍵。也因本區平原河流短小而無水，本區主要之灌溉用水是修築水圳引大甲溪與大肚溪灌溉平原上之水田。<sup>7</sup>

而清代平原地帶之自然景觀，可由郁永河之描述略窺一二：

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sup>8</sup>

由上引文字可看出康熙年間大肚社附近之景觀仍為「林莽荒穢，宿草沒肩」。郁永河另有以下之一段描述：

故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sup>9</sup>

康熙 61 年(1722 年)，黃叔璥所撰《臺海使槎錄》亦有如下之記載：

偽鄭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而止。自歸版圖後，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

故北路營訊，止大肚安設百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為境外。<sup>10</sup>

由郁永河與黃叔璥的記載，顯示出在康熙年間，平原區是一副林莽深密，草萊未闢的景像，也代表漢人未大量的入墾本區，故地表景觀仍未大幅度的改變；而平原「林莽荒穢，宿草沒肩」之景象，亦可能為當時平埔族人行游耕農業

<sup>7</sup> 本區主要灌溉水圳為五福圳（引大甲溪水）與大肚圳（引大肚溪水），均在雍正年間修建完成。對本區各水圳的名稱與修建年代可參閱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頁 209-210。

<sup>8</sup> 郁永河，《裨海記遊》，頁 19。

<sup>9</sup> 郁永河，《裨海記遊》，頁 36。

<sup>10</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1957），卷二 赤崁筆談，武備，頁 31-32。

(swidden agriculture) 之證明。<sup>11</sup>然雍正、乾隆年間以後，隨著漢人的大量入墾平原區，平原上昔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之景象已不復見，成為田陌交錯之水田稻作區。

透過以上之討論，對清代拍瀑拉地域內之自然景觀與地形大勢，大致有一初步之瞭解。我們也看出，大體上，拍瀑拉地域是一個地形同質性高的地理區，而且是一塊形勢相當方整的區域（東至大肚臺地，西臨臺灣海峽，南界大肚溪，北抵大甲溪）。在下一節中，將對本區之社群分佈做一探討，考定拍瀑拉各社社址所在與社域範圍。

## 第二節、清代拍瀑拉社群的社址與社域範圍

學界迄今對拍瀑拉社群社址與社域範圍的研究，<sup>12</sup>有洪麗完對沙轆社、牛罵

---

<sup>11</sup> John Shepherd 認為游耕農業會導致林木與草地邊界地帶的增加(原文如下: Far from competing with the deer herds for fields, swiddening had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edge between forest and grassland. [底線筆者所加])。康培德對 17 世紀西拉雅人研究中，亦提及游耕農業對自然景觀之影響，當一塊土地不再被用做作物栽植而廢耕時，草本植物將是首批覆蓋這塊廢耕地的植被，接著是灌木類的矮樹叢 (shrubs and bushes)，最後才再輪回林木的景觀。由上述兩人之描述，顯示出康熙年間拍瀑拉地域「林莽荒穢，宿草沒肩」之景觀，可能亦反映了拍瀑拉各社人仍行游耕農業之證明。參閱 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455n21；康培德，*十七世紀的西拉雅人生活*，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7。

<sup>12</sup> 對於社址與社域之區分，張素玢認為社域是一個社群的經濟與社會空間，社民可自由耕種游獵其中，社址則是平埔社群的聚落，隨著游耕區域和自然環境的改變，聚落也跟著遷移，而且一個社群的社址應不只一個。John Shepherd 則認為平埔族人在固定的地區形成一聚居形的村落 (village)。以此村落為中心，向外作同心圓式的分布，往外依序為村落耕地、漁獵採集地，最外一圈為與其他部落共享之狩獵地 荒地或為鄰近村社所有地(原文如下: Plains aborigines generally lived in nucleated villages on permanent sites. ....We can visualize the territory outside aborigine villages as divided into concentric rings, distinguished by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each ring and by the

社址與社域之界定，<sup>13</sup>而主要透過相關兩社之契約文書作為分析史料。許雪姬在《龍井林家的歷史》一書之附錄一有提及對水裡社原居地之觀察，<sup>14</sup>主要引自安倍明義、洪敏麟的看法。劉澤民則運用相關史料及契約文書對大肚社之社名、社址與社域作分析。<sup>15</sup>綜觀上述之研究，顯示對於牛罵社、沙轆社、大肚社之社址與社域範圍，學者已較有明確之探討，而對水裡社則無。此外，對於社域範圍之四至界線，只有洪麗完對牛罵社及劉澤民對大肚社社界作探討與釐定，其餘二社學者則無明確之界定。

在本節中，將對拍瀑拉四大社群的社址與社域範圍作一探討，對於社域空間範圍的界定，主要運用相關各社之契約文書作為討論依據，劃分出各社之社域範圍。也將對各社之四至社界作一探討與界定，注意相鄰各社間的社地歸屬與劃分。文中對於社址的考定，是以地契中有明確記載坐落於番社附近之地目來推論其社址位置，而對社域範圍之探討，是透過地契中明定為平埔族人之所有地來界

---

exclusivity of tribal territorial claims. Village farmland was located in the nearest ring, and exclusive sites of hunting, fishing and gathering were located in the next ring. Outside these two rings were more distant hunting grounds the village was forced to share with other tribes, wasteland, and the territories of neighboring villages.)。筆者認為 Shepherd 上述提及平埔族人聚居之村落(village)即類似社址之概念，而位於村落外之社地(territory)，包括有耕地、狩獵採集地、與其他村社共有地則為此村社之社域範圍。而詹素娟則認為地域社群的邊界，可能才是歷史上原住民認同的範圍，與社經關係運作的有效空間；此一邊界，且與婚姻圈、土地所有方式等互有關係。詹素娟認為地域社群的邊界為社經關係運作的有效空間，但是其所展現出來的空間範圍；亦即平埔族人認同的範圍，卻有可能跳脫社與社的界線與區分，形成一區域性地緣團體。基本上，張素玢與詹素娟兩人都認為社會與經濟關係運作的空間為一社群的活動範圍，只是詹素娟進一步認為此一活動空間有可能連結不同社群。筆者本節中對社域範圍的探討，只單純以契約文書作為分析史料來界定各社群之社域範圍與社址所在，至於在此一社域範圍內的社會與經濟活動、社群關係或是「區域性地緣團體」的是否形成，將在下一章中作探討。參閱張素玢，平埔社群空間地圖的重構與解釋：以東螺社與眉裡社為中心，頁 19；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241；詹素娟，地域社群的概念與檢驗：以金包里社為例，頁 224。

<sup>13</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17。

<sup>14</sup>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218-219。

<sup>15</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53-64。

定社域範圍。

## 一、牛罵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 (一)社址

在洪麗完對牛罵社的研究中，提及最遲到乾隆 17 年(1752)牛罵社人已遷離舊社形成新社，而舊社在西勢之東，新社位置應介於牛罵舊社與埤仔口之間。<sup>16</sup> 埤仔口即位在牛罵頭街區(今清水街)，此處位於斷層帶上，有天然之湧泉。洪麗完認為牛罵舊社在西勢之東，而西勢之東即為牛罵頭街，亦即舊社社址在牛罵頭街。<sup>17</sup>若依洪麗完的看法所得，舊社社址在牛罵頭街內，然新社社址也在牛罵頭街內，如此看來，牛罵社人似乎只在牛罵頭街區內作短距離之遷移。對於洪麗完的看法，以下將透過契約文書進一步驗證之。

依據契約文書之記載，乾隆 19 年(1754)有漢人陳燦將坐落「牛罵頭街」之瓦店賣與蔣伸，其四至範圍「東至本店前車路，西至社邊（底線筆者所加），南至余宅，北至林宅店」。<sup>18</sup>其後，乾隆 40 年(1775)漢人王文道將「牛罵頭街」之瓦店典當與白望高，其四至範圍「東左蔡宅店為界，右邵宅店為界，前至路為界，後至番社陳宅橫門為界（底線筆者所加）」。<sup>19</sup>由上引地契之描述，可發現牛罵社確是位於牛罵頭街附近，且與牛罵頭街相毗連。而上述乾隆 19 年之地契中，提及坐落牛罵頭街之瓦店，「東至本店前車路，西至社邊」，顯示出牛罵頭街之西為牛罵社，而牛罵頭街之西即為西勢，因此西勢一帶似應為牛罵社社址所在。其後，

<sup>16</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5、17。

<sup>17</sup> 西勢在今清水街區西半部，即清水鎮北寧、西寧、文昌、中興、南寧等里境內。主要部分在中山路以西至海線鐵路間。參閱洪敏麟撰稿，《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一輯（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頁 117。

<sup>18</sup> 王世慶輯，〈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9 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sup>19</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15.D189.224。

道光 5 年(1825)有漢人黃代福兄弟將坐落於「牛罵頭大街西畔」之瓦地賣與蔡光福，此瓦店須年納社番地基租錢，<sup>20</sup>地契中之「牛罵頭大街西畔」亦應指西勢附近一帶，且此店地須納社番地基租錢，也說明了西勢為牛罵社人所屬地。

在道光 18 年(1838)陳炎與活奇、虎奇兄弟所立之退給批契字中，其土名在西勢庄，四至範圍「東至本厝西畔公巷界，西至大宇甘地界，南至吳宅地界，北至瓦厘沙連園岸界」。<sup>21</sup>道光 26 年(1846)蔡媽省與宗親所立之退耕田契，水田二處位於西勢庄，四至範圍「其一東至斗踏田界，西至蒲學一田為界，南至愛箸智六田為界，北至蒲學一田為界；又一處東至高尾厘田為界，西至阿甲沙連田為界，南至加臘希田為界，北至愛箸智六田為界」。<sup>22</sup>由上述地契之記載，漢人的入墾西勢庄，其田地四至範圍均與牛罵社人之田地相毗連，可證明西勢一帶確為牛罵社人聚居之處。此外，由西勢往西一帶為社口庄，而社口意為在牛罵社西方入口處形成的村莊。<sup>23</sup>綜合上文之討論，推論出牛罵社社址似乎非洪麗完所言在西勢之東，應當是位於牛罵頭街以西的西勢，且往西到社口庄一帶之土地。

## (二)社域

依契約文書來觀察牛罵社之社域範圍，往東可以延伸到大肚臺地上。在道光 2 年(1822)之地契中，有感恩社<sup>24</sup>業主六觀目義將坐落面前厝庄(今清水鎮海風里)

<sup>20</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15.D189.369。

<sup>2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38.D39.001。

<sup>22</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19 號。

<sup>23</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頁 148。

<sup>24</sup> 感恩社即牛罵社。牛罵社、沙轆社因參與雍正 9、10 年（1731、1732）的大甲西社抗官事件，而於事件平定後，清廷將牛罵社改稱「感恩社」，沙轆社改稱「遷善社」。對於大甲西社事件之研究，可參閱張士陽，雍正九、十年臺灣中部先住民反亂，〈臺灣近現代史研究〉6 期(1988)，頁 5-55；計文德，德化、感恩與遷善：從大甲西社番變試探拍瀑拉族之衰落，〈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八十一年會友年會論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2），頁 1-37；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63-69；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128-132。



西畔之山園給楊舒獻開墾；<sup>25</sup>道光 30 年(1850)鄭高遠將承祖父遺下感恩社海豐庄(今清水鎮海風里)西畔之風水地賣與蔡守身；<sup>26</sup>同治 10 年(1871)有漢人許柳奇將坐落楊厝寮庄(今清水鎮楊厝里)之山園賣與同發號家族，此山園須年納感恩社業主大租；<sup>27</sup>其後，光緒 14 年感恩社番婦為阿巴禮與許永豐號所立之給風水地字，坐落許厝寮（今清水鎮楊厝里，在楊厝寮庄東南方一帶）路南畔。<sup>28</sup>由上述地契之記載顯示，牛罵社域範圍往東到大肚臺地上之面前厝庄、楊厝寮庄以及許厝寮，然其社域東邊界線為何？可由以下之「岸裡社西界址碑」來觀察：

東保岸裡等社界址：至大甲溪南感恩社交界大坪頂分水為界。

西保大甲溪南感恩社界址：至大坪頂與岸裡等社交界分水為界。<sup>29</sup>

此碑立於大突寮(今清水鎮東山里)附近之旱田中，碑文中標示此為感恩社（牛罵社）與岸裡社之界碑，顯示出大突寮為牛罵社之東界，而大突寮即位在許厝寮往東附近一帶。另外，《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公館庄（今沙鹿鎮公明、清泉二里）一帶原為岸裡社、感恩社與遷善社（沙轆社）三社分屬之地，<sup>30</sup>將之對照日治初期 1904 年（明治 37 年）繪製之《臺灣堡圖》，公館庄位在大突寮以南之吳厝庄(今清水鎮吳厝里)及西勢寮庄（今沙鹿鎮西勢里）南邊。由此觀之，牛罵社東邊社域似乎還可由大突寮往南延伸到吳厝庄、西勢寮庄抵公館庄，不過並未有地契資料顯示吳厝庄、西勢寮庄為牛罵社域範圍，因此，此大突寮到公館庄一帶土地，似應為牛罵社、遷善社與岸裡社相鄰且分屬之地，似乎並未有界碑來明定其界線為何。

牛罵社在平原上之社域範圍，包括有雍正 11 年(1733)漢人向感恩社拓墾之十三庄：秀水庄、三座庄、客庄、橋頭庄、田寮庄、後庄、社口庄、山下庄、水

<sup>25</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73。

<sup>26</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86 號。

<sup>27</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2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76.D76.010。

<sup>29</sup>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151 種，1962），頁 123。

<sup>30</sup>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1905），《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臺北：南天，1998），頁 40。

碓庄、上涌庄、下涌庄、青埔庄（今清水鎮秀水、國姓、頂南、橋頭、田寮、西社、青埔等里）。<sup>31</sup>此十三庄地已幾乎涵蓋了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大半之地，至於更往西濱海岸之塭仔寮庄(今清水鎮海濱里)並未有明確資料顯示為牛罵社人所有地，因此，並無法明確斷定秀水庄(今清水鎮秀水里)以西一帶之土地是否屬牛罵社之社域範圍。

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高美庄(今清水鎮高西、高南、高美、高北等里)一帶原為感恩社人所有地，於乾隆年間有漢人入墾。<sup>32</sup>高美庄位於大甲溪南岸河口三角洲上，因此，牛罵社社域之北界可抵大甲溪。至於牛罵社社域之南界則與沙轆社相鄰，在社口庄(今清水鎮西社里)以南之四甲二、竿蓁林一帶已為沙轆社之領域。

綜合上述，牛罵社社域範圍東到大肚臺地上之面前厝庄、楊厝寮庄、許厝寮，以大突寮一帶與岸裡社相鄰；西到海岸平原上之秀水庄；北到大甲溪南岸的高美庄；南到社口庄以南一帶與沙轆社地域相鄰。

## 二、沙轆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 (一)社名

沙轆社於雍正 10 年(1732)因參與大甲西社抗官事件，於事平後，為清廷改名為「遷善社」。如果由地方志書來觀察，發現在康熙 34 年(1695)編修之《臺灣府志》、康熙 51 年(1712)《重修臺灣府志》、康熙 56 年(1717)《諸羅縣志》中社

<sup>31</sup> 此為乾隆 43 年(1778)，北路裡番分府沈發給「感恩社民番業佃諭示碑」中之記載，此碑為嚴禁感恩社番業戶藉端勒索，而漢佃亦不得短少番租。碑文中記錄了漢人林元璜等人自雍正 11 年(1733)，便向感恩社番承墾十三庄地。此碑現存於臺中縣清水鎮紫雲巖觀音廟內。參閱《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75-76。

<sup>32</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0。

圖 2-5 牛罵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名的記載均為「沙轆社」，<sup>33</sup>而在乾隆 6 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 10 年(1745)《重修臺灣府志》及乾隆 25 年(1760)《續修臺灣府志》中記載則為「遷善社」。<sup>34</sup>由此顯示，地方志書的記載反映了雍正年間沙轆社名改為遷善社之事實。

而在乾隆 37 年(1772)《海東札記》中則出現遷善社、沙轆北社的稱呼，<sup>35</sup>這是首次將沙轆社分為兩社之記載，不過其後道光 10 年(1830)之《彰化縣志》仍稱遷善社，並未分為兩社。<sup>36</sup>而由契約文書觀察，乾隆 32 年(1767)已出現「遷善南社番六仔武葛」之人名，<sup>37</sup>其後在乾隆以後直到光緒年間之地契，已大多數分為遷善南、北二社之稱呼，且南北二社各有其所屬之社地。可見最遲到乾隆中葉年間，沙轆社已區分為南、北二社。

## (二)社址

依據洪麗完對沙轆社之研究，認為今沙鹿鎮竹林南北溪之間俗稱「番社埔」之地，主要為南社舊聚落所在；靠近南勢溪地帶，則為北社舊聚落範圍。<sup>38</sup>如依契約文書記載來印證洪氏之說法，可發現在嘉慶 10 年(1805)楊士帳與王唇所立之契約中，其厝地在「沙轆街（今沙鹿街）後東勢」，而其地為遷善南社通事六

<sup>33</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38；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1960），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44；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31。

<sup>34</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1961），卷五城池，坊里，頁 82；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1961），卷二規制，坊里，頁 7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1962），卷二規制，坊里，頁 81。

<sup>35</sup>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1958），頁 57。

<sup>36</sup>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1962），卷二規制志，保，頁 51。

<sup>37</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9。

<sup>38</sup> 不過洪麗完在此對遷善南、北兩社址之界定，並未有詳細之討論分析過程，也未標示出此說法的資料來源出處，因此仍須進一步驗證之。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5。

仔武葛及社番愛箸祿所有；<sup>39</sup>另外，嘉慶 15 年(1810)何儼然將坐落「沙轆街尾東勢」水田賣與王青春，且須年納遷善南社通事大租粟；<sup>40</sup>其後嘉慶 18 年(1813)、光緒 2 年(1876)之地契中，都記載了「沙轆街東畔」之地為遷善南社所有。<sup>41</sup>此外，光緒 5 年(1879)之地契中，記載沙轆社口庄之水田買賣情形，須年納遷善南社番婦阿才支理大租谷，<sup>42</sup>而社口庄即位於沙轆街東邊附近。又，道光 20 年(1840)遷善南社阿眉大甲與王天來所立之給地基字，其埔地位在「本社後竹林庄」(今沙鹿鎮竹林、犁分二里)；<sup>43</sup>同治 11 年(1872)漢人李自守與沙轆社口庄翁合勝號所立之招耕字，水田二處，一處坐落「本社前土名大車路」，<sup>44</sup>一處坐落北勢埔，兩處田地 耕自遷善南社卻仔打毛及蒲氏武葛。<sup>45</sup>由上述地契觀之，遷善南社聚落應坐落沙轆街東邊，在沙轆街之東社口(今沙鹿街區內，屬居仁里)附近一帶土地，且番社後為竹林庄，前為大車路，即番社範圍東與竹林庄相鄰，西到通過沙轆街東畔之大車路。對照上述洪麗完之說法可相互印證，沙轆街之東即洪麗完所說竹林北溪與竹林南溪之間南社聚落「番社埔」一帶，包括了社口庄。

然若再由契約文書之記載，顯示遷善南社聚落範圍似可再包括番社埔以北之「北勢埔」(又稱養馬埔)一帶。上述同治 11 年(1872)李自守與沙轆社口庄翁

<sup>39</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31 號。

<sup>40</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37 號。

<sup>41</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832；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453 號。

<sup>42</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29 號。

<sup>43</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842。

<sup>44</sup> 此大車路為清代本區主要的交通路線，依據《台灣府輿圖纂要》記載：

縣城出北門至大肚街十里，大肚街至龍目井十里，龍目井至沙轆五里，沙轆至牛罵頭五里，牛罵頭至青埔八里，青埔至大甲溪南岸止二里，以上係城北往來通衢，計程四十里。

由上所述，可看出這條南北的通衢大路由半線往北到大肚、龍目井再經沙轆、牛罵頭、青埔而至大甲溪南岸。參閱《台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1963)，彰化縣輿圖纂要，道里，頁 250。

<sup>45</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27 號。

合勝所立之契約中，一處田坐落北勢埔，須納遷善南社番蒲氏武葛大租谷；此外，光緒 8 年（1882）陳永兄弟三人與蔡太和堂所立之契約，水田坐落沙轆北勢埔，須納遷善南社阿觀武葛（蒲氏武葛之孫）大租谷，田地四至範圍「東至車路界，西至透過圳消水溝為界，南至阿連武葛田界，北至阿末箸來田界（底線筆者所加）」。<sup>46</sup>由上述地契可知，北勢埔一帶為遷善南社人所屬之地；再由四至範圍來觀察，陳永兄弟所承墾田地亦與遷善南社人田地相毗連，在在說明了北勢埔一帶應為遷善南社人聚居之處，故遷善南社之聚落範圍除番社埔外，尚可往北及於北勢埔一帶。

至於遷善北社之社址，由以下之契約文書可提供一些線索。在乾隆 54 年（1789）遷善北社悔仔元、烏肉元與曾國裁、曾國燕兄弟所立之地基起蓋字，地點在「竹林庄北勢溪仔坑」；<sup>47</sup>同治 5 年（1866）遷善北社悅仔山、田仔山招徠蔣媽乞開墾坐落「本社後竹林庄」之埔園；<sup>48</sup>以及光緒 18 年（1892）遷善北社文瑞山悅將坐落「本社後北勢溪仔邊」之山埔給陳春開墾。<sup>49</sup>上述地契中提及之「北勢溪仔」顯然是位在竹林庄附近，竹林庄一帶有竹林北溪與竹林南溪流經，北勢溪仔所指應為竹林北溪，因而遷善北社址應坐落於竹林北溪附近。且地契中載明番社後為竹林庄，而前述遷善南社後亦為竹林庄；若由此觀之，遷善北社聚落似乎與遷善南社同樣位於竹林北溪與竹林南溪之間，亦即兩社之社址是相鄰的。然兩社聚落相鄰而要如何區分？以及遷善北社是否位在遷善南社北邊？因無足夠資料以供探討，目前尚無法釐清。而依據洪麗完之研究，認為北社社址是在南勢溪一帶，而其所指南勢溪是否為竹林南溪，還是指的是流經南勢坑庄（今沙鹿鎮南勢、埔子、三鹿等里）之南勢溪，在文中並未說明，且洪麗完對北社社址的看法並未標示其資料來源，因此無法進一步與本文之觀察相互驗證。

<sup>46</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33 號。

<sup>47</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819。

<sup>4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66.D66.010。

<sup>4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34。

### (三)社域

如依契約文書記載，可知遷善南、北二社之北界（或說是遷善北社之社域北界），是緊鄰牛罵社。道光 9 年(1829)張來生將坐落三 榔庄(今清水鎮 榔里)及竿蓁林庄(今清水鎮南社里)之番田再轉給蔡光福承墾，張來生此田原 耕自遷善北社；<sup>50</sup>道光 13 年(1833)楊有祥將坐落二 榔庄(今清水鎮 榔里，位於三 榔之北)之田厝賣與同發號，此田厝亦屬遷善北社所有。<sup>51</sup>其後，道光 21 年(1841)楊柏江位於麻踏崙(今清水鎮秀水里)之水田典與同發號，須年納沙轆北社大租谷；<sup>52</sup>道光 29 年(1849)紀有對將坐落牛埔仔庄(今清水鎮南社里)水田賣與同發號，年納遷善北社土目大租粟；<sup>53</sup>以及光緒 8 年(1882)蔡禮物與蔡少山所立之契約，水田坐落四甲二庄(今清水鎮南社里)，須年納遷善北社大租粟。<sup>54</sup>綜上地契所載，牛罵社域社口庄及秀水庄以南之四甲二、竿蓁林庄、麻踏崙、牛埔仔庄、二 榔及三 榔等地是屬遷善北社之社域範圍，顯示出牛罵社地與遷善北社地的緊密相接。

乾隆 32 年(1767)遷善南社六仔武葛將坐落竹林後橫山頂之荒埔給鄭挑開墾，<sup>55</sup>竹林即竹林庄一帶，坐落大肚臺地上。另同治 10 年(1871)陳註將坐落沙轆北勢坑（今沙鹿鎮北勢、東勢二里，坐落大肚臺地上）內之旱田山園賣與同發號，須年納遷善南社大租。<sup>56</sup>此外，《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南勢坑（位在北勢坑以南）為遷善社所屬社地。<sup>57</sup>綜上所述，遷善南、北二社在大肚臺地上之社域範圍，往東可延伸到竹林庄、北勢坑庄、南勢坑庄一帶，而其東界可到公館庄一

<sup>50</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13 號。

<sup>5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52</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53</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54</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32 號。

<sup>55</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9。

<sup>56</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57</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1-42。

帶與岸裡社相鄰。<sup>58</sup>

乾隆 54 年(1789)遷善南社業戶大宇牛罵、北社業戶瓦釐良將斗抵(今沙鹿鎮斗抵里,位在沙鹿街之西南方)後之山埔園給陳喜、陳岳開墾。<sup>59</sup>而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鴨母寮庄及安良港(今沙鹿鎮永安、永寧二里,位於清水隆起海岸平原上)為遷善社所屬社地。<sup>60</sup>因此,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南界,是在斗抵往西到鴨母寮庄、安良港一帶,與水裡社域之潭仔墘、山腳庄相鄰。

至於遷善南北社在平原上之社域範圍及其西界為何?乾隆 45 年(1780)遷善北社萬感將坐落南簡庄(今梧棲鎮南簡里)之塭埔給洪文由開墾;<sup>61</sup>及道光 10(1830)年周順兄弟將位於大庄(今梧棲鎮大庄里)之田厝賣與同發號家族。<sup>62</sup>此外,《臺灣土地慣行一班》中記載,道光 5 年(1825)紀于振向遷善北社業戶烏臘承墾魚寮、草湳(今梧棲鎮頂寮、下寮、草湳里)一帶土地,而梧棲港街亦為遷善社所屬之社地範圍。<sup>63</sup>由上所述,遷善南、北二社在平原上之社域範圍包括南簡庄、大庄一帶,往西到魚寮、梧棲港街、草湳一帶,亦即其社域西界逼臨海。

當筆者依據契約文書來探討遷善南、北二社社域範圍,並試圖對兩社之社域作一劃分界定時,卻發現兩社之社域範圍並不容易劃分清楚,有許多地目相鄰且共有。由契約文書的記載,位於斷層線一帶及以東之地,許多地目為兩社共有之地,包括鹿寮庄(今沙鹿鎮鹿寮里)<sup>64</sup>竹林庄<sup>65</sup>、埔尾庄(今沙鹿鎮斗抵里)<sup>66</sup>及

<sup>58</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0。

<sup>5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5。

<sup>60</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1-42。

<sup>61</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06 號。

<sup>62</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63</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1-42。

<sup>64</sup> 嘉慶 20 年(1815)遷善南社業主瓦籬斗將坐落鹿寮後橫山仔之山埔地給鄭振鳳開墾;道光 29 年(1849)遷善北社番婦阿百賴已將坐落鹿寮庄前之水田給同發號開墾。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718;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65</sup> 乾隆 32 年(1767)遷善南社六仔武葛將坐落竹林後橫山頂之荒埔給鄭挑開墾;乾隆 54 年(1789)遷善北社梅仔元、烏肉元與曾國裁所立之契約,地目在竹林庄北勢溪仔坑;其後光緒 10 年(1884)



斗抵<sup>67</sup>等地兩社均有社番與漢人間的土地 耕買賣行為；甚至往西到平原上之南簡庄、<sup>68</sup>大庄<sup>69</sup>等地亦為南北二社所共有之地。依筆者之觀察，只有一處地目比較集中顯示為北社之社域範圍，此為緊鄰牛罵社之四甲二、竿蓁林庄、麻踏崙、牛埔仔庄、二 榔及三 榔等地，不過竿蓁林庄亦有遷善南社番在其地招徠漢人開墾。<sup>70</sup>因此，筆者認為遷善南、北二社社域範圍內許多地目均為兩社所共有，很難對兩社各自之社域範圍作一清楚之劃分。

不過洪麗完則依其所收集之沙轆社相關契字，對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作一劃分，<sup>71</sup>認為若以北勢溪、斗抵，沿沙轆街、鹿寮、四甲二、竿蓁林、大 榔為分界，以東包括北勢頭、斗抵、埔尾、沙轆街東畔與營盤後、鹿寮、竹林、社口為沙轆南社範圍，以西，包括南勢坑、沙轆街西半部、南簡東部、二 榔及三 榔、竿蓁林西與東北勢、麻豆崙為北社範圍；至於南簡西部與以西下魚寮、大庄等漁塭為沙轆南北社人共有地。<sup>72</sup>洪麗完所畫出之南北二社分界線，大致上是沿著大肚臺地西麓與平原之交界處一帶，然在此線以東之斗抵、埔尾、竹林、鹿寮等地，

---

遷善南北社通事、業戶、土目等人將坐落竹林庄后土名大崙之地給漢人開墾。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9、819；《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1963），頁 369。

<sup>66</sup> 道光 4 年（1824）遷善南社番婦阿目大萬、百字大順將坐落埔尾庄之埔地給李海開墾；同治 12 年（1873）王朝肯與蔡為章所立之契約中，載明埔尾庄水田原承墾自遷善北社阿百四老。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837；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28 號。

<sup>67</sup> 乾隆 54 年（1789）遷善南社大宇牛罵、北社業戶瓦釐良將坐落斗抵後之公有山埔園一處給陳喜開墾。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5。

<sup>68</sup> 乾隆 45 年（1780）遷善北社萬感將坐落南簡庄之塭埔給洪文由開墾；道光 18 年（1838）許文連、紀有印所立之合約字，水田坐落三 榔南簡庄，需年納遷善南社番大租。參閱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06 號、250 號。

<sup>69</sup> 道光 10 年（1830）周順兄弟將坐落大庄之田厝賣與清水同發號，需年納遷善南社番大租；道光 11 年（1831），沙轆大庄、陳厝庄、南簡庄、火燒橋、八張犁、海墘厝、三甲等地遷善南、北社業戶及眾漢佃，因上、下西勢牧埔一帶屢被民番佔墾築田，而特請官府出示碑文嚴禁。參閱臺史所藏，編號 T2.D2.001；《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115-116。

<sup>70</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50.D50.011。

<sup>71</sup> 可惜的是洪麗完文中對此區分並未有明確之討論過程。

<sup>72</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5。

若依前述之討論，應為南北二社人所共有；因此將之劃歸南社範圍，頗令人不解。此外，在此線以西之南簡一帶及竿蓁林也同樣為南北二社人所共有地，不獨為北社所有。至於南簡西部及大庄等地為二社共有地之看法，則與前述之觀點相同。本文認為洪麗完對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劃分，有待進一步討論與修正的必要。

綜上所述，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範圍，往東可到大肚臺地上之竹林庄、北勢坑庄、南勢坑庄，東到公館庄一帶與岸裡社相鄰；西到平原上之南簡庄、大庄，更往西到近海的魚寮、梧棲港街、草湳一帶；南到斗抵、鴨母寮庄、安良港一帶與水裡社相鄰；北到四甲二、竿蓁林庄、麻踏崙、牛埔仔庄、二榔及三榔沿線一帶與牛罵社相毗連。

### 三、水裡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 (一)社址

許雪姬對水裡社活動範圍的研究中，引用洪敏麟的看法，認為水裡港是水裡社的原居地，直到乾隆 26 年(1761)陳姓漢人入墾於此後，水裡社才退居大肚臺地上。<sup>73</sup>洪敏麟提出這樣的看法，並無引用明確之資料來佐證，因而其正確性仍待進一步之驗證。而筆者試圖由目前所收集相關水裡社契約文書，來進一步驗證許雪姬、洪敏麟兩人的看法，就乾隆 26 年以前之 14 件地契內容來看，未有記載水裡番社附近的土地 耕買賣行為（參閱附錄三水裡社契約文書表），因而無法判斷水裡社址為何處，以及是否原居於水裡港附近。

<sup>73</sup> 洪敏麟認為原水裡社位置，相傳在今大肚溪口之北方約 1.5 公里處，亦即在水裡港附近，且因在海汊間之平埔族社，故稱水裡社。參閱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頁 179、181；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219。

圖 2-6 沙轆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如就乾隆 26 年以後之地契觀察，有坐落於水裡社附近土地之記載，可讓我們來推測水裡社址位於何處。乾隆 51 年(1786)何霜榮將坐落「水裡社北勢崙」之山埔地賣與賴五行；<sup>74</sup>嘉慶 25 年(1820)水裡社業戶瓦厘龜律將坐落「水裡社西勢」之山埔園給林丙開墾；<sup>75</sup>同年，水裡社阿眉安高與賴進仁所立之典山園契中，山園地位於「社後東勢」；<sup>76</sup>以及道光 19 年(1839)水裡社阿春毛龜將位於「番社西北勢」之山園賣與江宗。<sup>77</sup>上述地契中之土地種類均為山園埔地，由此觀之，水裡社址應當是坐落於大肚臺地上，或是臺地西麓斷層帶附近。

然其確切位置為何，再由以下之地契來觀察。光緒 9 年(1883)水裡社烏肉阿尾將位於社邊北勢之山園賣與梧棲林美利，其四至範圍「東至大宇荖仔併阿甲沙連園為界，西至大肚烏肉併大車路為界，北至大宇賜美園為界」；<sup>78</sup>此外，光緒 12 年(1886)賴永治將坐落水裡社北勢崙之山埔地賣與林元龍，四至範圍「東至橫車路為界，西至虎仔山前車路為界，南至番仔井舊車路為界，北至消水坑坎為界」。<sup>79</sup>由上述地契中之四至範圍來看，可發現兩地目均位於車路附近，而此車路走向是沿著斷層線一帶，因此推測水裡社之社址，應當是鄰近大車路附近，亦即在臺地西麓斷層帶附近。

然而對於水裡社址之確切位置，因再無明確之地契資料，無法再作探討與釐清。不過若由考古資料的記載，本地龍泉村為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後期(1000-350B.P.)之遺址，劉益昌推測為與水裡社有關。<sup>80</sup>龍泉村即清代龍目井庄一

<sup>74</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15。

<sup>75</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32。

<sup>76</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68。

<sup>77</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68。

<sup>7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83.D83.014。

<sup>79</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33。

<sup>80</sup> 劉益昌將之稱為鹿寮類型文化，已知的遺址分布於大肚臺地西側邊緣以及海岸平原上，代表性遺址有沙鹿鎮鹿寮遺址、清水鎮中社遺址上層、大肚鄉山仔腳遺址、大肚鄉頂街遺址上層、大肚鄉新興村遺址，龍井鄉龍泉村遺址上文化層的上部。劉益昌認為本類型的年代可以界定在 1000-400B.P.，可能是該地區拍瀑拉族的祖先。其中除中社遺址位在海岸平原上，其他分布在大

帶，坐落在斷層湧泉帶附近，有龍目井泉供取水及灌溉。<sup>81</sup>因此若將上文之觀察與考古資料相互驗證，可初步推斷水裡社址似乎是位於大肚臺地西側龍目井庄附近之地。

## (二)社域

依契約文書之記載，水裡社在大肚臺地上之社域範圍，有嘉慶 23 年(1818)水裡社大宇澤將坐落新庄仔庄(今龍井鄉新庄村)挑龜仔埕之荒埔給張媽從開墾；<sup>82</sup>以及道光 7 年(1827)鄭執向水裡社歸阿抵汝加己 耕三塊厝仔庄(今沙鹿鎮三鹿里)西勢之山園。<sup>83</sup>另依據《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南勢坑庄亦為水裡社所屬社地。<sup>84</sup>因此，水裡社在大肚臺地上之社域範圍包括了三塊厝仔庄、南勢坑庄、新庄仔庄等地。

至於其社域東界，可由以下之地契來觀察，光緒 18 年(1892)有大肚山頂南寮庄郭江、林水存、張番等人將承祖父墾自貓霧揀社之山埔園賣與林元龍，此山埔園坐落社後山尾大坪頂，其四至範圍「東至劃定土牛界，西至憲定石碑中北大肚埔地界，南至往西大路土牛界，北至揀水二社界牌土牛界（底線筆者所加）」。

<sup>85</sup>由四至範圍可知，貓霧揀社之北界是與水裡社相鄰，兩社間並有一石碑為分界，換言之，水裡社之東邊社域是與貓霧揀社相鄰。而兩社之界牌位於何處，地

---

肚臺地西側邊緣，即在大肚臺地西麓之斷層湧泉帶附近。我們可由遺址的位置來推知拍瀑拉各社群的社址位置，也可證明取水方便的大肚臺地西側附近，應該也是拍瀑拉各社人選擇聚居之處。參閱劉益昌，〈臺灣中部地區史前晚期文化的檢討〉，發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2000 年 9 月 14-15 日，頁 29-30、33。

<sup>81</sup> 上述光緒 12 年之地契中，提及「南至番仔井舊車路為界」，此番仔井是否為龍目井之別稱，抑或是另一天然湧泉，目前尚無法釐清。不過由此似也可證水裡社址應當是位於斷層湧泉帶附近，故有番仔井的記載。

<sup>82</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92。

<sup>83</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759。

<sup>84</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85</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02。

契中並無說明，不過可發現立契人是居於大肚山頂南寮庄（今龍井鄉南寮村，新庄仔庄西南一公里處，位大肚臺地頂平坦面），因而其向貓霧揀社承墾之山埔地應當也是位於南寮庄附近，故揀水二社界牌應是位於南寮附近。此外，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南寮亦為水裡社與中、北大肚社所共同所屬地；<sup>86</sup>由此顯示，南寮附近應為貓霧揀社、中北大肚二社與水裡社之共有交集地。

乾隆 10 年(1745)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招徠賴以覺開墾水裡山腳(今龍井鄉山腳村，位於龍井街區之北約一公里)大路下之草埔；<sup>87</sup>道光 4 年(1824)賴士全將坐落潭仔墘庄(今沙鹿鎮斗抵里，在斗抵之西南)西畔埔園賣與童學，須年納水裡社瓦厘龜律大租錢二百文；<sup>88</sup>又《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龍目井庄(今龍井鄉龍泉、龍崗村)為水裡社所屬社地。<sup>89</sup>因此，斷層線附近之潭仔墘、山腳到龍目井庄為水裡社領地，且往西到平原上之山腳庄全部及三塊厝庄全部(今龍井鄉龍津、三德、忠和村)。<sup>90</sup>而三塊厝為大字地名，尚包括中厝(今龍井鄉三德村)、海埔厝(今龍井鄉龍津村)、崙仔頂(今龍井鄉忠和村)及靠海處之頂蚵寮，<sup>91</sup>可見水裡社域之西界可再延伸到臨海之頂蚵寮一帶。

至於水裡社之社域北界為何？上文提到位於臺地上之三塊厝仔庄，及斷層線附近之潭仔墘為水裡社域範圍；兩地以北之南勢坑庄、斗抵，及山腳庄以北之鴨母寮庄、安良港一帶則為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範圍；然安良港亦為水裡社所屬社地，只是遷善社佔了十分之八，而水裡社佔十分之二。<sup>92</sup>此外，依《臺灣土地慣

<sup>86</sup> 水裡社佔有十分之八，中北大肚社佔有十分之二。參閱《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87</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

<sup>8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68。

<sup>89</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90</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91</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82。

<sup>92</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1-42。此外，書中亦記載中北社屬有安良港土地十分之一。中北大肚社與安良港之間尚隔有水裡社土地，而中北大肚社竟領有此地，此現象頗令人難理解。而劉澤民對此提出之可能解釋為：乾隆初年楊興祖(三祐)明買四社土地，是向四社購買，而鴨母寮庄案經水裡社告官，於乾隆 7 年審斷(楊興祖)還田七十甲，既是向四社購買而還地之後，四社之中

行一班》所載，遷善社與水裡社同樣屬有南勢坑庄全部之地，<sup>93</sup>筆者認為兩社似乎不太可能都領有南勢坑庄全部土地，而未作劃分，故對此再作進一步之探討，發現舊大字南勢坑包括有下列幾個聚落：三角仔(今沙鹿鎮南勢里)、六路厝(今沙鹿鎮六路里)、埔仔(今沙鹿鎮埔仔里)、鹿仔港寮(今沙鹿鎮三鹿里南部)、三塊厝仔。<sup>94</sup>其中六路厝<sup>95</sup>及三塊厝仔為水裡社所屬社地，因而本文推斷南勢坑庄在三塊厝仔及六路厝以南應為水裡社所屬，以北為遷善南、北二社所屬。綜上所述，水裡社域北界是在臺地上之六路厝、三塊厝仔庄，往西到平原上之潭仔墘、山腳庄及鴨母寮庄、安良港一帶，此線以北則為遷善南、北二社之社域範圍。

依上文之討論，南寮為水裡社與中、北大肚社所共有社地，而塗葛堀及水裡港一帶(今龍井鄉麗水村)亦為水裡社所掌管之地。<sup>96</sup>因此，若以南寮為起點，水裡社之社域南界是在南寮往西到水師寮(今龍井鄉龍崗村，近龍井街區)、三塊厝庄及塗葛堀一帶，與南邊屬中、北大肚社域之井仔頭庄、犁份、田中央、茄投庄

---

之中、北社自有可能取得部分土地，但其數量不多，故其數量僅為鴨母寮安良港土地之十分之一而已。不過筆者認為前述乾隆 2 年楊興祖所購買之四社草地，或許指的是大肚中、北、南社及水裡社，但地契中並未言明此草地位於何處，而乾隆 7 年之地契中雖可看出鴨母寮庄為水裡社所屬，且也提到楊興祖此人，但是似乎無法將之直接推論鴨母寮庄即包括在楊興祖當初所買之四社草地。參閱《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62；《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4、342。

<sup>93</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94</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57-158。

<sup>95</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96</sup> 不過在咸豐元年(1851 年)之地契中，有遷善南北社番等人將坐落「梧棲塗葛堀港」之地給林元龍開墾；以及道光 14 年(1834)，大肚中社業主阿綿九將坐落「水裡港」之塭地給王穆開墾。由這兩張地契來看，塗葛堀一帶不只是水裡社所獨有，遷善南、北二社及大肚中社也都來「攪一腳」，似乎此地為遷善南、北二社、水裡社及大肚中社所共有之地，而令人意外的是遷善南、北二社竟在其社域範圍外有一所屬地，其與塗葛堀間尚隔有水裡社之社地。至於各社在塗葛堀所分管之地要如何區分，因再無相關之地契資料供分析，故無法再作探討。劉澤民在對大肚社域之研究中也注意到此一現象，他提出的可能解釋為是否本地道光年間大風雨，水沖沙壓，地界混亂所造成，不過他也認為此仍待進一步考證。參閱《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3；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52；《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86；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64。

及福頭崙庄相鄰。

綜合上述，水裡社之社域範圍東到大肚臺地上三塊厝仔庄、南勢坑庄、新庄仔庄，而其東界在南寮一帶與貓霧揀社相鄰；西到斷層線附近潭仔墘、山腳、龍目井庄，及斷層線以西平原上之山腳庄、三塊厝庄，更往西到臨海之頂蚵寮一帶；南由南寮往西到水師寮、三塊厝庄及塗葛堀一帶與中、北大肚二社相鄰；北到臺地上六路厝、三塊厝仔庄，及平原上之潭仔墘、山腳庄及鴨母寮庄、安良港一帶與遷善南、北二社相鄰。

## 四、大肚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 (一)社名

關於大肚社名之記載，首先由清代地方志書來觀察，在康熙年間編修之《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及《諸羅縣志》中記載均為「大肚社」，<sup>97</sup>而在乾隆6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首見「中大肚社」、「南大肚社」及「北大肚社」之稱呼，其後編修之《重修臺灣府志》及《續修臺灣府志》也均沿用上述之稱呼。<sup>98</sup>由此觀之，直到乾隆年間以後才出現北大肚社、中大肚社、南大肚社之區分。不過若由契約文書之記載，雍正7年(1729)已有簡琳芳向「南大肚社」愛箸魯霧墾埔地，<sup>99</sup>似乎大肚北、中、南三社之區分在雍正年間已出現。

若再由康熙中葉繪製之臺灣輿圖來看，已明確標示出北大肚社、中大肚社、南大肚社之名稱及其位置，因而大肚北、中、南三社之區分在最遲在康熙年間應已出現。那是否可上溯至更早之年代？依據翁佳音對 Quata(大肚番王)之研究，

<sup>97</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38；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44；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31。

<sup>98</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頁82；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坊里，頁71；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坊里，頁81。

<sup>9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59。



圖 2-7 水裡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他考證出荷蘭時代文獻中紀錄之 Dorida Amicien Dorida Babat 及 Dorida Mato 三村落，事實上就是清代文獻上的大肚北、中、南三社。<sup>100</sup>由此觀之，大肚北、中、南三社之記載及區分，在 17 世紀中葉（1645）荷蘭統治時期已出現。

## (二)社址

透過清代繪製之臺灣輿圖來觀察大肚北中南三社之位置，在康熙年間 臺灣輿圖 中明確標示出北大肚社、中大肚社及南大肚社。而乾隆年間 臺灣輿圖 中只標示出北大肚社、南大肚社，未畫出中大肚社。不過透過清代輿圖只能讓我們看出三社之相對位置，並無法顯示出其社址之確切位置。如依《大肚鄉志》之調查，南大肚社址在今大肚鄉社腳村一帶，<sup>101</sup>劉澤民更進一步指出其確切地點為埔仔頂番社，在今社腳村之東部。<sup>102</sup>如依契約文書的記載，咸豐 5 年(1858)之地契中，有社腳庄楊老虎等人將坐落「南大肚社北片」之厝地賣與同庄陳德性兄弟；<sup>103</sup>以及咸豐 8 年(1858)林勇智兄弟將坐落「社腳庄本社內」之厝地賣與楊超。<sup>104</sup>由上述地契觀之，「南大肚社北片」之厝地當位於社腳庄附近，而「社腳庄本社內」指的應即是社腳庄內之南大肚社，因此，南大肚社址為社腳庄一帶應該是可確定的。

至於中大肚社及北大肚社之社址，《大肚鄉志》依當地鄉人之說認為大肚紙廠宿舍過去為大肚社社址，且依據日據初之調查則屬中社，而就三社地望觀察，

<sup>100</sup> 翁佳音將之用荷蘭文寫成 Darida Noot、Darida in't Midden、Darida Suyt，意即北、中、南。

參閱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 154、180。

<sup>101</sup> 陳榮懷，《大肚鄉志》，(臺中：大肚鄉公所，1991)，頁 34。

<sup>102</sup> 依《大肚鄉志》所述，埔仔即可耕而未耕地，在其上故稱埔仔頂。番社在埔仔的上邊，乃有埔仔頂番社之稱。在民國 24 年(1935)的國勢調查時，社腳庄尚有平埔族男 10 人女 6 人，當係遺留者之後裔，今 15 鄰有先住民二戶。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53；陳榮懷，《大肚鄉志》，頁 215。

<sup>103</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0。

<sup>104</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2。

圖 2-8 康熙年間 臺灣輿圖

圖 2-9 乾隆年間 臺灣輿圖

似屬中社，然北社所在，有待日後進一步探討。<sup>105</sup>而劉澤民對中、北大肚社址之研究中，坦言其書中所收錄之古文書並未能提供中大肚社、北大肚社址相關線索，因此也引用了《大肚鄉志》之看法。<sup>106</sup>如果相關史料及契約文書無法提供中、北大肚社社址之線索，<sup>107</sup>若由考古資料來觀察，是否可看出些端倪？本區出土的遺址有山仔腳遺址、頂街遺址、新興村遺址(1000B.P.-350B.P.)，劉益昌認為與北中南三個大肚社有關。<sup>108</sup>山仔腳遺址即為山仔腳一帶(今大肚鄉山陽村)，頂街遺址即為頂街一帶(今大肚鄉頂街村)，新興村遺址則接近社腳一帶。若就三處遺址之相對位置觀之，新興村遺址與南大肚社相關，而山仔腳遺址、頂街遺址似乎應與北大肚社及中大肚社相關。

再依此初步推斷回去比對相關文獻史料，發現在《臺灣土地慣行一班》中記載，山仔腳地方為大肚中社番所有地。<sup>109</sup>若再對照契約文書之記載，道光 12 年(1832)中大肚社阿二元目將坐落「山仔腳庄」之水田典與大宇振；<sup>110</sup>其後光緒 6 年(1880)大肚中北社番阿抵里、阿保落將坐落「山仔腳庄前」之水田典與陳水盛。<sup>111</sup>至於頂街一帶，乾隆 41 年(1776)有北大肚社烏肉漢將坐落「頂街竹圍內」之厝地賣與戴豹；<sup>112</sup>而在嘉慶 11 年(1806)也有大肚中社番婦與黃武所立之永耕字，埔園同樣坐落「頂街竹圍內」。<sup>113</sup>由此可見，山仔腳及頂街一帶應為中、北大肚兩社所共有之地。若將之與考古資料相互驗證，推測中、北大肚兩社之社址位置

<sup>105</sup> 陳榮懷，《大肚鄉志》，頁 59。

<sup>106</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53。

<sup>107</sup> 筆者目前所集之大肚三社契約文書，大部分來源收錄自劉澤民一書，其餘收錄自《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中研院臺史所收藏之古文書。若由這些契約文書來觀察，亦無法直接就此來探討北、中大肚社社址之所在。

<sup>108</sup> 劉益昌，《臺灣中部地區史前晚期文化的檢討》，頁 29、33。

<sup>109</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3。

<sup>110</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9。

<sup>111</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298。

<sup>112</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

<sup>113</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2。

似乎是在山仔腳及頂街一帶，其確切位置則無法得知。

### (三)社域

依契約文書來觀察南大肚社之社域範圍，雍正 11 年(1733)楊秦盛坐落南大肚山腳庄土名轆遇 (今烏日鄉學田、榮泉村)之草地，招徠佃人王及開墾；<sup>114</sup> 嘉慶 6 年(1801)南大肚社愛箸典將坐落社腳南勢之園地賣與陳煥。<sup>115</sup> 因此，南大肚社之社域範圍主要為社腳到 一帶之土地。至於中、北大肚社之社域範圍，劉澤民對大肚社之研究中，指出中、北社社地交錯，無法明確區分其範圍。<sup>116</sup> 若由相關史料及契約文書來分析，確實可發現兩社之社地常見交錯相鄰，很難去區辨清楚。中、北大肚兩社所共有地包括有頂街、<sup>117</sup> 山仔腳庄、<sup>118</sup> 茄投庄(今龍井鄉竹坑、龍東、龍西、田中村)<sup>119</sup>、田中央庄(今龍井鄉田中村)、<sup>120</sup> 北勢份<sup>121</sup> 及位

<sup>114</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

<sup>115</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9。

<sup>116</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55。

<sup>117</sup> 乾隆 41 年(1776)北大肚社烏肉漢將坐落北大肚頂街竹園內之厝地賣與戴豹；然在嘉慶 11 年(1806)大肚中社番同樣在頂街竹園內之地招佃開墾。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12。

<sup>118</sup> 道光 12 年(1832)中大肚社阿二元目將山仔腳庄之水田典與大宇振；其後光緒 6 年(1880)大肚中北社番阿抵汝、阿保落將山仔腳庄前南勢份水田典與陳水盛。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9、頁 298。

<sup>119</sup> 道光 14 年(1834)大肚中社烏鴉九將坐落茄投后南勢木之大租典與陳養；另在光緒 8 年(1882)大肚中北社番高田氏也將坐落茄投庄后南勢木之田地賣與陳國珍。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2、73。

<sup>120</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茄投之田中央、龍目井一帶荒埔為大肚中北社番所屬之地。參閱《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121</sup> 道光 16 年(1836)大肚中社阿六萬連將坐落北勢份之水田典與李紅；同年亦有大肚北社大宇干進將坐落北勢份水田典與李紅。依劉澤民訪問大肚鄉耆老所言，北勢份約當今之臺一線以西、茄投路以南、縱貫線以東、山陽大排以北之地。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6、37、頁 63。

於臺地上南寮、<sup>122</sup>井仔頭庄(今大肚鄉瑞井村)、<sup>123</sup>犁份庄(今大肚鄉蔗 村),<sup>124</sup>而大肚庄(今大肚鄉大肚村)一帶則為中大肚社所有。<sup>125</sup>因此,在南大肚社社域以北,由大肚庄往北抵平原上頂街、山仔腳、北勢份、田中央、茄投,及臺地上南寮、犁份、井仔頭庄一帶之土地為中、北大肚社之社域範圍,而在此範圍內之地目多為中、北二社所共有,很難將之作一明確之劃分。

劉澤民對大肚社界之研究中,引用相關之契約文書作了詳細之討論,指出大肚社東界在乾隆年間由大肚臺地頂井仔頭庄延伸到 庄。<sup>126</sup>而大肚三社之東界為何?在光緒 18 年(1892)之地契中,林永存等人原向貓霧揀社承墾社後山尾大坪頂之山埔地,將之賣與林元龍,<sup>127</sup>契字中提及此山埔地「南與南大肚臺地崁為界,北與岸裡社連界,西與中、北大肚、水裡等社連界,久經奉憲豎立界址石碑,東西分水為界。據牌東之地,屬本社管業,牌西之地,係大肚等社之埔(底線筆者所加)」,由此可看出中、北大肚二社東界是與貓霧揀社相鄰。然契字中提及之分界石碑位於何處?再追蹤其他文獻,在《臺灣土地慣行一班》中記載,中北大肚社領有井仔頭十分之八之土地、蔗 (即犁份庄)十分之七之土地,而貓霧揀社也同樣屬有井仔頭十分之二及蔗 十分之三土地。<sup>128</sup>此外,依據契約文書所載,光緒 10 年(1884)大肚社腳庄陳瀨有山埔一所在井仔頭庄東南畔,年需配納貓

<sup>122</sup> 南寮十分之二土地為中北大肚社所有。參閱《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123</sup> 道光 25 年(1845)大肚中北社番阿媽九將坐落井仔頭庄后之埔地給林永開墾;而《臺灣土地慣行一班》也記載井仔頭十分之八土地為中北大肚社所有。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21;《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sup>124</sup> 光緒 3 年(1877)大肚中北社為鴨九將坐落犁份庄之埔園賣與林元龍;《臺灣土地慣行一班》亦記載蔗 十分之七土地為中北大肚社所有。蔗 其舊名昔作「犁份」,地名由來於昔日曾合股拓墾,以所使用旱犁數折算墾成地積,分配土地,故得名。參閱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68;《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90。

<sup>125</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4。

<sup>126</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60。

<sup>127</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02。

<sup>128</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

霧揀社番租銀。<sup>129</sup>因而位於大肚臺地上之井仔頭、蔗 一帶為中北大肚社與貓霧揀社所共有之地，若由此觀之，上述之分界石碑應當是坐落井仔頭、蔗 一帶。

至於大肚三社社域之南界，劉澤民透過契約文書之探討認為南到大肚溪而與半線社相鄰，社域西界亦為大肚溪。<sup>130</sup>對於社域南界之看法，本文同意其觀點，然對於社域西界，劉澤民並未有較詳細之探討及說明。如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福頭崙庄(今龍井鄉福田村)為大肚社所管社地；<sup>131</sup>另道光 14 年(1834)大肚中社阿綿九與王穆所立之給墾字中，載明地目在水裡港(今龍井鄉麗水村)。<sup>132</sup>可見大肚三社之社域西界往西可延伸到福頭崙庄及水裡港一帶。而大肚三社之社域北界是在臺地上之犁份、南寮一帶，<sup>133</sup>往西延伸到平原上之田中央、福頭崙庄，以北則為水裡社領地。

綜合上述，大肚中、北、南三社社域東到大肚臺地上之犁份、井仔頭庄，往南延伸到臺地南端的 庄一帶，東與貓霧揀社相鄰；西到福頭崙庄及水裡港一帶；南到大肚溪與半線社相鄰；北由臺地上犁份、南寮往平原上田中央、福頭崙庄一帶為其社域北界。此外，在此一社域範圍內三社社地之劃分，南大肚社是在社腳庄到 庄一帶之土地，中、北大肚二社則在大肚庄以北到平原上頂街、山仔腳、北勢份、田中央、茄投，及臺地上南寮、犁份、井仔頭庄一帶之土地。

<sup>129</sup> 《臺灣私法物權編》，頁 995。

<sup>130</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61。

<sup>131</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3-44。

<sup>132</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86。

<sup>133</sup> 南寮一帶為水裡社與大肚中北社所共有地，參見註 86。南寮以南即為犁份一帶，兩地相近。

圖 2-10 大肚社社址與社域範圍



### 第三節、小結

本章首先透過清代文獻輔以近代地理學者的研究，初步呈現出拍瀑拉地域的地形大勢與清代自然景觀，也略述地表景觀因漢人拓墾所生的變化。接著，藉由相關各社之契約文書，分析本區的社群分佈狀態，考定出拍瀑拉四社群之社址位置，也對各社之社域範圍及四至界線做一劃分。依本章之討論，牛罵社社址位在牛罵頭街至西勢一帶；遷善南社位在竹林南、北溪附近（番社埔、北勢埔）；遷善北社位在竹林北溪附近；水裡社在龍目井庄附近；中、北大肚二社在山仔腳、頂街一帶；南大肚社在社腳村一帶。若由此觀之，四社之社址位置均是位於斷層湧泉帶附近，顯示出拍瀑拉各社人在選擇聚居地時，取水方便的斷層帶附近成了理想的落腳處。另外，拍瀑拉各社群間之社地常是相鄰且共有的，有些地目無法劃清其社群歸屬，因而這些社群間之共有地，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社群間的關係。而藉由對社群間社址與社域範圍的釐定，應可作為進一步討論此地社群關係之基礎，而這也是下一章中所要探討之處。

圖 2-11 四社社址與社域範圍劃分



### 第三章、拍瀑拉地域內的社群關係

在本章中將探討拍瀑拉地域內之社群關係，瞭解在此一地域範圍內之社群互動關係，各社群間是否因地緣接近而互動頻繁？其互動形式為何？還是分立而互不相關？依前章中對拍瀑拉各社群社域範圍之討論，拍瀑拉地域內各社群之社地是相鄰的，且時有社群間之共有地，而在此地域內部並未有地理上的阻隔性（地形屬平原），反而往北、往南都有大河（大甲溪、大肚溪）與外界阻隔，往西抵海，往東接大肚臺地，因此拍瀑拉地域深具地理上與外界的區隔性。

由上所述，因歸屬於同一族群，且深具地理上的區隔性與地形的同質性，故在此地域內的社群間彼此應會有密切之互動關係，而內部之社群互動關係為何？存在怎樣的互動往來？是否其內部可再因互動關係的強弱，而區分不同的社群互動群體？上述種種的疑問，都是本章所要探究與瞭解之處。

#### 第一節、各社社餉徵收與職位設置

在本節中，試圖藉由官方對本區社餉徵收與番社中職位之設置，來初步分析其所透露之訊息，看是否反映出社群間某程度之關係？社餉之徵收主要依據清代地方志書之記載，而各社內職位之設置是透過契約文書記載所得。

##### 一、社餉的徵收

清代地方志書中對本區社餉徵收之記載，筆者整理表列如下：

表 3-1 清代拍瀑拉各社社餉之徵收

地方志書	社名之記載	社餉之徵收
《臺灣府志》 康熙 34 年(1695)	半線大肚社、沙轆牛罵社。	半線大肚社徵銀 331 兩 6 錢 3 分 2 釐，沙轆牛罵社徵銀 23 兩 2 錢 8 分 4 釐 8 毫。
《重修臺灣府志》 康熙 51 年(1712)	半線大肚社、沙轆牛罵社。	半線大肚社徵銀 331 兩 6 錢 3 分 2 釐，沙轆牛罵社徵銀 23 兩 2 錢 8 分 4 釐 8 毫。
《諸羅縣志》 康熙 56 年(1717)	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	半線大肚社徵銀 331 兩 6 錢 3 分 2 釐(內柴坑仔、水裡社餉銀附入合徵)，沙轆牛罵社徵銀 23 兩 2 錢 8 分 4 釐 8 毫。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乾隆 6 年(1741)	中大肚社、南大肚社、北大肚社、水裡社、遷善社、感恩社。	乾隆 2 年改則，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二錢)。大肚社並附水裡社番丁共 118 人，遷善社番丁 55，感恩社番丁 46。
《重修臺灣府志》 乾隆 10 年(1745)	中大肚社、南大肚社、北大肚社、水裡社、遷善社、感恩社。	乾隆 2 年改則，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二錢)。大肚社並附水裡社番丁共 118 人，遷善社番丁 55，感恩社番丁 46。
《續修臺灣府志》 乾隆 25 年(1760)	大肚南北中社、水裡社、遷善社、感恩社。	乾隆 2 年改則，額徵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二錢)。大肚社並附水裡社番丁共 118 人，遷善社番丁 55，感恩社番丁 46。
《彰化縣志》 道光 10 年(1740)	大肚社、水裡社、遷善社、感恩社	大肚社並附水裡社番丁，共 118 丁，額徵銀 23 兩 6 錢，感恩社番丁 46 丁，遷善社番丁 55 丁，共額徵銀 20 兩 2 錢。

資料來源：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38、卷五賦役志，陸餉，頁 135。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43-44、卷五賦役志，陸餉，頁 184。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 31、卷五賦役志，餉稅，頁 98-99。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頁 82、卷八戶役，陸餉，頁 200。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坊里，頁 71-72、卷五賦役(二)，戶口，頁 19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坊里，頁 81、卷五賦役(二)，戶口，頁 261。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保，頁 51、卷六田賦志，戶口，頁 176。

由表 3-1 中社餉之徵收可看出，在康熙年間到乾隆初年，沙轆社與牛罵社合為一稅收單位，合稱「沙轆牛罵社」，而大肚社則與大肚溪南之半線社合併為一稅收單位，合稱「半線大肚社」，其中並附柴坑仔社與水裡社。而到乾隆 2 年(1737)清廷採新稅則，番丁改每人徵銀二錢，<sup>1</sup>遷善社仍與感恩社合徵社餉，大肚社則

<sup>1</sup> 明鄭時期每一丁年徵銀 6 錢，到清代改為每丁徵銀 4 錢 7 分 6 釐，且民番同例。此制直至乾隆 2 年(1737)改每丁徵銀 2 錢。乾隆 2 年，詔曰：「聞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餉，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及五、六錢不等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即百姓之丁銀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底線筆者所加）。該督撫可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實力奉行，務令番民均沾實惠」。參閱周璽，《彰化縣志》，卷六田賦，戶口，頁 174。

與水裡社合徵社餉，至於半線社與柴坑仔社則劃分為另一稅收單位，而已不見「沙轆牛罵社」與「半線大肚社」之稱呼。由此觀之，清政府一直是將水裡社附入大肚社合徵，牛罵社與沙轆社合徵，這樣的安排是否顯示大肚、水裡二社之關係較為密切，而沙轆與牛罵二社互動較密切？<sup>2</sup>

由上表也可看出，直到康熙末年大肚社始與半線社分開稱呼，之前兩社一直並稱為「半線大肚社」，不過在此一社名稱呼下，似乎也一直包括了柴坑仔社與水裡社。雖然柴坑仔社與水裡社之稱呼直到康熙末年之《諸羅縣志》始出現，並註明附於半線大肚社內徵收，<sup>3</sup>不過若依徵收之社餉銀額來看，《諸羅縣志》所載半線大肚社並附柴坑仔、水裡社之銀額，與更早之《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相同，因此在康熙末年之前文獻中所載「半線大肚社」應已包括有水裡社與柴坑仔社，有可能為文獻記載之疏漏，未將之列出。亦即「半線大肚社」並非單純只為半線社與大肚社之合稱，似乎可將之視為一稅收單位，其內並附有水裡社與柴坑仔社。<sup>4</sup>

## 二、番社中職位的設置

詹素娟對馬賽三社之研究中，指出馬賽三社在清廷通事／土目制的影響下，

<sup>2</sup> 洪麗完曾由「番俗六考」對沙轆、牛罵社之記述，認為兩社之關係十分密切，此由文獻上所見之現象，如歌謠、飲食習慣，均十分相似（底線筆者所加）。如「番俗六考」中之「牛罵、沙轆思歸歌」及「惟沙轆、牛罵不食牛，牛死委於道旁。」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153註16。

<sup>3</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頁31。

<sup>4</sup> 筆者此看法甚受陳宗仁文章之影響與啟發，陳宗仁在對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之研究中，認為南港社及北港社是清朝政府的賦稅單位，並未實際上存在過。從賦稅性質而言，出現於社餉期結束，與番丁銀期相始終，而廢止於一條鞭法施行後。本文與陳宗仁不同處在於，陳宗仁文中之南港社與北港社並未實際上存在過，而半線社與大肚社是實際上存在。參閱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臺灣史研究》7卷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1-26。

建立了村社間的「從屬關係」。<sup>5</sup>另外，陳宗仁對南港社與北港社之研究，也注意到南、北港社具有類似行政單位的性質，各設有通事，轄下為各社之土目。<sup>6</sup>因此，藉由清廷對番社通事職位之設置，可探討社群間互動關係，及各社間的從屬關係。本文也將透過番社內通事、土目、甲頭、番差等職務之設置，來探討其所顯示之意義，以進一步瞭解拍瀑拉地域內之社群關係。

依契約文書之記載，乾隆 15 年(1750)水裡社土目甘馬轄、大宇及眾白番將長興庄厝後之水田杜賣與何睿，契字中載明在場之知見人為「大肚中北南水四社通事」侯鎮。<sup>7</sup>此外，在乾隆 38 年(1773)南大肚阿眉打拿與漢人馬傑所立之杜賣契中，出現有「大肚四社通事」愛箸之戳記；<sup>8</sup>以及乾隆 41 年(1776)北大肚社烏肉漢將坐落頂街之厝地賣與戴豹，知見人亦為「大肚四社通事」愛箸。<sup>9</sup>此一「大肚四社」應即為「大肚中北南水四社」，為大肚中、北、南三社與水裡社之合稱。此顯示在乾隆年間四社間設有一通事之職位，來綜管四社社務，因此其名稱出現在水裡社之地契，也出現在南大肚社與北大肚社中。<sup>10</sup>由上述通事職位之選任，似可見水裡社與大肚三社間有密切之關係。而與此大肚四社通事設置約同時期，乾隆 33 年(1768)亦見有「大肚中社通事」烏肉典及「大肚北社通事」

<sup>5</sup> 詹素娟，〈地域社群的概念與檢驗：以金包里社為例〉，頁 241-242。

<sup>6</sup> 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頁 9。

<sup>7</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4。

<sup>8</sup> 通事對社番的土地出、出典及出押等，通常由通事(或再加上土目)會同而蓋戳。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4；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頁 392。

<sup>9</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

<sup>10</sup> 此外，在乾隆 33 年(1768)出現有「大肚水裡社土目」阿勞萬老兀之戳記，顯示在兩社間亦合設一土目，不過筆者再翻查其他地契及文獻，並未再見有此一職位之記載，且同時期乾隆年間水裡社有土目，北中南大肚三社亦有土目，是否此一職位為一總土目之角色？或為一短暫之職位設置？此疑問須待更多資料之發掘，方能釐清。上述地契引自劉澤民《大肚社古文書》一書中記載鐘金水收藏乾隆 33 年(1768)阿六萬老兀立給佃批中，有一方「正堂成給大肚水裡社土目阿六萬老兀戳記」，書中並未詳錄地契內容。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69。

之記載。<sup>11</sup>由此觀之，大肚四社通事之職位，似乎類似一總通事之角色，管理四社社務，其下各社內亦設有通事。<sup>12</sup>

然在乾隆以後之地契及相關文獻中，已不復見大肚四社通事及各社通事之記載，取而代之的是「大肚南水二社通事」及「大肚中北社通事」之設置。由以下之地契來觀察，嘉慶 15 年(1810)水裡社土目阿甲清等人與陳最所立之典契中，中人為「大肚南水二社通事」六仔球；<sup>13</sup>另在嘉慶 17 年(1812)北大肚社阿武典等人將坐落北勢尾之水田典與郭強，知見人為「大肚中北社通事」大宇漢泰。<sup>14</sup>由是觀之，嘉慶年間以後官方對通事的選充，是將南大肚社與水裡社編為一組，北大肚社與中大肚社編為一組，取代原先水裡社與大肚北、中、南三社合為一通事之設置。此外，除通事之職位，亦見有「大肚中北社甲頭」<sup>15</sup>「中北大肚社番差」<sup>16</sup>及「大肚南水甲頭」<sup>17</sup>之設；而各社亦有土目、社主、社首等職務。<sup>18</sup>

<sup>11</sup> 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四），《臺灣文獻》34 卷 4 期（1983），頁 85。

<sup>12</sup> 清代官方檔案中曾出現有大肚南社通事楊元祖之記載，楊元祖之名應為漢人；另翻查相關文獻及契約文書，並未有水裡社通事之記載。參閱梁志輝、鍾幼蘭主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七：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187。

<sup>13</sup> 在嘉慶 18 年(1813)南大肚社阿眉賀老向周文賜所立之胎借銀字中，出現中人為「南大肚管水裡」阿甲天之記載。「南大肚管水裡」為何職位？筆者無法確定，應是類似於南水二社通事之職務，兼管南大肚與水裡社。由此也可看出南大肚社與水裡社之關係密切。參閱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8；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1。

<sup>14</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0。

<sup>15</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2。

<sup>16</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2。

<sup>17</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42。

<sup>18</sup> 戴炎輝認為社主、社首、社長這些職位，從文字看來很相似，但其職務是否相同，則不敢斷言。番社給墾字內，社首或社主排在通事、土目之上者有之，在其下者亦有之。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頁 402。以下為筆者由契約文書整理出水裡社與大肚三社土目、社主或社首等職位之設置：

社名	年代	職位	人名	資料來源
水裡社	乾隆 10 年 (1745)	土目	大宇、甘仔轄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

由上所述，乾隆年間原設有大肚四社通事綜管北大肚、中大肚、南大肚與水裡四社社務，其下各社亦設通事。在嘉慶以後則劃分為中北二社通事與南水二社通事，其下亦分設有甲頭、番差等職務。由職位之設置，顯示在此大肚四社內部，似乎可將中、北大肚社劃為一互動群體，南大肚、水裡社則為另一互動群體。<sup>19</sup>

至於牛罵社與沙轆社內職位之設置，牛罵社內有通事、土目及甲頭之職位：道光 20 年(1840)感恩社耆番阿鳳班、「感恩社甲頭」生仔班等人向楊芷所立之胎借銀字中，在場知見人為「感恩社通事」阿眉目義、「感恩社土目」媽慶泰。<sup>20</sup>而沙轆社有南北社之區別，然兩社亦分設通事，嘉慶 10 年(1805)楊士帳與王唇所立之契約中，載明荒埔及厝地承墾自「遷善南社通事」六仔武葛；<sup>21</sup>及嘉慶 25 年(1820)楊光港等人將坐落南簡庄外之水田賣與同發號家族，須年納「遷善北社

	嘉慶 25 年 (1820)	社主	百大宇志目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27
北大肚社	乾隆 48 年 (1812)	土目	阿眉略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6
	嘉慶 21 年 (1816)	社首	阿武典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4
中大肚社	乾隆 41 年 (1776)	土目	烏鴉州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
	道光 12 年 (1832)	社主	大宇九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9
南大肚社	乾隆 25 年 (1760)	土目	蒲氏賓祿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
	道光 26 年 (1846)	社主	愛箸	《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47

<sup>19</sup> 中、北大肚二社如前章所述，因其位置相近，且許多社地為共有，因此兩者之關係至為密切，合設一通事極為合理。然南大肚社與水裡社間尚隔有中、北大肚二社地之犁份與井仔頭庄，因此兩社合設一通事較令人難理解。是否兩社間尚有共有地，此仍待釐清。

<sup>20</sup> 在此一地契中，載明烏肉斗為感恩社南社主，阿甲罵為感恩社北社主。這是頭一次在地契中將感恩社分為南北社之記載，若再查證相關文獻及爾後契約文書之記載，未再出現此南北社之區分，是否這樣的區分只為暫時，其後便合為一社？還是此為遷善南、北二社之誤？對此，因再無資料佐證，目前尚無法釐清。參閱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3 輯 652 號。

<sup>21</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31 號。



通事」大租谷；<sup>22</sup>此外，也有社主、土目、甲首、番差等職務之分別。<sup>23</sup>由此看來，遷善南北二社有各自之行政組織，其社務是分治的。然在地契中曾出現有「沙轆遷善社世傳社主」愛箸祿之戳記，<sup>24</sup>此沙轆遷善社所指應為遷善南北社之合稱，似在兩社間合設有一社主之職；社主職位既為世傳，顯示兩社官方雖分設通事，然歷史上之關係應極為密切。而在牛罵、沙轆二社之上是否另設有一通事之職，筆者再查證相關之地契及文獻，並未出現此一職務之記載。因而牛罵與沙轆二社各設有通事、土目，然在其上並未如大肚、水裡二社有一總通事之職。

本節藉由社餉徵收與職位設置來分析各社間之互動及統屬關係，發現在拍瀑拉地域內大肚與水裡二社間一直合併徵收社餉與合設通事，其後再分化為大肚南水二社通事與大肚中北社通事，似乎可將南大肚與水裡社視為一互動聯結群體，中、北大肚二社則為另一互動聯結。而牛罵社與沙轆社社餉亦為合併徵收，然兩

<sup>22</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23</sup>

社名	年代	職位	人名	資料來源
遷善南社	光緒 20 年 ( 1894 )	南勢社主*	六仔甘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7
	同治 2 年 ( 1863 )	土目	烏蚋大甲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50.D50.019
	嘉慶 16 年 ( 1811 )	甲頭	阿邵	王仲孚編纂，《沙鹿鎮志》(臺中：沙鹿鎮公所，1994)，頁 124
	嘉慶 20 年 ( 1815 )	番差	六萬罵	《沙鹿鎮志》，頁 124
遷善北社	咸豐元年 ( 1851 )	社主	六管祿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52
	道光 22 年 ( 1842 )	土目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咸豐元年 ( 1851 )	甲首	大宇瓦厘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52
	道光 15 年 ( 1835 )	番差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契字中記載為「遷善南勢社社主」，這是首次出現此社名，似乎指的是遷善南社，不過仍無法完全確定，再查證其他契字，未出現與南勢社相對之北勢社稱呼，否則應可確定所指即為遷善南社。

<sup>24</sup>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7。

社間並未合設通事之職位。下文中，將再藉由契約文書，來進一步探討社群間的互動整合，分析其所呈現社群關係為何？是否可與上述之觀察相呼應？

表 3-2 各社通事、土目等職位之設置

乾隆年間 大肚（中北南水）四社 通事 各社亦分設通事	乾隆以後 大肚中北社通事 （大肚中北社甲頭、番 差）	大肚中社土目、社主
		大肚北社土目、社首
	大肚南水二社通事 （大肚南水甲頭）	大肚南社土目、社主
		水裡社土目、社主
感恩社通事	感恩社土目、甲頭	
遷善南社通事	遷善南社土目、社主、甲頭、番差	
遷善北社通事	遷善北社土目、社主、甲首、番差	

## 第二節、社群關係的分析

本節將運用相關各社之契約文書來探討社群間的互動整合關係，所分析的主要視角為社群人際間的互動往來，亦即探索各社人是否有介入他社的土地出、典當、買賣等行為；另外，也將藉由各社間共有地之探討，分析其所顯示之社群互動關係。

由上節的分析，初步可將中大肚社與北大肚社視為一互動聯結，南大肚社與水裡社則為另一互動聯結；至於沙轆社與牛罵社之關係則較不明確。以下將以此初步區分，再作進一步之探討。

### 一、「大肚四社」內部的社群關係

#### （一）中大肚社與北大肚社

中、北大肚二社之關係如前所述，除合設一通事外，兩社之社地交錯共有，很難去區辨清楚（參見第二章中對中、北大肚社域的討論），故兩社之關係應極為密切。以下將再以契約文書之記載，來探討兩社之互動關係及其形式。

表 3-3 中、北大肚二社人之土地典當買賣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乾隆 41 年 (1776)	永社盡賣契	北大肚社烏肉漢	戴豹 為中大肚中社土目烏鴉州	北大肚頂街竹圍內
嘉慶 11 年 (1806)	永耕字	大肚中社番婦	黃武 大肚北社番阿二打那 北 大肚社阿甲報旦戳記	頂街竹圍內
嘉慶 17 年 (1812)	典契字	大肚北社烏肉牛罵	郭理 保記大肚中社土目愛箸 武澤 為中大肚中社土目 眉打那	北勢尾
道光 16 年 (1836)	典契	大肚中社阿六萬連	李紅 北大肚社番阿甲昭君	北勢份
同治 11 年 (1872)	轉典田契字	大肚中社業主番婦 阿妹振、阿二水	陳雅 業主北大肚社阿伯振戳 記	山仔腳庄

資料來源：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12、19、36、56。

由表 3-3 可看出，中、北大肚二社人從乾隆迄同治年間互相涉入彼此間的土地典當買賣，在地契中擔任中人或是見證人的角色，足見兩社人之互動頻繁且關係密切。而在上表道光 16 年（1836）大肚中社阿六萬連與李紅所立之典契中，載明水田四至範圍「東至阿甲蒲旦田界，西至阿甲昭君田界，南至車路界，北至小圳界」。阿甲昭君為北大肚社人，而與中大肚社人阿六萬連之水田相毗連，顯示出兩社人不僅在土地所有上，包括居住也出現混居比鄰的現象。

在道光 25 年（1845）之給墾永耕字中，「大肚中北社番」阿媽九將坐落井仔頭庄後之埔地給林永開墾，<sup>25</sup>這是所收地契中首見大肚中北社番之稱呼。其後光緒 3 年（1877） 4 年（1878） 6 年（1880） 8 年（1882）與 15 年（1889）等地契中，也相繼出現有大肚中北社番之稱呼，<sup>26</sup>不過仍見有中大肚社番與北大肚社番之記載。似乎在兩社人各自之社群認同外，尚有一大肚中北社之認同，因此會出現中北大肚社番之自稱，也可知兩社社名時而合稱，時而分開。

<sup>25</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21。

<sup>26</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83、84、85、86、168；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67、73、78、頁 298。

種種訊息顯示，中、北大肚二社之互動關係至為密切，表現在居住與土地所有，出現混居比鄰的現象；亦常見兩社人互相涉入彼此間的土地典當買賣。

## （二）水裡社與南大肚社

水裡社與南大肚社合設一「大肚南水二社通事」，此一職務分別出現在兩社之契約文書中。嘉慶 15 年（1810）水裡社土目阿甲清、大宇眉箸等人將坐落北勢木崁下之塢田典與茄頭庄陳最，契字中載明中人為「大肚南水二社通事」六仔球。<sup>27</sup>嘉慶 20 年（1815）南大肚社番婦打姨斗肉等人因社人壽終無喪費，而將坐落社腳庄北勢山坑溝墘之山園賣與陳等加，契字中亦出現有「大肚南水二社通事」六仔球之戳記。<sup>28</sup>通事六仔球分別出現在水裡社與南大肚社之地契中，顯示出在清廷通事制度的編組下，似乎加深了兩社間的互動往來。

此外，道光 21 年（1841）賴氏兄弟所立之鬮分書中，也透露出南大肚與水裡社之關係，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一長房添壽鬮分營盤後頂黃振盛水田壹段壹甲柒分，年納供谷貳石貳斗貳升；藍大租肆石；中大肚番大租谷參石肆斗（底線筆者所加）。又頂永富拾坵仔水田壹段伍分肆厘伍絲，帶中大肚番大租谷參石肆斗；貳段除供課大租及應份小租外，尚長谷壹石陸斗捌升應貼佛銀壹拾壹元。又帶全三房光鵬鬮分賴厝部瓦厝併草厝；新厝仔草厝各一列；大墩中街外廁池貳口；后隴仔瓦厝半座，一切墾地浮沉木石在內批炤。一次房維城鬮分得營盤後頂賴撥水田貳段壹甲捌分，年納南水社大租谷壹拾石滿正（底線筆者所加）。除大租及應份小租外，尚長谷貳石，應貼出佛銀壹拾參元參毫又全第四、伍房鬮分得頂窰瓦厝壹座，連東西內外茅瓦護

<sup>27</sup>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8。

<sup>28</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3。

厝；四週竹圍果子水井菜園浮流沉木石在內批炤。<sup>29</sup>

契字中載明營盤後之水田需分納「中大肚社」與「南水社」大租谷，「南水社」應即為南大肚社與水裡社之合稱，而營盤附近似應為南、水二社與中大肚社之共同所有地。<sup>30</sup>由上述地契，顯示出南大肚與水裡社之關係密切，因而共同招徠漢佃開墾位於營盤後之共有地，且須向兩社合納番大租。然並未再發現兩社有其他之共有地，似乎兩社間尚隔有中、北大肚二社，故未出現居住與土地所有混居比鄰的現象，其關係不若中北大肚二社般緊密。

由上述之討論，「大肚四社」內部關係顯示出中北大肚二社關係密切，而南大肚社卻與水裡社較有互動關係。中、北大肚二社雖在清廷的治理下合設一通事，然筆者認為兩社之互動關係產生非主要是此緣故，而是因居處與土地比鄰，使得兩社之人際往來極為密切；而大肚社與水裡社關係之建立似乎是較受官方政策（合設一通事）的影響所產生，<sup>31</sup>故地契中未出現如中、北大肚二社般緊密的人際互動。<sup>32</sup>

<sup>29</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41。

<sup>30</sup> 此一共有地之出現，似乎也部分解答了筆者上述之疑問，參見註 19。營盤位於何處？筆者查照《臺灣堡圖》，發現在三社社域範圍內營盤地名有兩處，一在頂街與街尾間有「營盤內」（今大肚鄉頂街村）之地名，另一在社腳庄東南方附近之「營盤埔」（今大肚鄉營埔村）；「營盤內」附近為中、北大肚二社領域，「營盤埔」則為南大肚社之領域。筆者認為，契字中記載之營盤較有可能指的是「營盤內」，因為「營盤埔」距離水裡社與中大肚社較遠，兩社似乎不太可能在南大肚社領域內尚有一共有地。

<sup>31</sup> 此導引出一問題，即官方的政策施行是否是依原有之社群互動？還是政策施行影響或型塑了社群關係？對上述問題，受限於所收集之文獻史料，本文無法全面釐清，明確解答孰為因果的問題。

<sup>32</sup> 至於南大肚社與中、北大肚二社是否有互動關係？在乾隆 48 年（1783）南大肚社番婦阿武雞與楊文老所立之杜賣契字中，載明中見人為女婿大肚北社土目阿眉略。大肚北社阿眉略為南大肚社阿武雞之女婿，透露出兩社人間有姻親上之關係，不過目前只發現此孤證，並未再有相關之契約文書記載兩社間的互動往來，對兩社之關係無法再做探討。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6。

### （三）貓霧揀社與大肚社、水裡社

貓霧揀社之語族分類歸屬於巴布薩族（Babuza），乍見似乎與拍瀑拉族的大肚社、水裡社不會產生互動關聯，然語族之分類是日治初期始出現，清代是以社為一單位及稱呼，因而現今語族之分別應不會成為清代社群間互動的藩籬。在前一章中對水裡社域的討論中，已發現貓霧揀社與水裡社、中、北大肚社間有一共同所屬地；加上其位處大肚臺地之東麓，西邊領域與中、北大肚社及水裡社相鄰，因而在地緣接近的情況下，貓霧揀社是否與大肚社及水裡社有互動關係？首先來看大肚社與貓霧揀社之關係，光緒 11 年（1885）貓霧揀社番社長都舉旺、業戶愛箸、番親烏義等所立之給墾荒山字，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立給墾荒山字人貓霧揀社番社長都舉旺，業戶愛箸，番親烏義等，有承祖父禁嶺山一所，址在大肚下井仔頭庄南畔（底線筆者所加），東至大坑界，西至車路界，南至竹篙崙短崙坑界，北至拔仔崙坑界，四至界址明白為界。此山嶺名曰禁嶺，因先祖禁下栽種，以為風水之需。奈於今荒廢已久，眾番遷移。是以眾番親對祖上爐前議許憑出賣，爰出托中引向與趙順芳、李禎祥、養性齋林九等出首承墾，同中三面議定價銀十八大元各七兌正。.....<sup>33</sup>  
光緒十一年二月 日。

代筆人大肚社番土目

為中人大肚社番丁

大肚社番長（底線筆者所加）

立給墾荒山契字業戶

番親

由這份地契可以看出，大肚社人涉入到貓霧揀社與漢人間的土地給墾，在契字中扮演代筆人及中人的角色。而大肚社人會介入貓霧揀社的土地給墾，應該與

<sup>33</sup> 《臺灣私法物權編》，頁 998。

井仔頭庄一帶為兩社之共同所屬地有關，<sup>34</sup>也代表兩社間似乎有人際間的互動往來。<sup>35</sup>因再無相關之契約文書供分析，對兩社之關係，初步推斷為表現在兩社之共有交集地；及在土地契約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

而貓霧揀社與水裡社之關係，可由道光 24 年（1844）之契字來觀察，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立給永耕山園埔字水裡社番阿春毛龜等有自己應份得本社西北勢（底線筆者所加），坐落土名虎頭山崙山園一坵；併帶山埔，東至賴家界，西至何家界，南至阿眉毛龜園為界，北至山坑為界，四至界址明白為界。今因乏銀別置，將此山園及山埔托中貓霧揀社番光艷、阿眉突引就給付與漢人林四義觀出首永耕（底線筆者所加），前去掌管，時值價銀壹拾貳大員正足訖，收入其山園及山埔踏明四至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任其開築墳墓安葬栽插樹木，永為實業。.....<sup>36</sup>

為中光艷

阿眉突

在場蔭仔二澤

祿水毛龜

代筆洪進拔

道光貳拾肆年拾壹月 日立給永耕字阿春毛龜

由地契內容看出，貓霧揀社番光艷、阿眉突兩人引介漢人林四義給水裡社番阿春毛龜，開墾坐落水裡社西北勢之山園；亦即貓霧揀社人在水裡社與漢人之土地契約中，扮演一中介者的角色。此一坐落虎頭山崙之山園坐落何處？是否為兩

<sup>34</sup> 另在道光 25 年（1845）之契字中，亦有大肚中北社番阿媽九將祖遺之井仔頭庄埔地，招徠林永開墾。可見井仔頭庄確為兩社之共有屬地。對井仔頭庄之探討，參見第二章中對大肚社域之討論。上述地契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21。

<sup>35</sup> 上引契字中之「番親烏義」是否為大肚社人，契字中並未言明，否則應可證大肚社與貓霧揀社共同招徠漢人開墾共有地。

<sup>36</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68。

社之共同所有地？因無資料以供分析，目前無法釐清。上引地契顯示出，貓霧揀社與水裡社因社地相鄰之故，貓霧揀社人涉入到水裡社的土地契約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

貓霧揀社與大肚社、水裡社分處大肚臺地兩側，且三社間之土地相鄰，甚至有共有交集之處，因而在地緣接近的情況下，也產生一定程度的互動關係，表現在互相涉入土地契約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而三社間的互動整合關係似乎也顯現在道光初年入墾埔里行動中，對於此一問題，將在下一章中論及。

## 二、沙轆社（遷善南、北社）與牛罵社（感恩社）的關係

### （一）遷善南、北二社

在討論沙轆社與牛罵社的關係前，將先對遷善南、北二社之關係做一探討。依前章中對遷善南、北二社社域之分析，兩社間有許多地目相鄰共有，不易劃分清楚，而在土地相鄰交錯的情況下，也常見兩社人將共有之地交付漢人耕墾，下表為整理自地契中記載遷善南北二社共有地 耕給漢人之情形：

表 3-4 遷善南北二社與漢人之土地 耕買賣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備註
乾隆 54 年 (1789)	重給開墾字	遷善南社業戶 大字牛罵、北社 業戶瓦釐良	陳喜、陳岳	斗底後	年納遷善南社大 租銀四大員，北社 大租銀二大員
嘉慶 25 年 (1820)	轉退塏份字	王申塔、王仕盤	紀汝	沙轆寮	自遷善南北社 番
道光 12 年 (1832)	合約字	曾肅堂、蔡媽 居、紀光印等人		南簡庄	魚塏 自遷善南 北社通土業戶眾 番
咸豐元年 (1851)	永耕海招銀 字	遷善南北社番 等人	山腳庄林元 龍	梧棲塗 葛堀港	
光緒 10 年 (1884)	永耕字	遷善南北社通 事、業戶、土 目、番差、甲首 暨眾白番	下厝庄某 號、竹林庄 某同	竹林庄 後土名 大崙	此山崙係遷善南 北社物業

資料來源：《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5。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11 號、249 號。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52



《臺灣私法物權編》，頁 369。

由表 3-4 可看出，遷善南北二社常共同招徠漢佃，開墾兩社之共有地，且在地契內容中，常合稱為遷善南北社，並未將兩社做區分，亦即兩社人是以遷善南北社之合稱來招佃開墾。此外，在光緒 20 年（1894）之杜賣盡根田契中，遷善南社番生阿海將坐落竿蓁林庄前水田賣與楊紹泉，契字內出現有遷善北社通事北勢坑山之戳記；<sup>37</sup>以及光緒 24 年（1898）遷善南社番其仔瓦厘將坐落北勢頭庄下埤之厝地賣與劉罩，中人為遷善北社業戶文瑞山。<sup>38</sup>上述之地契也顯示出兩社人之互動關係，在彼此之土地買賣中擔任知見或中人的角色。

綜上所述，遷善南北二社除社地共有交集外，且共同招徠漢人開墾，也互相涉入彼此的土地買賣中，在在顯示出兩社關係極為密切。

## （二）沙轆社與牛罵社

若依上述之討論來看沙轆社與牛罵社之關係，兩社之關係似乎較不明確，只見社餉合併徵收，並未合設一通事。然若依兩社之位置觀之，兩社之社地緊鄰，遷善北社社域之四甲二、麻踏崙、牛埔仔庄、二 榔及三 榔緊鄰牛罵社域之社口庄及秀水庄，在地緣位置如此接近下，理應會產生社群間的互動，而是否有共有交集地？若由契約文書來觀察，可發現靠近四甲二之竿蓁林一帶為沙轆社與牛罵社之共有交集地。道光 9 年（1829）張來生原 耕遷善北社番田坐落竿蓁林庄後，因乏銀徵還公債，將之交付蔡光福掌管；<sup>39</sup>道光 26 年（1846）遷善南社番全仔大萬、成仔萬芳及阿尾大萬與同發號所立招耕字，水田同樣坐落竿蓁林庄；<sup>40</sup>道光 30 年（1850）感恩社阿萬悅與同發號所立永耕契字，水田一處二坵坐落

<sup>37</sup>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7。

<sup>3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22.D195.008。

<sup>39</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13 號。

<sup>40</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50.D50.11。

竿藁林圳下。<sup>41</sup>由上所述，遷善南北二社與感恩社同樣在竿藁林一帶領有土地，此地為三社間之共有交集地，透露出三社間的互動關聯。

除社地緊鄰與土地共有外，兩社之關係可由以下之地契來觀察，此為 同發號同治甲戌年立錄置業號頭抄總簿（以下簡稱 頭抄總簿）之第十六號文件，<sup>42</sup>，其內容如下：

第拾陸號 道光貳拾年拾月

紀登弁官典來水田犁份半張 甲去佛銀壹千零伍拾元

立典字壹紙并繳上手李家、王家及老契四紙，合共伍紙，址在大庄瓦窯墘。年納感恩社業主、通事大租粟 石，又納遷善南社業主大租谷 石，小租 石（底線筆者所加）。<sup>43</sup>

由上述地契顯示，大庄瓦窯墘一帶應為感恩社與遷善南社所共有之地，故須同時納二社業主番大租，大庄瓦窯墘位何處？大庄為大字地名，其內包括有瓦窯腳（今梧棲鎮大村里）此一聚落，瓦窯腳與瓦窯墘名稱相近，有可能為同一處，或可能是兩地相近。另在 頭抄總簿 第三十九號文件中亦有瓦窯之地名，契字內容如下：

第參拾玖號 咸豐陸年拾月

紀光輝、紀天素轉繳來永耕菜園、水田去佛銀貳百柒拾大員

立轉耕字壹紙并繳上手字貳紙共參紙，址在瓦窯後過溝大圳邊，年納感恩社瓦厘佃大租銀四元（底線筆者所加）。<sup>44</sup>

瓦窯水田、菜園需納感恩社人大租銀，顯示此地為感恩社所有，而瓦窯為何

<sup>4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42</sup> 此文件為清代同發號楊舒昆家族之拓墾紀錄，節錄當時契字的要項，作為家族檔案的存底簿，以防原契遺失。此文件為研究清代牛罵社地域漢人土地開墾的重要史料。參閱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43</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44</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處？瓦窰之地名由來，因其聚落在瓦窰腳之上故得名，<sup>45</sup>故瓦窰應是位於瓦窰腳附近之地名。由上引文件，更證明大庄瓦窰一帶確為感恩社與遷善南社分屬之地。感恩社業主、通事在遷善南北社地域內竟有一所屬地，有可能此地原為遷善社人所有，其後再賣與感恩社，一部份地權移轉到感恩社人名下，故漢人開墾其地時，須同時向兩社納大租谷。<sup>46</sup>以下之地契可再說明兩社可能存在之土地買賣關係，契字內容節錄如下：

立退永耕盡絕字人梧棲港蔡天河有承感恩社番婦阿武憐遺下應份番丁  
水田一段，坐落土名貫在北勢更寮埔，東至廖家犁份田為界，西至車路  
為界，南至愛箸加笠田為界，北至烏臘大由田為界（底線筆者所加），  
 四至界址明白。今因乏銀應用，愿將此田出賣，先盡問房親伯叔兄弟姪  
 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陳連壽觀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議定時  
 出退永耕田價銀玖拾大員正銀，即日全中交足收訖。.....<sup>47</sup>

為中人林長淵、陳叔會

在場人葉至茂

同治柒年拾月

日立退永耕盡絕字人蔡天河自筆

上引之地契顯示出北勢更寮埔一帶之水田為感恩社番婦阿武憐所屬地，北勢更寮埔為何處？依《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書中之觀點，北勢更寮埔為今沙鹿鎮北勢里（沙轆社社域北勢坑庄北勢頭一帶），編者是將北勢更寮埔依其名稱之相近，理所當然將之視為北勢坑庄一帶，然契字中載明土地種類為水田，加上其四至範圍「西至車路為界」，因此不太可能指的是坐落大肚臺地上之北勢坑庄一帶，那可能位於何處？筆者發現在竹林北溪之北，亦即「番社埔」以北一帶有北勢埔

<sup>45</sup> 洪敏麟撰稿，《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一輯，頁 201。

<sup>46</sup> 或許也可推論說大庄一帶為兩社祖傳之共有地，但兩社間尚隔有許多不屬於感恩社領域範圍之地，此似乎不太合理，也令人難理解，因此初步推論說此原因或許為遷善社人將地杜賣給感恩社人所導致。

<sup>47</sup> 董倫岳撰文，《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臺中：梧棲鎮公所，2000），頁 14。

之地名，且此地以西鄰近大車路，因此北勢更寮埔指的應該是此地。北勢埔為遷善南、北二社所屬社地範圍（參見前章中對沙轆社址的討論），而感恩社人卻在此也有領地，其原因似乎與上述之觀察相同，可能亦為遷善社與感恩社人間之土地買賣所導致。

以下之地契進一步再來說明兩社之關係，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立永杜賣盡絕根田契感恩社番婦搭姨悅全孫蒲湧源，有承祖父遺下鬮  
分明買漢人余秀運水田一段（底線筆者所加），經業主文明肆甲貳分正，貫舊社口庄，前年配納大租粟肆拾石正，東至陳楊高田為界，西至高愛箸田為界，南至水溝為界，北至池塘為界，肆至界址明白為界，配大甲溪水併牛罵埤水分給灌溉，今因乏銀別置，先儘問房親叔兄弟侄不肯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楊士俊、有祥等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言議時值田價銀玖百伍拾大員正，銀即日全中交收訖，其田隨附買主前去掌管耕種，永遠為業。<sup>48</sup>

知見（感恩社            圖記）            為中人黃秉南

代筆鄭和降

在場（感恩社通事            戳記）

（感恩社土目烏臘大耳戳記）

乾隆伍拾玖年拾月            立永杜賣盡絕根田契感恩社番婦搭姨悅

孫蒲湧源

胞姪（遷善北社土目烏蚶    戳記）（底線筆者所加）

上引地契為感恩社番婦搭姨悅全孫蒲湧源因「乏銀別置」，將舊社口庄之水田杜賣與楊士俊、楊有祥。而在契字中出現有胞姪遷善北社土目烏蚶之戳記，在契字中似乎擔任在場見證者的角色。地契內容顯示出兩社人間有親戚關係，也似乎代表兩社人間可能有通婚的現象，故感恩社人之胞姪會在遷善社任職土目。

<sup>48</sup> 陳秋坤，《臺灣古書契（1717-1906）》，頁 67。

<sup>49</sup>總之，由此地契顯示出兩社人之密切關係。<sup>50</sup>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發現沙轆社與牛罵社間有密切之互動關係，表現在土地之共有交集，且兩社間似乎存在有土地買賣的情形；以及兩社間有通婚的現象。

### （三）沙轆社與水裡社

沙轆社之社域南界與水裡社相鄰，在此種情況下，是否會產生互動關係？當筆者翻查沙轆社相關地契時，發現有一地契透露出沙轆社與水裡社之關係，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全立永耕海招銀字人遷善南北社番等，社主六管祿、業戶愛箸春長行、  
烏蚋山長行、屯目大宇天福、甲首大宇瓦厘有承祖先遺下海招壹帶，坐  
落土名址在梧棲塗葛堀港（底線筆者所加），東至塹底田為界，西至外  
 海清水墘為界，南至大肚溪尾為界，北至本社下涌溝為界，四至界址明  
 白。今因乏銀公費用，先 問本社番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山腳庄漢  
 人林元龍出首承買，時三面言議定估值海招價銀四百大員銀，即日全中

<sup>49</sup> 筆者推測此可能為感恩社番婦搭姨悅之兄弟或姊妹與遷善北社人通婚，所生之子任職遷善北社土目。另在光緒 8 年（1882）鰲頭街蔡禮物與蔡少山所立之契約中，水田坐落四甲二庄須年納遷善北社番婦阿二悅大租粟；而在光緒 9 年（1883）感恩社通事鰲春華與水碓庄王登晉所立之契約中，載明在場見者為母親阿二悅。兩地契中之阿二悅出現的年代相近，有可能為同一人，然亦可能為同名之誤，筆者尚無法確定，否則應可進一步說明兩社間之通婚現象。此外，嘉慶 13 年（1808）遷善南社番阿媽牛罵全男六萬牛罵招徠漢佃開墾麻園埔北勢頭之荒埔地，阿媽牛罵與六萬牛罵之人名是否與牛罵社有關？是否代表兩社人間有親戚或血緣上的關係？上述之疑問，有待日後進一步之釐清。參閱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3 輯 637 號、第 10 輯 232 號；《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81。

<sup>50</sup> 另外，此地契的特殊性為感恩社人搭姨悅之水田是原買自漢人余秀運，這與一般我們所較常見的土地交易情況不同：漢人向平埔族買地、漢人彼此間的土地買賣。所揭示之意義為在漢番土地交易中，平埔族人亦有主動購置土地的情況發生，不全然都是典賣土地者。感恩社人搭姨悅有能力向漢人購置水田，加上其胞侄為遷善北社土目，顯示其或許為部落社會中地位較高之階級或家族。

親收足訖，其海招隨即踏明界址，交付漢人林元龍前去掌管，永為己業。<sup>51</sup>

知見人番主六仔甘記

為中人張三奇

代書人〔水裡社土目高古文長行記〕

（底線筆者所加）

咸豐元年拾月 日立永耕海招銀字人〔遷善南社業戶愛箸春戳記〕

〔遷善北社甲首大宇瓦厘長行記〕

〔沙轆社屯目大宇天福戳記〕

〔遷善北社番業戶烏蚋山戳記〕

〔遷善北社主六管祿印記〕

上引地契為遷善南北社將坐落梧棲塗葛堀港之海招地，賣與山腳庄林元龍，代書人為水裡社土目高古文。塗葛堀港一帶如依前章中所述，為水裡社與遷善南北社所共有交錯地，似乎也因此緣故，加上鄰近水裡社域範圍，故招徠水裡社土目高古文做為代書人。由此顯示，遷善南北社因與水裡社地相鄰，且兩社間有共有之地，故造成人際間的互動往來。下引之地契也可來說明兩社間存在的人際互動關係，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立杜賣番大租契字水裡社番業戶瓦厘龜律有承祖父遺下應份大租栗壹拾壹石捌斗，土名在新盛山腳庄后番丁配納（底線筆者所加）。今因乏銀要用，愿將此大租栗出賣，先問社內房親伯叔兄弟姪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山腳庄漢人林元龍出首承買，憑中三面議定時值番大租價銀伍拾玖大員正，銀契即日全中交收足訖，其大租栗壹石壹石捌斗隨即交付買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sup>52</sup>

代筆併為中（遷善南社番差逢春武葛長行記）

<sup>5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52。

<sup>52</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65。

（底線筆者所加）

同治捌年 拾月 日立杜賣番大租契字水裡社業戶瓦厘龜律

契字內代書及中人為遷善南北社番差逢春武葛，顯示出遷善南社人介入到水裡社人的土地買賣契約中，<sup>53</sup>也可證兩社人之互動情形。由上引兩件地契可知，遷善南、北社與水裡社間有一共有地，且互相介入彼此的土地契約中，亦即兩社有人際間的互動往來。至於感恩社與水裡社因中隔遷善南北社，距離較遠，似乎未產生互動關係，也未發現有地契記載兩社間之往來。

### 第三節、小結

本章中探討拍瀑拉地域內之社群關係，首先以社餉徵收與番社職位設置為切入點，呈現出水裡與大肚二社間之互動聯結（又可區分中大肚社、北大肚社與南大肚社、水裡社兩互動群體），沙轆與牛罵二社間之互動聯結。接著，再透過契約文書的探討，呈現出的社群互動關係可劃分為：（1）中大肚社與北大肚社（2）南大肚社與水裡社（3）水裡社、大肚社與貓霧揀社（4）沙轆社與牛罵社（5）沙轆社與水裡社。其中貓霧揀社因與水裡社及大肚社地緣接近，且社地相鄰共有，故產生人際之互動；沙轆社與水裡社互動之生成也與上述原因相同。如再做

---

<sup>53</sup> 另在光緒 8 年（1882）大肚中北社番業主為鴨九與林元龍所立之永耕山埔契字中，也出現中人場見為遷善南社番差逢春武葛；另外，大肚中社在水裡港一帶亦有屬地，與遷善南北社屬地塗葛堀相鄰。上述兩點，似乎也可推斷說遷善南北社與中北大肚社間有往來。然目前只發現遷善社人涉入中北大肚社土地買賣之孤證，並未見中北大肚社人也在遷善南北社的契約內出現，因此，無法遽下推論說兩社人間有互動往來；且遷善南北社與大肚社中隔水裡社，距離較遠，在社域不相接的情況下，可能較不會有人際間的互動。遷善南社番差逢春武葛分別涉入到水裡社與大肚中社的土地買賣中，此原因應與買地人同為山腳庄林元龍有關，林元龍為何會不斷的找逢春武葛做代筆人或中人，此現象或許可解讀為漢人家族與部落內上層階級的結合，兩者形成互惠共生的關係？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不過為一值得再深入探究之問題。參閱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84。

### 圖 3-1 拍瀑拉地域鄰近之村社

資料來源：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頁 47。



進一步之闡釋（或說想像），或許可將大肚、水裡、貓霧揀等社視為一大的社群互動圈或互動群體，透過外部或內部各種政治、社會或經濟等因素的互動與運作，將此三社整合為一；而牛罵、沙轆社為另一互動群體。然兩地緣互動群體間，並非截然劃分，互不相聯繫，仍可看到沙轆、水裡二社因社地相鄰之故，存在有人際間的互動。

透過對拍瀑拉地域內社群關係的討論，可得出以下三點：

- （1）社群間的互動可跨越社群、語族間的界線，以及官方的編制（通事／土目制）。
- （2）社群間在地緣接近（表現在社地的相鄰），或社地共有交集的情況下較會發生經濟或人際的互動關係。
- （3）其互動形式常表現在各社人際間的土地買賣行為，或涉入到彼此的土地契約中，以及有通婚的現象產生。

由社群的互動聯結關係顯現出同一語族、同一均質地理區內之差異性，似乎整合出兩個關係程度不同的互動聯結群體。在下兩章的討論中，將再由另一面向切入——漢人在此一地域內的拓墾進程與拓墾方式，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社土地流失問題——來探討地域空間內部差異性的問題。

## 第四章、拍瀑拉地域的漢人拓墾

本章第一節中，將對拍瀑拉四社群漢人的入墾分別做討論，主要在探討漢人在拍瀑拉各個社群地域的拓墾路線與進程，了解漢人在本區的拓墾大勢。第二節中，將探討漢人在本區的拓墾組織與類型，分析漢人本區的拓墾方式為何，以及是否顯現出內部的差異性。

### 第一節、漢人的拓墾進程與路線

#### 一、牛罵社地域

由郁永河與黃叔璥對牛罵社附近自然景觀的記述(參見第二章第一節中的引文)，顯示在康熙年間，本區仍少見漢人的蹤跡。不過若由族譜資料記載，康熙末葉入墾者有晉江縣人蔡子玩、蔡繩鑄、蔡繩欽及南安縣人楊鳳，並在牛罵社西方之口處（即社口地方）形成村莊。<sup>1</sup>亦即社口一帶為漢人最先選擇居住與開墾處，其後逐漸東進至西勢。<sup>2</sup>雖康熙末年已有漢人入墾記錄，然漢人全面性的進入牛罵社地域拓墾，應是在雍正年間以後。<sup>3</sup>雍正 11 年(1733)，漢人林元璜、盧

<sup>1</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47-148。

<sup>2</sup> 楊玉姿，清代牛罵頭地區的開發，頁 73-74。

<sup>3</sup> 雍正朝一般被認為是較鼓勵開墾之朝代。施添福對竹塹地區的研究中，認為雍正朝是清廷治理臺灣 212 年間，較為積極鼓勵開墾的朝代之一。由於拓墾的主客觀條件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些有利的條件包括：（1）海禁漸嚴（2）積極鼓勵開墾（3）允許搬眷入臺（4）設官增兵。John Shepherd 則認為雍正朝在移民、稅收、開墾、官治與軍防的擴編以及米糧出口至中國東南沿海等各方面來看，都顯現出支持殖民化的政策（pro-colonization policies）（原文如下：Pro-colonization policies in the areas of immigration, taxation, reclamation, extension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s, and rice exports to the southeast coast all won favor at court in the later years of Yung-cheng reign.）。然柯

永清、曾氏鴻、洪紹澤、林勳臣、楊賢、陳鑽、張乃成等人向感恩社業戶蒲氏悅承墾秀水庄、三座庄（即三塊厝庄）、客庄、橋頭庄、田寮庄、後庄、社口庄、山下庄、水碓庄、上涌庄、下涌庄、青埔庄等十三庄地。此十三庄地已幾乎全面涵蓋牛罵社地域平原區的土地，顯示出漢人在雍正年間已向牛罵社請墾大量之土地。<sup>4</sup>

依據《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大甲溪南岸的高美庄原為感恩社番居住地，但在乾隆 10 年(1741)，漢人開始移入，拓墾海口庄（今清水鎮高南里）、牛埔庄（今清水鎮高東里）及舊庄（今清水鎮高南里），僅餘番仔寮庄（今清水鎮高北里）仍為感恩社人所掌管居住。<sup>5</sup>由上所述，顯示出平原地區在雍正年間遭大量拓墾後，乾隆年間，漢人再將拓墾的觸角往北延伸到大甲西南岸河口三角洲的高美庄一帶。<sup>6</sup>而大肚臺地上之公館庄、大突寮庄、楊厝寮庄也在乾隆年間便有漢

---

志明由熟番地政策改革此一視角切入，認為雍正朝的地稅改革主要在改革前朝積弊，卻無意間造成鼓勵漢人開墾與熟番地流失的結果。亦即柯志明認為雍正朝關注點在地稅改革，並非鼓勵開墾，世宗信守的基調仍是族群隔離原則。雖柯志明與上述二人觀點有所不同，然不管是有意或無心之失，基本上較之康熙朝，雍正朝確為漢人開始大量入墾的年代。參閱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 卷 4 期（1989），頁 36-37；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0），頁 75-76；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18；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130-131、361-362。

<sup>4</sup> 洪麗完認為此一發展顯然與牛罵社的勢力經大甲西社事件重創後，無力抵擋漢人移民潮有關。John Shepherd 亦曾指出大甲西社事件後，大量的熟番地開放給漢人開墾。事件發生一年後，漢人向牛罵社承墾十三庄（原文如下：Large amounts of land were indeed opened to Han settlement in the years after the rebellion. In 1734 Niu-ma she, renamed Kan-en she, let out land in thirteen villages）。亦即洪麗完、Shepherd 都認為漢人的大量請墾牛罵社地域內十三庄，與大甲西社事件導致勢力消退有關。參閱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14；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132。

<sup>5</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0-41。

<sup>6</sup> 乾隆 6 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記載有「牛罵庄」，此為清代官方志書中對牛罵社地域漢人街庄最早之記載。其後，乾隆 25 年（1760）《續修臺灣府志》記載有「牛罵新庄」。牛罵庄及牛罵新庄為何處？在契約文書中未見記載，另查照《臺灣堡圖》，亦未見二處地名。若再對

人入墾。<sup>7</sup>

除了平原地區相繼墾成「庄」外，牛罵街肆於漢人大量入墾後也漸形成。依據《續修臺灣府志》記載，乾隆 29 年(1764)，今之清水街一帶已形成「牛罵街」。<sup>8</sup>若對照契約文書，乾隆 19 年(1754 年)，漢人已在「牛罵頭街」內買賣瓦店，<sup>9</sup>可見牛罵街肆之形成年代應當早於乾隆 29 年，最遲於乾隆 19 年應已形成。

由上所述，在乾隆年間，牛罵社地域範圍（不論平原、臺地），漢人已全面入墾，而原牛罵社人聚居之番社，也同樣無法抵擋漢人之移居。依嘉慶 25 年(1820)之地契顯示，漢人綠水將坐落「牛罵頭番社內」之瓦厝賣與其宗叔，此瓦厝為承祖父遺下，契內載明「其厝隨時搬空，付銀主搬入居住」。<sup>10</sup>上述地契可看出，最遲在嘉慶年間，牛罵社內已為漢人所移入居住。另外，地契中所載明之四至範圍「東至六仔厝為界，西至箸甲三厝地，南至路為界，北至厝後石為界」。六仔、箸甲三當為牛罵社人名，而漢人所居之瓦厝卻與熟番厝地相鄰，顯示出「漢番混居」的現象。

綜上所述，漢人的入墾牛罵社地域，其進程為：康熙末年最先入墾鄰近斷層湧泉帶的社口、西勢一帶；雍正年間全面性的拓墾平原上的十三庄地；<sup>11</sup>乾隆年

---

照道光 10 年（1830）《彰化縣志》，牛罵社地域已出現三十餘街庄地名，不過仍未見上述二處地名，筆者認為當時牛罵社地域內雖已有多數街庄墾成，有可能地方官對漢人聚落名稱仍不甚清楚，似乎只記載牛罵庄、牛罵新庄。而在道光年間後，才有較詳盡的記錄街庄名。參閱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附），頁 79；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坊里，頁 74；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保，頁 48。

<sup>7</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0-41。

<sup>8</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街市，頁 88。

<sup>9</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9 號。

<sup>10</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46 號。

<sup>11</sup> 若由這十三庄地的空間分布，可發現其主要是沿著大肚臺地沿線斷層帶附近分佈，從北邊的客庄、水碓庄，往南到青埔庄、社口庄。筆者認為漢人選擇此十三庄地拓墾，除了靠近斷層湧泉帶，取水較方便外，似乎也與靠近南北的陸上交通路線有關。這條南北的通衢大路由半線往北到大肚、龍目井再經沙轆、牛罵頭、青埔而至大甲溪南岸，為清代本區主要的交通路線（參見第二章註 44 中之引文），而這條路線的走向也是沿著斷層湧泉帶附近。漢人在進入牛罵社地域開墾

間再陸續拓墾大甲溪南岸之高美地方與臺地上公館庄 大突寮庄 楊厝寮庄等地。

## 二、沙轆社地域

康熙 61 年（172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中，對沙轆社曾有以下之記載：

辛丑七月，大風，糯黍歉收，間為別番傭工以糊口。土官嘎即，目雙瞽，能約束眾番，指揮口授無敢違。社南地盡膏腴，可種水田。漢人有欲售其地者，嘎即佯許之；私謂眾番曰：「祖公所遺，祇此尺寸土，可耕可捕，藉以給糴、輸餉課；今售於漢人，侵占欺弄，勢必盡為所有，闔社將無以自存矣（底線筆者所加）！我與某素相識，拒其請將構怨，眾為力阻，無傷也」。卒不如其請。<sup>12</sup>

上引文字記載漢人欲向沙轆社承墾或購買土地，土官嘎即雖警告社人，最後仍無力阻止。上述之記載雖未明指漢人欲向沙轆社人買何處地，不過可見在康熙末年已有漢人入墾沙轆社地域範圍。<sup>13</sup>雍正年間以後的漢人入墾，《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雍正初年漢人嚴玉璋向沙轆社土目蒲氏宇加著 得南簡庄一帶土地，其後乾隆初年漢人再向遷善社承墾大 榔庄附近埔地。<sup>14</sup>乾隆年間的漢人拓墾，由目前所收關於沙轆社之契約文書，整理表列如下：

表 4-1 乾隆年間沙轆社地契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土地種類	地點	今地點	資料來源
乾隆 8 年 （1743）	出店地約 字	遷善社番大 宇眉勿	莊通	店地			《清代臺灣大 租調查書》，頁 815

時，自然也會循此交通路線進入，然後再逐步往此大路以西附近的土地拓墾。因此，漢人選擇十三庄地拓墾，除了靠近斷層帶取水方便外，似乎也因為靠近南北的通衢大路，具有交通上的易達性。

<sup>12</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五 番俗六考，頁 128-129。

<sup>13</sup> 另依族譜資料，康熙 49 年（1910），已有泉州人周大養抵沙轆地區拓墾。參閱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54。

<sup>14</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0、41。

乾隆 18 年( 1753 )	給開墾字	南社番大宇牛罵	王名純等十人	山埔	泉茂庄*		同上，頁 453
乾隆 22 年( 1757 )	賣店契	黃榮周	吳三寅	瓦店	沙轆街溝仔墘	沙鹿街	同上，頁 886
乾隆 31 年( 1766 )	杜賣盡根店契字	楊光彩	陳基	瓦店	沙轆街中溝仔墘	沙鹿街	同上，頁 888
乾隆 32 年( 1767 )	給批墾字	遷善南社番六仔武葛	鄭挑	荒埔、園	竹林後橫山頂	沙鹿鎮竹林里	同上，頁 459
乾隆 34 年( 1769 )	典契字	沙轆社番大宇九	張萬	埔園	麻園埔大錢握頭**		《沙鹿鎮志》，頁 119
乾隆 36 年( 1771 )	洗找字	林桂昌、林桂統	陳旺生	水田	三 榔庄	清水鎮 榔里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15.D189.230
乾隆 45 年( 1780 )	給墾批字	遷善北社番萬感	洪文由	塭埔	南簡庄	梧棲鎮南簡里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06 號
乾隆 54 年( 1789 )	給永付地基起蓋字	遷善北社番梅仔元、烏肉元	曾國裁、曾國燕	厝地基	竹林庄北勢溪仔坑	沙鹿鎮竹林里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5
乾隆 54 年( 1789 )	重給開墾字	遷善南社業戶大宇牛罵、北社業戶瓦釐良	陳喜、陳岳	山埔園	斗抵後	沙鹿鎮斗抵里	同上，頁 819
乾隆 54 年( 1789 )	賣盡絕根契	許士絨	王瑛	水田	沙轆街五坎店后	沙鹿街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15.D189.227

\*筆者翻查文獻與其後之契約文書，並未再出現「泉茂庄」此一稱呼，那所指為何地呢？若由土地種類觀之，其為山埔地，因此泉茂庄應位於臺地上或臺地西麓。再由四至範圍「東至格內車路界，西至橫山仔頂界（底線筆者所加），南至大坑溝關公路界，北至桃仔崙山界」。由此看來，此山埔地東與車路為界，西到橫山仔頂（臺地上）；因此，推測此地應鄰近大車路，亦即鄰近斷層帶，位在大肚臺地西側緩坡附近，只是無法確定其確切位置。

\*\*麻園埔依《沙鹿鎮志》記載，包括今沙鹿鎮北勢、南勢、福興、六路、晉江、埔子等里（頁 119），亦即為清代位處大肚臺地西側之聚落北勢坑、南勢坑一帶，但確切位置不明。

由上表可看出，漢人乾隆年間的拓墾大部分集中在大肚臺地西側緩斜面上之竹林庄、麻園埔，以及斷層帶之沙轆街、斗抵附近。另外，也繼續向南簡庄、三榔等地拓墾。上表乾隆 22 年地契中，已出現「沙轆街」之地名，年代早於《續修臺灣府志》（乾隆 29 年）的記載，顯示沙轆街最遲在乾隆 22 年已形成。對照上述牛罵街形成年代（乾隆 19 年），兩地市街形成的年代約在同時期。由上所述，可看出在乾隆年間，漢人已聚居沙轆街，並陸續開墾大肚臺地西側緩坡上的竹林庄、麻園埔，斷層帶附近的斗抵；及海岸平原上的三 榔庄、南簡庄一帶。

而南簡庄以南之大庄一帶，在乾隆中葉已有漢人入墾之紀錄。戴寶村《臺中港開發史》一書中引述黃海泉之《梧棲沿革志》稿本所載，梧棲在乾隆 38 年(1773)有一名為吳 者向「番社」通事李友從請墾魚塭水田，業址在大庄地區，西至海濱，北至塭寮（頂寮里），南至阿城溝（草湍里）。<sup>15</sup>另依洪敏麟之見，大庄之成庄在乾隆 50 年前後。<sup>16</sup>而後，道光 11 年(1831)，有沙轆大庄、陳厝庄（今梧棲鎮福德里）、南簡庄、火燒橋（今梧棲鎮興農里）、八張犁（今梧棲鎮興農里）、海墘厝（今梧棲鎮興農里）、三甲（今梧棲鎮興農里）等地遷善南北社業戶及眾漢佃，因上、下西勢牧埔一帶屢被民番佔墾築田，而特請官府出示碑文嚴禁。<sup>17</sup>由此顯示，大庄地區在乾隆中葉漢人首墾後，迄道光初年，大庄範圍內的陳厝、火燒橋、八張犁、海墘厝等地漢人已陸續墾成。

乾隆以後，漢人陸續向其他地區拓墾，嘉慶 17 年(1812)漢人鶴齡將竿蓁林庄水田典與胞兄清吉；<sup>18</sup>嘉慶 20 年(1815)遷善南社業主瓦籬斗將坐落在鹿寮後橫山仔土地賣與漢人鄭振鳳；<sup>19</sup>嘉慶 24 年(1819)漢人開性、開佃兄弟立合約契字，地點在牛埔仔庄；<sup>20</sup>嘉慶 25 年(1820)同發號家族向漢人楊維居、楊豪傑招耕來二 榔庄東之水田。<sup>21</sup>因此，在嘉慶年間，沙轆街、南簡庄以北（靠近牛罵社地域）的竿蓁林庄、鹿寮、牛埔仔庄、二 榔庄等地已陸續墾成。

沙轆社地域內臨海的梧棲港一帶，因為移民上岸港口之一，早於康熙末年便有漢人入墾，其後雍、乾年間陸續有漢人來墾，<sup>22</sup>不過梧棲港的開拓完成與繁盛，

<sup>15</sup> 戴寶村主編，《臺中港開發史》（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7），頁 35-36。

<sup>16</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63。

<sup>17</sup>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93-94。

<sup>18</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50.D50.003。

<sup>1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718。

<sup>20</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古文書微捲，編號 700365。

<sup>2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D2.001。

<sup>22</sup> 洪敏麟據族譜資料，指出康熙中葉有安溪人王承紹入墾；至雍正、乾隆年間，再有晉江人莊

是在道光年間。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道光 5 年(1825)漢人紀于振向遷善社業戶烏臘取得墾批，開墾梧棲港附近魚寮、草湳一帶荒埔，其後漁民商民往來俱增，街衢日漸發達。<sup>23</sup>而在道光 10 年(1830)纂修的《彰化縣志》中也首見「五叉港」<sup>24</sup>(即梧棲港)的地名。<sup>25</sup>另外，在道光 19 年(1839)漢人謝士通將茅店賣與翁雲騰的契字中，也出現鰲栖港大街的地名。<sup>26</sup>由此顯示在道光年間，隨著漢人拓墾的進展，人口日眾，港口與街市逐漸形成。

綜合上述的討論，漢人在沙轆社地域的拓墾進程為：康熙年間已有漢人入墾；雍正年間拓墾南簡、榔庄、三榔庄，以及斷層線沙轆、斗抵一帶，斷層線以西竹林庄、麻園埔附近；嘉慶年間，沙轆社地域北部竿蓁林庄、鹿寮、牛埔仔庄、二榔庄等地也陸續墾成；道光年間南簡庄以南大庄、陳厝庄、火燒橋、八張犁、海墘厝、三甲等地也相繼墾成。而臨海梧棲一帶，康熙年間已有漢人入墾，不過要到道光年間，港口與街市始形成。

### 三、水裡社地域

依族譜資料記載，水裡社地域在康熙末年有漳州人陳鞍、陳元利、林興入墾；雍正年間有泉州人王仰，漳州人賴仰、賴徹入墾。<sup>27</sup>再由契約文書記載，雍正 13 年(1735)水裡社有漢人林筵任將自墾庄內水田賣與楊宅。<sup>28</sup>另據《彰化縣志》記

---

可曲、莊汪沐來墾；乾隆年間，安溪人王中浩、吳純、顏浩安、顏侯綿，南安縣人李保等接踵而來。參閱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61。

<sup>23</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1。

<sup>24</sup> 依洪敏麟的研究，此地名起源於往昔此地為牛罵溪入海處，因溪開口為五汊，故初稱五汊港，彰化縣志作五叉港，後來以同音雅字，易為梧棲港。參閱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60。

<sup>25</sup> 周璽，《彰化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16。

<sup>26</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40。

<sup>27</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78。

<sup>28</sup> 契字內水田地點不明，只載明立契人為「水裡社」林筵任，及水田坐落「本庄」。對照乾隆 6



載，雍正 13 年施德興開墾水裡新盛庄田二百餘甲。<sup>29</sup>昔日新盛庄包括今日山腳村、田中村、三德村、沙鹿鎮一部份，<sup>30</sup>亦即清代新盛庄地名之下，應包括有水裡社域山腳庄，往南到三塊厝庄、田中央，往北到沙轆潭仔墘、鴨母寮庄一部份。此一範圍已幾乎涵蓋水裡社平原區的社域範圍，由此顯示，水裡社平原區的土地在雍正年間已有漢人大規模之入墾。以下再由契約文書，說明乾隆年間的漢人拓墾進程：

表 4-2 乾隆年間水裡社地契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土地種類	地點	今地點	資料來源
乾隆元年 (1836)	賣田契	林文研	楊宅	水田	水裡新盛庄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90
乾隆 7 年 (1742)	賣絕根田契	沈寅光	盧宅	埔地、熟田	水師寮	龍井鄉龍崗村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1
乾隆 10 年 (1745)	招墾字	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	賴以覺	草埔	水裡山腳大路下	龍井鄉山腳村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
乾隆 11 年 (1746)	佃批字	土目大宇、甘仔轄及眾白番	何啟	田地	長興庄後*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1
乾隆 11 年 (1746)	杜賣盡根契字	胡孟慶、胡魁慶	楊泰招	厝地	潭仔唇(墘)本庄內	沙鹿鎮斗抵里	同上，編號 T29.D29.168
乾隆 13 年 (1748)	給墾草地契字	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	劉運貴	草地	長興庄後烏瓦寮*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4
乾隆 15 年 (1750)	杜賣田契	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	何睿、何戴	水田	長興庄厝後*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4
乾隆 17 年 (1752)	洗杜契	柯沈祖、柯沈宗	盧映	水田	水師寮庄	龍井鄉龍崗村	同上，編號 T29.D29.006
乾隆 21 年 (1756)	開墾永耕字	水裡社番大宇澤	新庄仔庄陳成	埔荒	杉漢崎**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5
乾隆 25 年 (1760)	杜賣厝地契	張生、張奇	楊壽	厝地	水師寮庄	龍井鄉龍崗村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7
乾隆 35 年	典契	水裡社番婦	陳宅	熟園	北勢崙**		同上，編號

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曾出現有「水裡庄」地名，筆者推測或許此契字所指之庄即為水裡庄。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89；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頁 79。

<sup>29</sup>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水利，頁 57。

<sup>30</sup>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88。

年( 1770)		貓干					T29.D29.168
乾隆 41 年( 1776)	杜賣契	陳達經	張整	水田	新盛庄後石坑口		同上，編號 T29.D29.008
乾隆 44 年( 1779)	杜賣田契	盧得水	賴成昭	水田	水師寮庄	龍井鄉龍崗村	同上，編號 T29.D29.009
乾隆 48 年( 1783)	典契字	徐中協	戴望遠	水田	新盛庄三塊厝	龍井鄉龍津、三德、忠和村	同上，編號 T29.D29.012
乾隆 50 年( 1785)	杜賣山園契	水裡社番婦貓干	嚴文蔚	山園	石坵仔口烏窰後**		同上，編號 T29.D29.013
乾隆 50 年( 1785)	杜賣契	賴阿出、賴阿六	何耀生	埔地	潭仔墘	沙鹿鎮斗抵里	同上，編號 T29.D29.168
乾隆 51 年( 1786)	杜賣山埔地基契字	水裡崎腳庄何霜榮	賴五行	公山埔地	水裡社北勢崙**		同上，編號 T29.D29.015
乾隆 52 年( 1787)	永耕契字	水裡社業戶大宇、土目六仔蒲	洪降	山園	仔林三層崎路北第三埕**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554
乾隆 56 年( 1791)	杜賣盡根山園契	嚴文華	呂超彩	山園	石坵仔口烏窰後**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16
乾隆 57 年( 1792)	杜賣契	陳達經	何贊興	水田	新盛庄三十張犁		同上，編號 T29.D29.017
乾隆 57 年( 1792)	杜絕盡賣田契	徐發旺	陳奢、陳諒	水田	新盛庄水裡崎腳三十張犁		同上，編號 T29.D29.018

\*長興庄為何處？若依乾隆 10 年及 15 年地契，10 年地契中草埔之四至範圍「東至山腳大路下( 底線筆者所加 )，西至長興庄厝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泉水圳為界」。15 年地契中水田四至範圍「東至大路( 底線筆者所加 )，西至菜園，南至楊家園，北至賴帶石坑仔私泉水一條，併帶坡塘公水灌溉」。由土地種類與四至範圍觀之，長興庄應鄰近山腳大車路，亦即鄰近斷層帶附近。

\*\*杉漢崎、北勢崙、石坵仔口烏窰後、水裡社北勢崙、仔林三層崎路北第三埕等地名，目前無法得知其確切位置，然若由土地種類來看，為荒埔、熟園、山埔、山園等，顯示上述地名應不會坐落在平原上，而是位在大肚臺地上或西麓靠近斷層帶附近。

依據上表之地契，顯示漢人請墾或買賣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斷層帶沿線附近( 北到潭仔墘，南至水師寮庄沿線 )，往東到大肚臺地西側山麓，往西到平原上新盛庄。由此也顯示，水裡社地域平原區在乾隆年間漢人已幾乎全面墾成。

除斷層帶附近外，坐落大肚溪河口北岸的塗葛堀及水裡港因是漢移民上岸的港口，故開墾的年代亦早。依據《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塗葛堀庄土名福州厝塗葛堀地方，原屬水裡社所掌管埔地，在約一百五十餘年前(乾隆時期)有漢人張氏，及一百二十餘年前(乾隆時期)漢人陳氏相繼前來開墾。而在福州厝北邊的

水裡港在康熙末年已有漢人來開墾，而到嘉慶年間為最隆盛。<sup>31</sup>

嘉慶 23 年(1818)水裡社番大宇澤將坐落新庄仔庄挑龜仔埕的荒埔，招徠新庄仔庄漢人張媽從開墾；<sup>32</sup>道光 7 年(1827)漢人鄭執向水裡社番歸阿抵汝加己耕坐落三塊厝仔庄西勢之山園。<sup>33</sup>新庄仔庄與三塊厝仔庄均位於大肚臺地上，顯示嘉慶年間以後，漢人拓墾的範圍已再延伸至大肚臺地上。另外，三塊厝庄以西臨海之海埔地在嘉慶年間，漢人亦陸續往墾，嘉慶 25 年(1820)水裡社業戶貴德陞坐落三塊厝庄南勢的海埔塏地，招徠三塊厝庄林長發號開墾；<sup>34</sup>同治元年(1862)漢人王毅記向陳媽願承墾崙仔頂庄的海埔曠地。<sup>35</sup>

綜合上述，漢人的入墾水裡社地域，康熙、雍正朝已有漢人入墾；乾隆年間斷層帶沿線與平原區的土地已幾乎全面墾成；嘉慶以後再陸續往大肚臺地與近海之海埔地拓墾。<sup>36</sup>而大肚溪口附近的塗葛堀與水裡港因是移民上岸的港口，在康熙末年已有漢人來墾，墾務在嘉慶年間為最盛期。

#### 四、大肚社地域

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行經大肚社時，所看到的景觀為「林莽荒穢，宿草沒肩」。<sup>37</sup>可見康熙中葉本區尚未有大規模的漢人入墾，以致郁永河看到是一片荒涼景色。本區漢人最早入墾的記錄為康熙 41 年(1702)，漳州人首先由鹿港

<sup>31</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3。

<sup>32</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92。

<sup>33</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759。

<sup>34</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127。

<sup>35</sup> 《臺灣私法物權編》，頁 929。

<sup>36</sup> 許雪姬亦認為龍井地區的漢人開發，先是由西部海岸平原，再次為東部的大肚臺地；而介於臺地和海岸平原間(即斷層帶)的原平埔部落，很可能成為漢人入據此地的據點。參閱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18。

<sup>37</sup> 全段文字參閱第二章第一節對平原自然景觀描述中，所引郁永河行經大肚社之記載。

登陸，向大肚社番 墾番地，而墾成大肚庄。<sup>38</sup>不過，漢人的大規模入墾應是在雍正年間以後，據族譜資料，雍正年間有漳浦縣趙佔、趙烏名、趙庇，及龍溪縣王綿遠等人來墾。<sup>39</sup>另依契約文書，雍正 7 年(1729)漢人簡琳芳原向南大肚社番愛著魯霧 得之庄園埔，招徠林生亨耕種；<sup>40</sup>雍正 11 年(1733)漢人楊秦盛買得南大肚山腳庄<sup>41</sup>土名轆遇 的草地，招徠佃人王及歡開墾。<sup>42</sup>而依據《臺灣土地慣行一班》所載，雍正末年林、戴、石三姓漢人，經官方許可開闢茄投庄田中央、龍目井一帶屬於大肚中北社之土地，而後由於大肚中北社番向官府提出抗議，官方乃撤銷允許，由漢番均分其地。<sup>43</sup>《彰化縣志》亦記載：「雍正十三年，業戶林、戴、石三姓開墾百順庄田六百餘甲」。<sup>44</sup>將兩筆文獻做一結合對照，可推測百順庄當指田中央、龍目井一帶土地。由上所述，顯示在雍正年間，漢人已大規模入墾南大肚社地與中、北大肚社地。

雍正朝以後，乾隆初年漢人董顯謨前來開墾王田庄，並修築王田圳，灌溉附近田地。<sup>45</sup>乾隆 6 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已出現大肚街之地名。<sup>46</sup>而大肚街西北方之汴仔頭與山仔腳地方也在乾隆年間相繼墾成。<sup>47</sup>可知在雍正、乾隆年間，大肚社地域平原區之土地漢人已大致全面墾成，而在平原區遭漢人大量拓墾後，漢人也再將墾務擴及大肚臺地上。道光 10 年(1830)《彰化縣志》中，

<sup>38</sup>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會社，1910)，頁 73。

<sup>39</sup>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185。

<sup>40</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9。

<sup>41</sup> 南大肚山腳庄疑為社腳庄之誤。

<sup>42</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

<sup>43</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2-43。

<sup>44</sup>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水利，頁 57。

<sup>45</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4。

<sup>46</sup> 大肚街有頂街、下街之分，依《大肚鄉志》認為，《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大肚街，應是以頂街為中心，而頂街之發展應早於下街。參閱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街市(附)，頁 95；陳榮懷，《大肚鄉志》，頁 100。

<sup>47</sup> 《臺灣土地慣行一班》，頁 43。

出現有井仔頭之地名；<sup>48</sup>又道光 25 年（1845）大肚中北社番阿媽九與林永所立給墾永耕字，埔地坐落井仔頭庄後。<sup>49</sup>依據上述記載可知，最遲至道光初年，漢人已入墾大肚臺地上，墾成井仔頭庄。

由上述討論觀之，漢人的拓墾大肚社域其進程為：康熙 41 年由半線(彰化)越過大肚溪後，最先墾成斷層帶附近的大肚庄；雍正年間拓墾南大肚社地山腳庄，中、北大肚社地田中央、龍目井一帶；乾隆年間漢人已聚居大肚街，並陸續開墾王田庄、汴仔頭、山仔腳等地。至此，平原區的土地已大致全面墾成，而在道光初年，漢人再將墾務擴及大肚臺地上的井仔頭庄。

溫振華對清代臺灣中部地區開發的研究中，指出中部地區的墾民，在康熙 40 年代（1701-1711）逐漸增多，大規模的水圳工程也逐漸修築。<sup>50</sup>洪麗完進一步指出，康熙 40 年以後，移民渡臺禁令漸弛，漳泉人乃接踵而至。今大肚、龍井一帶，位處大肚溪河口之北，因地利之便，開發最早。<sup>51</sup>翁佳音亦認為大肚王地區的漢人移民在康熙 40、50 年代後漸次入殖，最先是大肚地區於康熙 40 年代的漢人入殖。<sup>52</sup>亦即拍瀑拉地域的漢人開墾，學界普遍認為是於康熙 40 年代以後逐漸增多，漢人過半線（今彰化），渡大肚溪，首先開墾大肚地區，然後逐漸往北推進至拍瀑拉地域內其他地區。<sup>53</sup>

將上述看法對照本節漢人拓墾進程的討論，拍瀑拉各社地域的拓墾確實在康熙年間即已開始，但仍屬零星少數，要至雍正朝以後，才有大規模的漢人入墾。

<sup>48</sup>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保，頁 48。

<sup>4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21。

<sup>50</sup> 溫振華，清代臺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1 期（1983），頁 18。

<sup>51</sup> 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頁 181。

<sup>52</sup> 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 164。

<sup>53</sup> 此並非代表漢人的開墾順序即是大肚 水裡 沙轆 牛罵。筆者同意的是大肚地區的漢人入墾應是比水裡、沙轆等地早，然其開墾的先後並非即是呈現由南往北的現象。

而漢人入墾本區常是先選擇斷層帶附近土地為首墾處，以其為中心，陸續向平原區、臺地區拓墾，而各社平原區的土地大致在乾隆年間已幾乎全面墾成，臺地區的拓墾則較晚。

## 第二節、漢人的土地開墾組織與方式

對於漢人的開墾組織與方式，學界已多做分析，茲舉以下數位學者對本區漢人開墾組織與類型的研究做一探討。洪麗完分析大安、大肚兩溪間之漢人墾拓史，認為清代本區土地開墾主要係在「墾首制」下展開，由「有力之家」<sup>54</sup>向官方請墾土地，經許可後取得合法墾權。由於請墾之地，大多數為數十甲以上之地，非墾戶一己之力所能開墾，故多另行招佃助墾，此種開墾組織即所謂「墾首制」。另一種為「官田制」，係由官方招佃開墾而成，或沒收百姓田園而來。<sup>55</sup>然溫振華研究大甲溪流域的開墾，卻認為墾首制的開墾方式，在大甲溪流域一帶，就現存的資料觀察少之又少，而且開墾規模亦小。而大部份大甲溪流域的開墾，就目前留下的資料觀察，主要是漢人向社番承墾土地，或番社招漢佃闢耕。如大甲溪以南之牛罵地區，依目前所見的契約，幾全為上述的方式。<sup>56</sup>

很顯然的，溫振華與洪麗完的觀點不盡相同，洪麗完認為大安到大肚兩區間的土地開墾方式主要是墾首制；溫振華則認為大甲溪流域的主要開墾方式非墾首制，主要是番社招漢佃開墾，或漢人向社番承墾土地的方式。雖說兩人研究的區域不全相同，然亦有重疊處：大安、大肚兩溪間亦包含了大甲溪流域之牛罵、沙

<sup>54</sup> 所謂「有力之家」大體而言若非民間紳衿士民，即係郡屬文武官員者。就其身分予以分析，則可分成一般、通事、官紳商等三類。參閱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頁201。

<sup>55</sup> 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1683-1874）〉，頁198-201。

<sup>56</sup> 溫振華，〈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頁125-131。

轆、梧棲等地。溫振華是以契約文書為分析史料，而提出上述之觀察，似乎可信度較洪麗完高（洪麗完文中並未舉例說明），而如果牛罵、沙轆、梧棲等地的拓墾確如溫振華所說的方式，那水裡與大肚兩地的拓墾方式又為何？當然我們並不能遽下推斷說整個拍瀑拉地域的開墾方式是一樣的，如再就契約文書觀察，逐一檢視拍瀑拉各社地域的開墾時，不同的社群地域也許會有不同的現象產生。

對墾首制的開墾方式，施添福曾對此提出一概念——墾區莊。<sup>57</sup>他在竹塹地區的研究中，提出漢墾區的主要土地拓墾方式有二，一為「業戶制」（即上述洪麗完所稱之墾首制）；另一為「自墾制」。他認為康熙 50 年左右至乾隆初期，漢移民開墾土牛溝以西漢墾區，所採取的主要是一種「墾區莊」（即業戶制）的拓墾方式。由於墾區遼闊，當墾戶在向社番取得墾批，以及向官府申請墾照時，為便於在公文書或契約上指稱其墾區，通常會事先為其墾區設定一個莊名，此即所謂墾區莊。而業戶制雖為主要的拓墾方式，也有少部份的番社自耕地，係由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即所謂自墾制。<sup>58</sup>施添福此所稱自墾制，與溫振華認為大甲溪流域的主要開墾方式性質相同，即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或是番社或社番招佃開墾土地。

另外，柯志明在康熙至雍正朝初期的熟番地開墾研究中，將清初漢人開墾番地通常採取的形式分為兩類：一、透過開墾無主荒地的名義，漢人直接將番地報墾陞科，成為業主；二、透過墾番地的方式，漢人取得開墾及使用土地的許可，然漢人既未報陞，即非該地法定之業主，番社名義上仍為田園之主。<sup>59</sup>上述兩種

---

<sup>57</sup> 事實上，更早戴炎輝便提出相類似的看法，只是他並未用「墾區莊」的名稱。他提到：「墾戶又有獨資或合股，從番社（或番人）取得墾權，招佃開墾；佃眾因而聚集於墾界內，自然成為一莊（底線筆者所加）。官為維持新墾地界之治安，授與墾戶以其界內之行政權；墾戶乃自稱主、莊主、業戶、業主、頭家（番人則稱為番頭家），視承墾人為佃人、佃戶、屬佃、課戶、戶丁、戶下、派下；……墾戶或制定莊規、莊例，而行於佃戶、莊民」。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臺北文獻》4 期（1963），頁 23。

<sup>58</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頁 38-39。

<sup>59</sup>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85。

分類基本上即為業戶制與自墾制之分別，而透過柯志明對清治初期番地與荒地區辨的探討，使能更釐清業戶制下漢人墾墾土地之實質內涵。

綜觀上述的研究，可知一般對清代漢人開墾方式的界定，主要區分為兩類，一為業戶制，或說墾首制，另一為自墾制。兩種開墾方式主要差別為業戶制下的土地，業主為漢人，擁有收租權；自墾制下的土地，番社或社番為田園之主，漢人則為墾佃，須向番社或社番納租。另一差別為墾首制開墾土地規模一般較自墾制來的大。

由上述的討論，引發一些待解決之疑惑，首先溫振華認為牛罵、沙轆、梧棲等地的主要開墾方式為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的自墾制，墾首制的開墾方式極少，且開墾規模小。然洪麗完卻認為大安、大肚溪間的拓墾方式主要為墾首制，兩人說法明顯互相矛盾，何者看法正確？另外，對於水裡、大肚地區的漢人拓墾組織與方式，則尚待探討，是否水裡、大肚兩地的漢人拓墾方式所呈現又與牛罵、沙轆、梧棲等地不同？而漢人拓墾初期與大量入墾後之拓墾類型是否有差異？為解決上述疑惑，在下文中將逐一探討拍瀑拉各社地域內的漢人拓墾組織與方式。

## 一、拓墾初期（雍正至乾隆初年）

### （一）水裡社與大肚社地域

據《彰化縣志》記載，雍正 13 年（1735）施德興開墾水裡「新盛庄」田二百餘甲。施德興身為何，仍須待考，不過應為所謂「有力之家」，方能開墾廣及兩百餘甲之新盛庄，而此庄已為水裡社平原區大部份之社域範圍（參見前一節中對水裡社地域漢人拓墾進程的討論）；由此看來，新盛庄的開墾與設立，應是採業戶制的方式，亦即施添福所謂「墾區莊」的形式。

筆者再翻查契約文書，欲對新盛庄是否為業戶制（墾區莊）的開墾方式做進一步之確認，就目前所收有關新盛庄契字，最早為乾隆元年（1836）之賣田契，



茲將內容節錄如下：

立賣田契人林文研，先年有自墾過楊業主水裡新盛莊有水田一段，原丈五甲九分九釐，年載大租粟四十七石九斗二升（底線筆者所加），.....

茲無拖欠頭家租粟。今因乏銀費用，拖中送就與楊宅智叔出頭承買，三面言議時值銀六十九兩正。其銀即日同中收訖；其田即付銀主起耕掌管，永為己業，不敢阻擋，日後叔兄弟姪不得言貼言贖。.....<sup>60</sup>

上引契約為佃人林文研原向業主楊承墾新盛庄內水田一段，年須納業主大租粟，今因乏銀費用，將之賣與楊宅。另在乾隆 48 年（1783）之典契字，徐中協等人將坐落新盛庄內三塊厝水田典與戴望遠，年須納業主楊大租粟；<sup>61</sup>以及乾隆 57 年（1792）之杜賣契，陳達經將坐落新盛庄土名三十張犁內水田賣與何興，須年納業主楊大租谷。<sup>62</sup>上述三件地契中之楊姓業主應指同一家族之人，由此顯示楊姓家族為新盛庄內一重要墾戶，也顯示新盛庄內所採之開墾方式確屬業戶制。

新盛庄範圍遼闊，已包括水裡社平原區大半之土地；因此，另一方面也顯示清雍正至乾隆年間水裡社地域的漢人入墾，主要是採業戶制的開墾方式；即由漢人墾戶向官府請墾土地，取得合法土地使用與開墾權，成為田園之主，然後再招徠漢佃開墾，墾成後向漢業主年納大租粟。

《彰化縣志》中記載，雍正 13 年（1735）業戶林、戴、石三姓開墾百順庄田六百餘甲。而依上節中對大肚社地域漢人開墾進程的討論，百順庄當指田中央、龍目井一帶土地。其地原為中、北大肚所屬社地，林、戴、石三姓漢人原經官方許可取得開墾權，後因中、北大肚社人抗議，由漢番均分其地。由上段記載，也可證柯志明所認為漢人以「民番無礙，朦朧給照」的名義所報墾之無主荒地，

<sup>60</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90-191。

<sup>61</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12。

<sup>62</sup> 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17。

實際上即為番地。<sup>63</sup>而漢墾戶與中、北大肚社所生之爭議，便極可能為縣官未詳細查證，便率爾給照，導致漢人侵墾到中、北大肚社地的緣故。

林、戴、石三姓漢人請墾之百順庄廣及六百餘甲，面積遼闊，應也是採墾區莊的方式開墾。然契約文書中未出現百順庄此一地名，無法藉此來做進一步之驗證。<sup>64</sup>若再由其他契約文書觀察大肚社地域的開墾，以下為雍正 11 年（1733）之給佃批，內容摘錄如下：

立給佃批人業主楊秦盛，有置買草地一所，坐落南大肚山腳莊，土名轆遇。今有王及歡前來認佃開墾（底線筆者所加），議定犁份一張，配埔五甲。其埔好歹照配，付佃自備牛車、種子前去耕作，年照莊例：凡雜種籽粒，俱作一九五分抽，不得少欠；如開水耕為水田，議定首年每甲納粟四石，次年每甲納粟八石，三年清丈，每甲納粟八石滿，.....其租稅務要逐年交納清楚，不得少欠升合，亦不得故違憲禁事，不遵莊規，窩容匪類，及為非作歹；如有等情弊，被莊主查出，稟逐出莊（底線筆者所加）。.....<sup>65</sup>

同年，業主楊秦盛再招徠佃人楊文達開墾：

立給佃批人業主楊秦盛，有置買草地一所，坐落南大肚山腳轆遇，今有楊文達前來認佃開墾（底線筆者所加），給出犁份一張，配埔五甲，收過銀十二兩。其埔好歹照配，付佃自備牛犁、種子前去耕作，年照莊例

<sup>63</sup> 柯志明認為由於缺乏區辨番地、荒地的明確準則，地方官面對漢人請墾案時，會要求附近番社以及漢庄相關的鄉職人員具結，聯署聲明該地為無主地，通常以「民番無礙」一詞稱之。而「朦朧給照」則意指縣官並未仔細查證申請者「民番無礙」的宣稱是否屬實，或未到現場察明四界有無爭議，就批准墾照。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86-87。

<sup>64</sup> 筆者猜測或許有兩種可能，一為林、戴、石三姓漢人當初請墾時，雖事先為其墾區設定庄名為百順庄，其後地名逐漸分化，百順庄地名已不可尋？另外，大規模的墾區莊開墾方式可能逐漸轉變，有可能入墾初期採墾區莊方式，其後隨漢人大量的入墾，墾區莊內土地經過一再轉賣典當，地權分割愈來愈零細化，墾區庄已名存實亡？上述兩種推論，仍待進一步之驗證。

<sup>65</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

，凡耕種雜籽，一九五分抽，不得少欠；.....凡在莊居住，不得有違憲禁，不遵莊規，勾通匪類，騷擾莊中等情；如有此情，被莊主查出，立刻稟逐出莊，不許藉稱田底，聽業主配佃別耕，不得異言生端（底線筆者所加）。<sup>66</sup>

戴炎輝曾論及墾戶招佃開墾後，官為維持新墾地界之治安，授與墾戶以其界內之行政權；墾戶或制定莊規、莊例，而行於佃戶、莊民。<sup>67</sup>溫振華亦指出初期這些漢墾首、業主常被賦予警察權，以維持墾地的治安。<sup>68</sup>施添福在竹塹地區墾區莊的研究中，更清楚說明「墾區莊是由墾戶所創設的，因此在進入正式開墾之後，這些墾戶不僅對其墾區內的土地，負有報課陞科、繳納正供錢糧的義務，享有招佃開墾、收取地租的權利；同時對其所招的墾佃亦擁有某種程度的司法管理權」。<sup>69</sup>由上所述，上述南大肚山腳庄明顯即為一墾區莊，漢業戶（或說莊主）對墾區莊內治安有維持的權力，因此上引地契中載明「凡在莊居住，不得有違憲禁，不遵莊規，勾通匪類，騷擾莊中等情；如有此情，被莊主查出，立刻稟逐出莊」。

另在乾隆 2 年（1737）之給佃批，亦顯示為墾區莊的開墾形式：

給佃批業主楊興祖，有明買大肚四社草地，經報科給墾。今有林任兄前來犁份四甲前去墾耕（底線筆者所加），約首年納租粟四石，次年納租粟六石，第三年納租粟八石滿斗，永為定例，.....其開築圳水併歷年收補工資，照莊例均出。倘欲將田變賣，必報明業主管事，不得私相授受匪人，在莊騷擾（底線筆者所加），.....<sup>70</sup>

上引契字雖未言明大肚四社草地所指何庄，然由「其開築圳水併歷年收補工

<sup>66</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87-188。

<sup>67</sup>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頁 23。

<sup>68</sup> 溫振華，〈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頁 125。

<sup>69</sup> 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頁 35。

<sup>70</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4。

資，照莊例均出」；及「倘欲將田變賣，必報明業主管事，<sup>71</sup>不得私相授受匪人，在莊騷擾」等字句，可看出楊興祖所報科給墾之地，同樣亦屬墾區莊的形式。

綜合上述的討論，顯示大肚社地域百順庄、山腳庄、大肚四社草地（庄名及位置不詳）等地在雍正年間的開墾，是採業戶制，或說墾區莊的開墾方式。百順庄為大肚社地域北部田中央、龍目井一帶土地，山腳庄則為南部一帶土地；此一土地範圍，已涵蓋大肚社平原區大片之土地，因此，可推論說漢人最初的入墾（雍正至乾隆初期）大肚地區，主要以設立墾區莊的方式開墾。<sup>72</sup>

由上文所述，可知在水裡社與大肚社地域的漢人開墾，拓墾初期主要採業戶制的開墾方式，由漢墾戶向官府請墾土地，設立墾區莊，且由於墾區遼闊，再招徠佃人開墾。<sup>73</sup>不過在同時期兩社契約中亦不乏番社自招佃人開墾，或漢人 墾

<sup>71</sup> 管事之設置，依戴炎輝之研究，係大租戶派駐在庄的經理，即大租館的管事或館事；而管事常藉墾戶或業主之勢，在庄內擅作威福。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44。

<sup>72</sup> 施添福對竹塹地區墾區莊的研究中，以乾隆 6 年（174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首見對竹塹地區 12 個街莊的記載，認為其應全部為墾區莊。順此觀點，筆者再查閱《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對大肚地區漢人街庄記載，有義學庄、王田庄、龜山庄、加投庄（即茄投庄）等四庄，並未有上文所提及雍正年間百順庄、山腳庄的記載，是否乾隆朝以後，二墾區莊再分化為四庄？若將百順庄、山腳庄與上述四庄位置相互比對，王田庄、義學庄（乾隆 11 年（1746）有南大肚社番將荒山給義學官田莊漢人陳麟瑞承墾，因此筆者推測義學莊當位於南大肚社附近。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49）位於大肚地區南部，約與山腳庄位置吻合；加投庄、龜山庄（劉澤民認為龜山庄就其相對位置，應在王田與茄投庄之間。參閱《大肚社古文書》，頁 95）位於大肚地區中、北部，約與百順庄位置相近；因此，兩墾區莊再分化為四庄的推測是有可能的。若再由道光年間《彰化縣志》之記載，已再由四庄衍生出至少 21 個村落（參見下表）。

年代	漢人村落	資料來源
雍正年間 （1723）	百順庄、山腳庄	
乾隆 6 年 （1741）	義學庄、王田庄、龜山庄、加投庄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頁 79
道光 10 年 （1840）	竹園內、廟仔後、山仔腳、崁仔腳、茄投庄、崁仔頂、汴仔頭、渡船頭、社腳庄、營盤埔、學田庄、烏日庄、半路店、頂、下、中灣庄、山仔頂、內灣庄、籃仔頭、下寮仔尾、寮仔大庄	《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保，頁 48

<sup>73</sup> 施添福指出在業戶制的運作下，業戶首先以代納番餉或按年繳納定額番租為條件，向番社取得墾批後，再由縣治或廳治發給墾照。柯志明亦認為漢人墾戶在番社具結「民番無礙」後，雖以

番地的例子（自墾制），只是一般開墾的規模較小，不像業戶制設立墾區莊的大規模墾墾。<sup>74</sup>此顯示出，在水裡、大肚二社地域，業戶制雖為主要之開墾方式，但也有少數的土地係由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的自墾制。

## （二）牛罵社與沙轆社地域

溫振華研究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由目前所見契約，認為牛罵地區的開墾方式，幾全為漢人向社番承墾土地，或番社招漢佃闢耕。<sup>75</sup>如驗證溫振華的說法，牛罵社地域漢人的大規模開墾，最早為雍正 11 年(1733)，漢人林元璜等人向感恩社業戶蒲氏悅承墾秀水等十三庄地，且按田每甲八石、園四石，交收番租。<sup>76</sup>此十三庄地已幾乎全面涵蓋牛罵社平原區的大片土地，而漢佃人直接向番社承墾十三庄土地，<sup>77</sup>並年納番租，顯示漢人初期在牛罵社地域的拓墾方式為自

---

荒地名義將番地報墾陞科，然並未取得全部的地租收益；他與番社之間仍存有私約——通常就是以貼番納餉為內容的「約」——繼續履行殘餘的義務。而漢人亦可以用一定的報酬取消原訂的合約，將之買斷，就此不用再貼納番餉；當然也有可能雙方一開始訂立的就是買斷的契約。由水裡社與大肚社的例子來看，目前未發現有契約記載代納或貼納番餉的情形，不過在大肚社的例子中，確實出現漢人一開始便將土地買斷的情形。對此一現象，下一章中將再做探討。參閱施添福，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頁 35；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91-92。

<sup>74</sup> 例如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等人於乾隆初期相繼招徠漢人開墾山腳大路下草埔、長興庄厝後田地、長興庄後烏瓦寮草地。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344；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9.D29.002。

<sup>75</sup> 溫振華，〈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頁 128。

<sup>76</sup>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75-76。

<sup>77</sup> 論者或謂漢人的開墾十三庄地，與清政府的粘平大甲西社番變有直接相關（參見註 4）。張士陽且指出沙轆、牛罵等社大部份的埔地被漢人當作「無主荒埔」佔墾；陳秋坤更認為兩社原有成熟及未墾草埔二、三萬頃，不是被官方沒收，即遭漢人爭先佔墾。由牛罵社的例子卻顯示出，漢人雖向感恩社大量承墾十三庄地，然土地所有權仍為感恩社所有，漢佃人須年納番租。因此，大部份埔地遭漢人「佔墾」之說恐須再商榷，或許確有土地被漢人以「無主荒埔」佔墾（目前尚未發現此例證），然由十三庄地的例子顯示，牛罵社平原區的大部份土地是出 給漢人耕墾，非遭 侵占，牛罵社人仍保有地權。參閱張士陽，雍正九、十年臺灣中部 先住民 反亂，

墾制，此也初步驗證了上述溫振華的看法。若再由契約文書來觀察，確常見有漢佃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土地；番社或社番招墾漢佃的例子。下引三件契字，即為明顯例證。乾隆元年（1736）之退埔契，內容節錄如下：

立退埔契人周珍全，有 業主蒲氏悅生埔一處（底線筆者所加），坐落土名是木，明丈二甲；另西勢熟田一甲，共三甲。今因不能自耕，一問房親不受，自情愿出退，托中引就與林宅出首承買，.....<sup>78</sup>

乾隆 2 年（1738）之給佃批，內容節錄如下：

立給佃批人感恩社土官蒲氏悅，緣本社承祖田二甲（底線筆者所加），在路邊五分，在北勢山邊。其田二甲五分，付與黃宅耕作，每年每甲約納租粟八石滿，永為定例，不得增多減少（底線筆者所加）。.....<sup>79</sup>

乾隆 9 年（1744）之給墾批，內容節錄如下：

立給墾批感恩社業戶蒲氏悅，有埔地一所，坐落橋頭庄。茲招到佃人林元璜自出工本，前來開闢（底線筆者所加），即日收過犁頭埔底銀三十九兩正，經丈明三甲一分正，遞年每甲大租八石，.....<sup>80</sup>

雍正 11 年漢人的承墾十三庄地與上引三件地契中之業主，均為感恩社土官蒲氏悅，牛罵社土地的大量出，均與蒲氏悅有關，顯示蒲氏悅在漢人拓墾牛罵社地域初期，扮演一重要角色。<sup>81</sup>由上引地契內容可進一步得知，雍正至乾隆初

---

頁 5-55；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34。

<sup>78</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91。

<sup>7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35。

<sup>80</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39。

<sup>81</sup> 溫振華認為蒲氏悅有可能為漢人，透過婚姻關係取得感恩社之領導地位，有以下兩線索：一為清水壽天宮奉祀之媽祖，相傳由牛罵社蒲氏祖先由大陸奉祀來臺，根據這個傳說蒲氏悅似乎是漢人。二為上述乾隆 2 年之給佃批中，言明租粟運至水裡港交納，主要在將米穀販賣他地，充滿功利精神，顯非社民所為，如此蒲氏悅之漢人身分又愈為顯著。如將蒲氏悅視為漢人，透過婚姻關係取得土官之職位，則他的角色似乎便類似岸裡社漢人通事張達京，張達京與岸裡社域之土地拓墾與水田化，有密不可分之關係。由上述記載顯示，蒲氏悅在漢人拓墾牛罵社地域初期亦為一

期漢人開墾牛罵地區，主要是採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土地的方式。<sup>82</sup>

重要角色，社人的土地出，似乎是由他主導，可惜因資料無多的限制，無法再進一步對蒲氏悅的角色多做探討。不過，蒲氏悅的例子也提醒我們似乎須思考到漢人在初期拓墾時，其所面對的「熟番」頭家，或許是換了身行頭與熟番結合的「真漢人」。參閱溫振華，〈清代大甲溪流域〉漢人社會的建立，頁 127。

<sup>82</sup> 雍正 11 年為漢人全面墾拓之始，而此時十三庄之名稱卻已出現，由此似乎可推測此十三庄亦為墾區莊的形式，即漢人事先為其墾區所設定之名稱，而實際上尚未有漢人聚居（與上述大肚、水裡兩地漢墾區莊的主要差異點在，業主並非漢人而是感恩社人，漢人只為墾佃）。筆者原先認為此十三庄名並非雍正年間便出現，而原先思路如下：漢人開墾十三庄地的記載，是由乾隆 43 年（1778）北路裡番分府所發民番業佃諭示碑而來；因此，十三庄名稱之出現反映的是當時乾隆中葉的情形，即十三庄地已相繼墾成，形成漢人聚居之「庄」，並非代表雍正 11 年漢人初墾之情形；換言之，雍正 11 年漢人向感恩社請墾之初，此十三庄名可能尚未出現。若再對照乾隆 6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本區之庄只有一「牛罵庄」，未出現上述十三庄之名稱（參閱卷五城池，坊里，頁 79）。由此更加說明十三庄名並非雍正 11 年漢人請墾之初已出現，最遲應在乾隆 43 年才出現。然上述的推論卻被上述乾隆 9 年之給墾批字推翻了，因為契字內也出現了橋頭庄，年代與雍正 11 年相差不遠（相差 11 年），顯示橋頭庄名在雍正末年漢人承墾時確已出現，且契字中出現「疑似」墾區莊的字句：「倘日後要退賣別創，先聲明業主，查其誠實之人承頂其田，不得私相授受，亦不得庄中窩匪窩賭等情（底線筆者所加）」。然目前只發現此孤證，並未在同時期的地契中，發現透露出有墾區莊的訊息。如果說墾區莊的模式在漢人承墾之初確實存在著，此似乎與上文中對牛罵社地域主要採自墾制方式開墾的說法相矛盾，然若由漢人是向番社承墾土地此點觀之，自墾制的形式應無疑義，是否有可能自墾制下的開墾亦存在有墾區莊的模式，只是規模較小？目前無法由牛罵社的地契中尋求解答。因此，再翻查其他地區番社的出地契，發現番社或社番在出土地給漢佃後，似亦以「莊主」身分，制定「莊規」、「莊例」，以管轄漢佃，由以下阿里史社、霄裏社的例子可窺其一斑：

- （1）立佃批阿里史社通事阿斗，有承祖遺下埔一處，坐落土名軍功寮莊，今因乏力墾種，愿將此園托中就與佃人林時兄出首認佃（底線筆者所加），一經批給，千載為業，日後子孫番親人等俱不得言取言贖反悔情弊；如有此情，係斗一力抵擋，不干佃人之事，係佃人亦不得越佔外界，窩藏外匪，紊亂莊規各情弊（底線筆者所加）。……（《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64）
- （2）立給出仍歸墾批字霄裏社業主鳳生、甲頭加巴、白番武慶等，承祖遺埔地一所，坐落土名員墩毗連北片。今原佃邱友春自己向業主生頭家相議，給至四至員墩毗連北片山排溪州埧，業主給出完單，付佃執照，至日後開成水田，亦照依莊例按甲納租。今自給與後，不許窩匪逞兇等情；如有此情，業主稟官究治（底線筆者所加）。……（《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65）

依《臺灣土地慣行一班》記載，雍正初年漢人嚴玉漳向沙轆社土目蒲氏宇加著 得南簡庄一帶土地，其後乾隆初年漢人再向遷善社承墾大 榔庄附近埔地。此顯示似乎漢人在沙轆社地域初期的拓墾是採自墾制。若再進一步就契約文書來觀察，亦顯示出漢人在沙轆社地域的拓墾，與牛罵社地域相同，多直接向番社或社番 墾土地，茲以下引乾隆年間地契為例說明之。

乾隆 18 年（1753）之給開墾字，內容節錄如下：

立給開墾字南社番大宇牛罵，有承祖父遺下山埔犁份五十一張，坐落土名在泉茂庄前後，.....因乏銀費用，乏力開築成園，外托中引就向與泉茂庄漢人王名純、王玉蛙、王鳥、王元榜、陳迂、蘇天助、王貴、張士周、楊宜、易元朝等出首承墾（底線筆者所加），時三面議定墾價銀一百一十二大員正。.....言約每年每張犁份園配納地基稅銀七角，逐年完納，給單存照（底線筆者所加）。.....<sup>83</sup>

乾隆 32 年（1767）之給批墾字，內容節錄如下：

立給批墾字遷善南社番六仔武葛，有承祖父遺下荒埔一所二坵，土名坐落竹林後橫山頂，.....今因乏力耕作，托中引就與漢人鄭挑觀出首承給批開墾風水（底線筆者所加），將收過佛面銀一十八大員。.....以後應納大租錢一百五十文（底線筆者所加）。.....<sup>84</sup>

乾隆 45 年（1780）之給墾批字，內容節錄如下：

立給墾批字人遷善北社番萬感，有自己遺下塏埔一處，坐落土名南簡庄后（底線筆者所加），.....今因乏力耕墾，愿將此塏堀埔招墾，盡問房

---

上引兩地契顯示出，自墾制下的番社業主在土地出 給漢人後，亦可能如墾區莊的漢業主般，以莊主的身分，對漢佃負有某種程度的管轄權；換言之，自墾制下的開墾似亦存在類似業戶制的墾區莊模式。若將之回推到牛罵社的例子，有可能即為上述的情形，然此只為初步之推論，仍待日後更多之探討。總之，由上述之討論，也讓筆者思考到，對於自墾制下的漢番業佃關係、與業戶制墾區莊的比較等問題為一須再深入探究之課題。

<sup>83</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3。

<sup>84</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9。



親叔兄弟侄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于漢人洪文由觀出首承墾，.....成塭  
三年以後，著配業主餉銀貳大員（底線筆者所加）。.....<sup>85</sup>

上文中由目前所收地契及相關文獻的探討，分析出牛罵、沙轆兩地在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拓墾，主要採自墾制。而業戶制的開墾類型，或說設立墾區莊的情形，就目前所收地契來看，並無明顯的例子可證有墾區莊的設立。<sup>86</sup>

## 二、漢人大量拓墾後（乾隆以後）

漢業戶在取得墾照開墾荒地後，接著便招募漢佃前來開闢田地，陳秋坤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佃人通常享有永久佃作的權利；而這種永佃權原是墾戶在人少地多的環境下，為求吸引佃人的勞動力，鼓勵他們長期投資開墾而設。<sup>87</sup>大陸學者劉永成研究明清時代的租佃制度，認為臺灣地區是永佃權發展最快的區域之一；清初至乾隆年間，永佃制在臺灣的農業租佃制度中，已佔居主導地位。劉永成且認為臺灣永佃制是移植大陸永佃制的結果，所以，在墾荒過程中一開始就是將土地分割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兩部份，所有權歸墾戶所有，經營權歸佃農所有。而佃農的經營權即永久耕作權（永佃權），乃是作為在其墾荒中所費工本的代價。

88

施添福對竹塹地區的研究中，亦指出在開墾過程中，業戶只負責向官府申請墾照和向社番取得墾批，並未實際投入工本開墾草地，因此，只具有收租權（地骨權），而無權隨意處分土地及其耕作權（地皮權）。而在整個拓墾過程中，墾佃

<sup>85</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10輯206號。

<sup>86</sup> 為何在土地相鄰之拍瀑拉四社地域內部會形成兩種不同之拓墾方式？其背後原因為何？所代表意義為何？上述問題，目前尚無法做一釐清，只能呈現出其南北不同的差異現象。或許要釐清上述問題，須再就大肚社鄰近之半線、貓霧揀等社地域，或是牛罵社鄰近之岸裡、大甲東、西等社地域做一分析比較，將之綜合來看，或許較能釐清漢人拓墾組織在各地域差異現象的原因。

<sup>87</sup>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8。

<sup>88</sup> 劉永成，《中國租佃制度史》（臺北：文津，1997），頁268。

是實際拓荒者，必須自備工本，投入勞力，披荊斬棘、墾荒埔成田園；因此，土地墾成後，即握有實際的土地耕作權和處分權。<sup>89</sup>

漢墾佃取得永佃權或永耕權不獨出現在業戶制的類型下，番社或社番在 耕土地給漢佃時，漢佃亦常取得永久耕作的權利，亦即在墾拓初期，漢墾佃不論向漢業戶或番社／社番承墾土地，常取得永佃權，握有實際的土地耕作權利，這樣的情形亦發生在漢人拓墾拍瀑拉地域時，茲以下引各社契約文書說明之（僅摘錄部份字句，未詳錄全文）：

### （一）牛罵社

（1）乾隆 44 年（1779）感恩社業戶蒲天開立給批字：「其荒埔時交付鄭應元、鄭應魁兄弟前去開築風水，安葬祖 厝，抑或墾成田園，聽從其便，不敢阻擋」。<sup>90</sup>

（2）道光 2 年（1822）感恩社業主六觀目義立給佃批字：「其山埔園份時即踏明界址，付與楊舒獻官前去自用工本，開墾成園，耕作掌管，永為己業」。<sup>91</sup>

（3）道光 22 年（1842）業主蕭江淮、蕭江水兄弟立給墾約字：「其埔地隨即踏明界址，付與夥記曾經觀全楊鋒望觀自備工本，築造魚 塢，開墾田園，耕作掌管，永為己業」。<sup>92</sup>

### （二）沙轆社

（1）乾隆 18 年（1753）南社番大宇牛罵立給開墾字：「其山埔犁份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掌管，或栽種樹木，或開築成園業，任其自便，不敢阻擋。……自此一給墾千休，葛藤永斷，寸土不留」。<sup>93</sup>

<sup>89</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頁 35-36。

<sup>90</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1。

<sup>91</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73。

<sup>92</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09 號。

<sup>93</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3。

(2) 乾隆 32 年 (1767) 遷善南社番六仔武葛立給墾批字：「將此荒埔隨踏明四至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為業，不敢阻擋，日後子孫亦不敢言及找贖異言生端滋事」。<sup>94</sup>

(3) 乾隆 45 年 (1780) 遷善北社番萬感立給墾批字：「塭埔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開築成塭，畜魚生息，永為物業，不敢阻擋生端滋事」。

95

### (三) 水裡社

(1) 乾隆 10 年 (1745) 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等立招墾字：「自招墾為業以後，任從漢人賴以覺永遠耕作為業」。<sup>96</sup>

(2) 乾隆 13 年 (1748) 水裡社土目大宇、甘仔轄立給墾草地契字：「隨即將埔地踏明界址，盡付劉運貴官前去開墾成田耕作，永遠為業，不敢阻擋」。<sup>97</sup>

(3) 乾隆 21 年 (1756) 水裡社番大宇澤立開墾永耕字：「其荒埔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成園，收租納課，永為己業」。<sup>98</sup>

### (四) 大肚社

(1) 嘉慶 7 年 (1802) 北大肚社番蒲裡社立給永佃批契：「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付與銀主起耕，前去管掌耕作，永為己業」。<sup>99</sup>

(2) 嘉慶 13 年 (1808) 南大肚社番蒲氏治全妻阿蕉立永佃批字：「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付與銀主前去掌管，永佃耕作，久遠為業」。<sup>100</sup>

<sup>94</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9。

<sup>95</sup>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10 輯 206 號。

<sup>96</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

<sup>97</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4。

<sup>98</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55。

<sup>99</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0。

<sup>100</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3。

(3) 嘉慶 15 年 (1810) 大肚社番阿二打邦立給永佃字：「遂即踏明界址，交與佃人掌管，任從栽種樹木，或築厝宅，皆不敢再招他人開築，以生事端」。

101

由上引四社地契，顯示墾佃向業戶承墾之初，便取得永佃權，田地即由墾佃「掌管耕作，永為己業」，甚至業戶「不敢再招他人開築，以生事端」。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同一地塊，便有「田面」(收租)權和「田底」(佃作)權之別，兩者相互獨立，各可自由頂讓買賣，<sup>102</sup>形成「一田二主」的地權結構。<sup>103</sup>

「一田兩主」即大小租多重地權制度在乾隆時期逐漸成形，<sup>104</sup>而早在康熙時期諸羅縣知縣周鍾瑄便已注意到業佃權分離的現象，憂心「將來必有久佃成業主」之弊害：

若夫新舊田園，則業主給牛種於佃丁而墾者十之六、七也，其自墾者三、四已耳。乃久之佃丁自居於墾主，逋租欠稅；業主易一佃，則群呼而起，將來必有久佃成業主之弊（底線筆者所加），爭訟日熾、案牘日煩，此漸不可長者也。又佃丁以園典兌下手，名曰田底；轉相授受，有同買賣。或業已易主，而佃仍虎距，將來必有一田三主之弊（底線筆者所

<sup>101</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5。

<sup>102</sup> 基本上，佃人欲將土地頂讓典賣，須事先徵得業主之同意，不得私相授受，契字中便常見以下之記載：「欲將田底頂退下手，務要預先報明業主（底線筆者所加），查其短欠租穀及新頂之佃果係誠實之人，聽其頂退」，「倘欲將田變賣，必報明業主管事（底線筆者所加），不得私相授受匪人」，「倘日後要退賣別創，先聲明業主（底線筆者所加），查其誠實之人承頂其田，不得私相授受」。筆者認為在墾佃實際擔任耕墾的情況下，且業戶大部份是屬於所謂「離村地主」，很少居住在鄉村（「離村地主」為陳其南所稱），在此情況下，墾佃未經業主同意，將田「私相授受」的情形極有可能產生。戴炎輝即認為，墾戶有撤佃權，或佃業（小租業）之出頂（出賣），須得墾戶之同意；然實際上行使此權利者甚少。而至嘉慶初年時，大租戶（業戶）已喪失對於土地的實際支配權，僅只剩下「收租權」，土地支配權歸於小租戶。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64、540；陳其南，〈開墾組織與土地制度 - 大小租的起源問題〉，《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87），頁 84；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頁 23-24、26-28。

<sup>103</sup>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8。

<sup>104</sup>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7 註 5。

加)；納戶可移甲為乙，吏胥必飛張作李，冊籍日淆、虛懸日積，此又之不可長者也。<sup>105</sup>

周鍾瑄的憂心，不幸在乾隆時期已然成真，大學士阿桂於乾隆 53 年 (1788) 的奏文便有以下一段對大小租地權制度的描述：

緣臺灣業戶開墾田園，招佃承種，即將所費工本收回，名「犁頭錢」，每甲銀一、二百兩，每歲止抽分租穀六石至八石不等。又有佃戶自行開墾者，因村黎未諳科則，倩城市殷實之家充當業戶，代為經理納糧，亦祇抽給租穀數石，名曰「田面租」。其佃戶承種之後，又覓僱工人代耕，牛犁籽種，悉係工人自備，佃戶與分租息，每年每甲可得數十石為「田底租」者，業戶得租數少，佃戶得租數多，其田雖係業戶出名，而實歸佃戶承管也（底線筆者所加）。<sup>106</sup>

上段敘述清楚說明了擁有田底權（永佃權）之佃戶，在「久佃成業主」情形下，逐漸擁有對土地的支配處分權利，故「其田雖係業戶出名，而實歸佃戶承管也」。而佃戶在向業戶承墾土地後，常再另僱佃人前來開墾，形成業戶、佃戶、佃人的三層土地經營，佃人須向佃戶納「田底租」，即小租；佃戶則向業戶納「田面租」，即大租。

陳其南以清代土地所有制來分析社會階層化的現象，認為小租戶（即佃戶），於整個清代歷史中，他們或者力爭上游，累積財富，終於跨越大租戶（即業戶），成為深具影響力的士紳階層。<sup>107</sup>陳秋坤同樣指出從 1770 年代（乾隆 35 年）以降，許多農村的富佃農，利用分租的方式，逐漸累積財富，進而在地方建立宗族勢力。<sup>108</sup>因此，在「一田二主」制下，造成小租戶的逐漸崛起，同樣在拍瀑拉地域內的龍井林家與清水同發號楊家二家族原先即為小租戶，其後逐漸累積財富，成為社

<sup>105</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六賦役志，頁 95-96。

<sup>106</sup> 《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1959），頁 182。

<sup>107</sup> 陳其南，開墾組織與土地制度 - 大小租的起源問題，頁 86。

<sup>108</sup>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146。

會中的士紳階層。<sup>109</sup>

### 第三節、小結

本章首先對拍瀑拉各社地域的漢人拓墾大勢做逐一之探討，就時間面向而言，康熙年間已有零星少數入墾，然大規模入墾是在雍正朝以後，乾隆年間達於極盛。就拓墾土地範圍而言，斷層帶附近土地常為漢人首墾並聚居之處，以之為中心，陸續向平原區、臺地區拓墾。而各社平原區的土地乾隆年間大多已全面墾成，臺地區的拓墾相對則較晚。

接著，再分析漢人在各社地域的拓墾類型與方式，推論出漢人拓墾初期在水裡、大肚兩地域主要採業戶制的方式，由墾戶向官方取得墾照後，以墾區莊的形式招佃開墾。雖業戶制為主要開墾方式，然亦有少數的土地係採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的自墾制。而牛罵、沙轆兩地主要採自墾制的方式，由漢人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土地。無論是向漢業戶或番社／社番承墾之墾佃，在墾拓之初便常取得永久佃作的權利（永佃權），如此，業戶對土地支配的權利逐漸減少，只保留收租權（田面權），實際上的土地支配使用權（田底權）日久便操控在佃戶手中，逐漸形成「一田二主」的地權結構。

而漢人的大規模拓墾本區後，在此情況下，地域內之拍瀑拉各社土地權利也逐漸轉移至漢人名下，在下一章中，將對各社土地流失問題作一探討。

---

<sup>109</sup> 對兩家族的崛起過程與土地經營方式，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列，兩家族的研究可參閱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劉素芬，十九世紀龍井林家的土地經營，《臺灣史研究》2卷2期（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54-82；楊玉姿，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發（1760-1890），頁71-90；清代同發號的成長，頁62-76。

## 第五章、拍瀑拉各社土地流失問題的探討

上一章中，探討漢人的拓墾進程與拓墾方式，而在漢人大規模拓墾本區後，區域內拍瀑拉各社土地逐漸地出 或典賣至漢人名下，各社人之生活空間也漸遭壓縮。諸羅知縣周鍾瑄即曾感嘆：「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或為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sup>1</sup>周鍾瑄嘆息北路諸羅四十餘社番黎之苦，土地在漢人的開墾或侵占下，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而拍瀑拉各社是否亦面臨上述之情形？各社在面對漢人的大量拓墾下，是否能保有土地或出售殆盡？地權轉移過程為何？各社在歷史時空之交織運作下是否有互異的現象產生？上述諸問題，即為本章所要探究與釐清之處。

### 第一節、大肚社與水裡社

#### 一、土地「流失」之界定

本章在探討拍瀑拉各社地權外流的現象及經過，主要在分析各社土地流失時間與範圍是否有差異。而在開始本章討論前，將先就「流失」之義涵做一界定與探討，以進行以下之討論。

熟番將土地或收租權「杜賣」與漢人的行為，視為土地流失的一種，應無疑義。然對於「典讓」土地、收租權是否可視為土地流失，學者卻出現不同的看法。柯志明即對熟番土地的「流失」，採取較嚴格之定義——番地改屬漢人業主，變更成陞科納供的民業。<sup>2</sup>柯志明認為不少學者將「典讓」亦一併視為視同土地流

<sup>1</sup> 周鍾瑄，上滿總制書，引自黃叔瓚，《台海使槎錄》，卷八 番俗雜記，頁 165。

<sup>2</sup> 也因此界定方式——陞科納供後，變更為民業——柯志明對熟番地的流失，提出三種管道：(1)

失，<sup>3</sup>然他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番地即使典讓，只要沒被陞科過戶，清廷依然得以使用種種行政措施加以補救，例如，強制規定（及壓低）番地典借的利息，或更進一步在利息超過借貸額時，強制停息，讓熟番依原借額（乃至減折的借額）贖回土地。<sup>4</sup>亦即柯志明認為熟番地的最後底限及保障在於不陞科納供，以免被轉讓變更為民業，故就此點觀之，「典讓」即不被視為土地流失的一種。

然熟番是否有能力籌足取贖銀兩？陳秋坤也看到官方以行政命令補救土著業主權益的措施，然他認為實質上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大部分的番業主往往無法依約在限期內「還銀贖田」，田園收租權便長期控制在漢佃銀主手裡，形成番業主「有田無租」的窘狀。為此，土著地主往往在典胎田園的過程中，逐漸失去私有地權。<sup>5</sup>

或許柯志明關注在「典讓」行為並非實質上的番地流失，然陳秋坤看到的是「典讓」下的效應及其後的結果。亦即雖土地不遭陞科納供，仍可視為番業，但在「典讓」的形式下，番業主將收租權典押給漢人，雖保留還贖權利，但常一典

---

雍正 5 年前為「民番無礙，朦朧給照」：漢業戶以無主荒地名義立戶設庄，報墾番地（2）雍正 5 至 9 年為「番佃墾戶首報陞科」：貼納社餉，墾番地逃稅的漢人番佃墾戶自首報陞（3）雍正 8 年後為「番業戶轉賣」：番社立戶請墾後轉賣過戶，或墾成陞科後轉賣過戶。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1 註 18、107。

<sup>3</sup> 柯志明文中舉出陳秋坤、施添福兩人做例子，他寫道：「例如陳秋坤，對熟番地流失採取了比較寬鬆的定義，將番地出招漢佃收租以及典讓給漢人收租的現象也一併視為流失。……除了出外，熟番向漢人借貸以地租充作利息的現象 - 典讓 - 也相當普遍。不少學者，包括施添福在內，與陳秋坤一樣將番地的典讓也視同流失。」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1 註 18。

<sup>4</sup>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1 註 18。

<sup>5</sup> 針對官方的行政措施，陳秋坤寫道：「為了彌補土著地主因借銀胎典而失去地權，閩浙總督以下地方官曾數次下令漢人銀主向土著借貸銀兩，最多只能取利 2 分，以示優恤。」「從 1800 年以後所見借銀契字，顯示利率顯著下降，平均在年利 2 分左右，惟相對的典借期限，則由 3、5 年為期延長為 7、10 年，甚至是無限典期，形成低利而長期土地出典的情況。這表示官方即使有意維護土著的地權，實質上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底線筆者所加）。」參閱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33-35。



再典，或再追加銀額，最後終無銀贖回，形成長期出典，雖有土地但無租可收的情形，甚至最終「典賣」土地。筆者本章所在意的是「典讓」此一行為下的效應與結果，因此，對於熟番土地、收租權的典押，仍將之視為土地流失的一種。

## 二、大肚社

上一章中討論到，漢人的初墾大肚社地域主要採業戶制的方式，由漢人向社番取得墾批後，再由官府發給墾照，將土地報墾陞科後成為業主。漢人雖以荒地名義將番地報墾陞科，然其向番社取得墾批過程中，常以代納番餉或繳納定額番租為條件，亦即漢業戶未取得完全之地租收益。<sup>6</sup>由大肚社的例子來看，尚未發現有契約記載代納番餉的情形，而是漢人承墾之初便將土地買斷：

(1) 雍正 11 年 (1733):「立給佃批人業主楊秦盛，有置買草地一所 (底線筆者所加)，坐落南大肚山腳庄，土名轆遇。.....」<sup>7</sup>

(2) 雍正 11 年 (1733):「立給佃批人業主楊秦盛，有置買草地一所 (底線筆者所加)，坐落南大肚山腳轆遇。.....」<sup>8</sup>

(3) 乾隆 2 年 (1737):「給佃批業主楊興祖，有明買大肚四社草地 (底線筆者所加)，經報科給墾。.....」<sup>9</sup>

由上引三件地契，可知漢人以業戶制的方式拓墾大肚地區，一開始便將土地所有權買斷，換言之，大肚社人大片土地的全部權益 (田面租〔大租〕+ 田底租〔小租])，在雍正未年起，透過業戶制的方式 (將土地買斷)，已開始流失至漢人手中。而其他由番社或社番招佃開墾的土地 (自墾制)，由所收契約文書，發現乾隆年間起，社番便大量將土地杜賣、典讓給漢人，這種情形到清末仍屢見不

<sup>6</sup> 參見第四章註 73。

<sup>7</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

<sup>8</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87。

<sup>9</sup>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4。

鮮。下表為整理乾隆至光緒百餘年間，社番將田園或收租權杜賣、典讓、典賣給漢人的紀錄：

表 5-1 清代（乾隆迄光緒）大肚社人杜賣、典讓、典賣土地之契約

編號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資料來源
1	乾隆 11 年 (1746)	永耕墾荒山契字	南大肚社番愛箸	陳麟瑞	中崙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49
2	乾隆 25 年 (1760)	杜賣契	南大肚社番蒲氏沙裡箸全妻阿二	郭高	阿佛地	《大肚社古文書》，編號 1
3	乾隆 36 年 (1771)	找洗契字*	南大肚社番阿眉高全妻阿媽沙裡	郭高	阿佛地	同上，編號 2
4	乾隆 36 年 (1771)	杜典契字**	南大肚社番阿眉打拿	馬傑	本社社口過坑鳥松腳	同上，編號 3
5	乾隆 38 年 (1773)	杜賣契	南大肚社番阿眉打拿	馬傑	本社社口過坑鳥松腳	同上，編號 4
6	乾隆 41 年 (1776)	永杜盡賣契	北大肚社番烏肉漢	戴豹	北大肚頂街竹圍內	同上，編號 5
7	乾隆 48 年 (1783)	杜賣契	南大肚社番婦阿武雞	楊文老	本社口西勢	同上，編號 6
8	乾隆 54 年 (1789)	洗找契尾字	南大肚社番阿甲興	郭苞	阿佛地	同上，編號 7
9	嘉慶 6 年 (1801)	永賣契字	南大肚社番愛箸典	陳煥	社腳南勢過溝	同上，編號 9
10	嘉慶 6 年 (1801)	杜絕賣契字	大肚社番烏肉上港	林德助	番社口	同上，編號 80
11	嘉慶 8 年 (1803)	典契字	大肚中社番阿末上港、阿甲上港	林財	山腳飯店前南勢份	同上，編號 11
12	嘉慶 15 年 (1810)	洗找契尾字	南大肚社番婦阿保老興、阿佰宇興、業主阿甲興	郭行	阿佛地	同上，編號 16
13	嘉慶 15 年 (1810)	典契	南大肚社番阿眉大目	許尾	本社北勢	同上，編號 17
14	嘉慶 17 年 (1812)	典租契	北大肚社番蒲裡社	陳錐、陳鐵	水汴腳	同上，編號 18
15	嘉慶 17 年 (1812)	典契字	大肚北社番烏肉牛罵	郭理	北勢尾	同上，編號 19
16	嘉慶 17 年 (1812)	典契	北大肚社番阿武典	郭強	北勢尾	同上，編號 20
17	嘉慶 18 年 (1813)	典契字	南大肚社番蒲氏高	陳宜	本社南勢坑邊	同上，編號 22
18	嘉慶 20 年 (1815)	杜賣盡根山園絕契	南大肚社番婦打姨斗肉	陳等加	社腳庄北勢	同上，編號 23
19	嘉慶 21 年 (1816)	典契	大肚北社番阿勞萬典	莊爾	北勢尾	同上，編號 24
20	嘉慶 24 年 (1819)	賣契字	大肚社番湧源	魏俊	頂街	同上，編號 26
21	嘉慶 25 年 (1820)	典契字	南大肚社番阿眉打舌	陳地	社後北勢	同上，編號 27
22	道光元年 (1821)	典租契字	南大肚社番愛箸賀老	陳維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59

23	道光 2 年 (1822)	典大租契字	南大肚社番天 色、烏義九	林慶	樹仔腳	同上，頁 660
24	道光 12 年 (1832)	典田契字	中大肚社番阿二 元	大字振	山仔腳庄	《大肚社古文 書》，編號 29
25	道光 13 年 (1833)	賣盡根契字	南大肚社番天 色、阿眉議			同上，編號 30
26	道光 13 年 (1833)	典契字	大肚北社番烏鴉 表陞、阿二典	吳臨	北勢尾	同上，編號 31
27	道光 14 年 (1834)	典大租契字	大肚中社番烏鴉 九、阿百字九	陳養	茄投后南勢木	同上，編號 32
28	道光 16 年 (1836)	典田契字	中大肚社番阿眉 上港、阿百上港	何營立	南勢份	同上，編號 35
29	道光 16 年 (1836)	典契	大肚中社番阿六 萬連	李紅	北勢份	同上，編號 36
30	道光 16 年 (1836)	典契	大肚北社大字干 進	李紅	北勢份	同上，編號 37
31	道光 17 年 (1837)	典契字	大肚中社番婦搭 姨目義、桂娘	吳琳	北勢份	同上，編號 40
32	道光 21 年 (1841)	杜賣盡根契字	南大肚社番富哩 宗	楊象四	本社內西勢	同上，編號 42
33	道光 23 年 (1843)	典租契字	南大肚社番阿甲 治	楊興	王田社腳庄	同上，編號 44
34	道光 23 年 (1843)	典租契字	南大肚社番阿甲 治	楊興	新興庄	同上，編號 45
35	道光 25 年 (1845)	杜賣盡根絕契 字	南大肚社番高大 字	楊興	本社後	同上，編號 46
36	道光 26 年 (1846)	賣契字	南大肚社番社主 愛箸全白番等	陳瀨	南大肚	同上，編號 47
37	咸豐元年 (1850)	典租契字	大肚中社番婦阿 百圭	陳河	龜山圳墘	同上，編號 50
38	同治 11 年 (1872)	轉典田契字	大肚中社業主番 婦阿妹振、阿二水	陳雅	山仔腳庄	同上，編號 56
39	光緒元年 (1875)	典大租銀字	南大肚社主烏肉 水	楊祈福	竹山洋	同上，編號 61
40	光緒 3 年 (1877)	轉典田契字	大肚中社業主番 婦阿妹振	陳水盛	山仔腳庄	同上，編號 65
41	光緒 3 年 (1877)	賣永耕山埔園 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業 主為鴨九	林元龍	犁份庄	臺史所古文書， T29.D29.168
42	光緒 6 年 (1880)	盡根典田契字	大肚中社番婦阿 妹振、阿二水	陳國珍	山仔腳庄	《大肚社古文 書》，編號 70
43	光緒 6 年 (1880)	典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阿 抵里、阿保落	陳水盛	山仔腳庄前南 勢份	同上，頁 298
44	光緒 6 年 (1880)	賣永耕山埔園 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業 主為鴨九	林元龍	犁份庄	臺史所古文書， T29.D29.168
45	光緒 7 年 (1881)	杜賣盡根田契 字	大肚中社番阿滿 元	陳國珍	山仔腳庄	《大肚社古文 書》，編號 72
46	光緒 8 年 (1882)	杜賣番租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高 田氏	陳國珍	茄投庄后洋南 勢木	同上，編號 73
47	光緒 8 年 (1882)	永耕山埔園契 字	大肚中北社番業 主為鴨九	林元龍	井仔頭庄后	臺史所古文書， T29.D29.083
48	光緒 8 年 (1882)	永耕山埔園契 字	大肚中北社番業 主為鴨九	林元龍	犁份庄西南坪 車路下	臺史所古文書， T29.D29.085

49	光緒 9 年 (1883)	杜賣盡根番租 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業 主烏鴨九	陳崑協	南勢木車路西 海尾節	《大肚社古文 書》，編號 74
50	光緒 14 年 (1888)	再懇求找洗字	大肚中社番阿滿 元	陳國珍	大肚西下保山 仔腳庄	同上,編號 77
51	光緒 15 年 (1889)	杜賣盡根番租 契字	大肚中北社番阿 二妹	陳水盛	茄投庄前牛埔 墘	同上,編號 78

\*找洗是指土地買賣完成交易後，賣主再向買主追加添補錢而言。除直接向買主找洗外，也可隔層找洗，如甲賣乙土地，乙再賣給丙；甲可向丙找洗。參閱洪麗完編撰，《臺灣古文書專輯（上）》，頁 11。

依據上表，可發現乾隆年間起，大肚社人大量將土地杜賣、典讓給漢人，而杜賣的類型可大致分成兩種：一為土地的直接杜賣、出典，另一為番租的杜賣、出典。番租的典讓、杜賣，即為將所收之大租（即田面權、田面租）出典或轉賣與漢人，而典讓常為土地流失之首部曲，最終章可能即為杜賣之結果。茲引編號 23、46 地契為例說明之：

23、同立典大租契字人南大肚社番十名內兄弟天色、烏義九，有承祖父遺下樹仔腳田一甲六分，全年該納大租穀滿斗十二石八斗正。今因乏銀別創，色等兄弟相議，愿將此大租穀十二石八斗，托中引就向原佃人林慶官出首承典，.....大租穀早、晚兩季十二石八斗，付原佃人自收，以為利息（底線筆者所加）。其典限十年為止：道光二年八月起，至十二年止。限滿之日，聽色、九兄弟備足契內銀取回原典；如至限無銀清還，其大租穀永付原佃人再收為利息，不敢異言生端滋事。.....

46、立杜賣番租契字大肚中北社番高田氏有承祖父遺下番租粟四石貳斗五升，配在茄投庄后洋南勢木車路東圳頭節，田六分貳厘五絲，佃人陳國珍記。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番租粟四石貳斗五升出賣，先盡問番親兄弟姪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原佃人陳國珍記出首承買，.....其銀契即日全中交收足迄，將此番租付買主掌管，收租抵利，永為己業，自此一賣千休，如藤割斷，復日身及子孫亦不敢言找贖之理（底線筆者所加）。.....

編號 23 地契雖註明典限期滿時（長達 10 年），天色、烏義九兄弟仍可備銀

贖回，然契字內又載明「如至限無銀清還，其大租穀永付原佃人再收為利息，不敢異言生端滋事」，由此顯示，社番若無力贖回，大租權仍付典主（佃人）永久掌管；因此，雖為典契，然實際上卻有可能永久「出典」了。而天色、烏義九兄弟確有可能無銀贖回此大租權，契字後便再添載：「道光九年初九日，天色胞叔親病故乏銀，喪費無資，色再墾向銀主加添典佛銀九大員正完足」，前銀未清，又追加銀兩，離贖回之日似乎愈來愈遙遠了。<sup>10</sup>而編號 46 地契，社番已將土地之收租權利，賣斷給漢人，社番連僅存之收租權益亦將之杜賣（此應為最後不得已之手段），在在顯示出大肚社人之貧困，生活無以為繼。

另外，依據上表，亦發現番漢雙方所立之「永耕開墾」契字，雖名義上土地未出賣，然若由契約之內容來看，實際上與杜賣無異，<sup>11</sup>上表編號 1、46、47 地契，即為此種「變相的杜賣」型態：

- 1、立永出耕墾荒山契字南大肚社番愛箸，有承祖父遺下荒山一所，坐落土名中崙，.....今因乏銀費用，情願將此荒山出墾永耕，先盡問通土番親等俱不欲承受，外託中引就歸與義學官田庄漢人陳麟瑞出首承墾永耕（底線筆者所加），.....同中即日見銀、字兩相交收足訖；其荒山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經副園產或栽種樹木，明約將來山底無出色者不敢言，如有出色者，或五穀，或樹木，逐年配納大租銀三角。自此一賣干休，日後子孫不敢言找言贖之理，亦不敢生端阻擋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 46、立永耕山埔園契字大肚中北社番業主為鴨九，有承祖父遺下埔園一埕，

<sup>10</sup> 大租權的長期出典，筆者基本上仍將之視做土地流失的一種，或更精確的說是土地的「暫時」流失，在長期出典的情形下，社番無大租可收，故表面上雖為業主，然實質上並無業主之權益，且社番在無銀贖回情形下，最後便常將之賣斷。

<sup>11</sup> 陳秋坤即認為，由於官方規定，番產不能自由買賣，民間番漢田業買賣仍採「永耕」或「典借」名義，替代買賣事實。有些民間田產買賣契約，明白指出「官定章程番漢不能買賣，故立永耕課借，以代盡根杜賣之事」。參閱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頁 44 註 18。

土名址在井仔頭庄後，.....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埔園出賣永耕，先問社內番親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大肚中堡山腳庄林元龍出首承買永耕，.....即日全中交收足訖，其埔園俱各踏明界址，皆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永耕為業，自此一賣干休，割藤永斷，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 47、立永耕山埔園契字大肚中北社番業主為鴨九。有承祖父遺下山埔園一所陸坵，坐落土名犁份庄西南畔，.....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埔園出賣永耕，先問社內番親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大肚中堡山腳庄林元龍出首承買永耕，.....即日全中交收足訖，其山埔園立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自此一賣干休，割藤永斷，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由上引三件地契，可發現立契雙方雖以永耕開墾名之，然實際上是以永耕名義行杜賣之實。編號 1 地契雖為漢人承墾永耕土地之契約，然其後加註「自此一賣干休，日後子孫不敢言找言贖之理」；<sup>12</sup>編號 46、47 地契則更明確點出番業主欲將兩處土地「出賣永耕」，後由林元龍出首買下，且「自此一賣干休，割藤永斷」。

大肚社地域在雍正末年在業戶制開墾方式下，大片土地已過戶給漢人請墾陞

<sup>12</sup> 有趣的是，在此件地契中，寫道：「其荒山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經副園產或栽種樹木，明約將來山底無出色者不敢言，如有出色者，或五穀，或樹木，逐年配納大租銀三角」。亦即漢人陳麟瑞開墾後，如果無法墾成或收成不好，社番便不再過問，隨其自便，但如果收成良好，社番便要向陳麟瑞收取大租銀。由此看來，陳麟瑞尚未取得完全的土地支配處分權，某種程度上，仍受社番之監督。由此，也可看出，大肚社人似乎並不在乎是否對土地擁有支配使用權，他們在意的為是否能透過土地取得收租之權益，因此，若土地無法獲取收租之利益，對土地是否便從此歸漢人掌管耕作，似乎無意也無興趣置喙。不過上述的現象，若由漢人角度觀之，是否此荒山的賣價較高（76 大員的賣價是否較高，當然尚須與當時之土地種類及價格做一比較，方能得一定論），故在番漢雙方之協調折衷下，所定之一「變通條款」？此一推測似亦有可能性。不過，基本上仍可得出一大致之觀察，即大肚社人主要重視土地的收租權益，而較不是土地的耕作使用價值。

科，而其他規模較小由番社或社番出 土地的自墾制，由上表 5-1 中杜賣、典讓土地與番租之時間與地點來看，乾隆、嘉慶年間主要集中在南大肚社社口附近與社腳庄一帶，以及中北大肚社地頂街、山腳飯店（山仔腳）、北勢尾（山仔腳附近）。<sup>13</sup>將雍正末年起，迄乾隆、嘉慶年間所流失之土地綜合來看，已幾乎佔大肚三社平原區大部份土地範圍，顯示在乾隆、嘉慶年間，大肚社平原區的土地大多已落入漢人手中。且由於平原區大部份的土地已陸續典賣給漢人，迄光緒初年，臺地上的犁份庄、井仔頭庄土地也相繼出賣。

由上所述，顯示出大肚社人在雍正末年、乾隆初年起便開始杜賣土地，<sup>14</sup>在不斷典讓、杜賣土地的情況下，土地已幾乎流失殆盡。在原居地土地嚴重流失下，也直接間接導致大肚社人參與道光年間的入墾埔里行動，另覓新生活空間。<sup>15</sup>

---

<sup>13</sup> 其後，道光至同治年間的土地典賣，仍主要集中在南大肚社腳庄、中北大肚社茄投、山仔腳、北勢尾、南勢份一帶，由此顯示，大肚三社人杜賣土地的地點大部份集中在其社址附近一帶：南大肚社集中在社腳庄一帶，中北大肚社集中在頂街、山仔腳一帶。這樣的空間分佈透露出何種意義？筆者推測或許社址附近的土地，因為社番所聚居之處，故較晚杜賣，另亦有可能社址附近土地因多為社番招佃開墾的自墾制，在較能保有大租下，土地流失較慢。不過，上述的推測，仍有待進一步之驗證。

<sup>14</sup> 對於熟番杜賣土地的緣由，施添福以竹塹地區為例，認為「乏力自墾」、「乏銀費用」、「缺乏口糧」等只為表面理由，事實上的原因為課餉繁重、勞役多和供差繁。而在未能提供一個能夠「力農」的安定環境下，社番只好紛紛將土地杜賣給漢墾戶。陳秋坤則認為影響土著從事水田農作的因素相當複雜，官僚勢力的干擾，只是其中部分因素。認真追究起來，土著部落的地理位置、漢化時間以及人力、資金的配備等等，都是影響土著學習水田農作意願的要素。而將土地作為商品來交換及買賣對平埔族地主亦有相當大之誘因。John Shepherd 則由熟番本身的意願與觀點出發，首先男性認為力農惟反傳統的性別分工，農事是女人的工作，非屬男人。此外，農作是件須大量勞力密集之耕作型態，也減低了熟番力農的意願；因而某些熟番寧願將土地出 給漢人耕作，以獲取收租權益。參閱施添福，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頁 67-92；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59 註 11、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頁 31-32；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366。

<sup>15</sup> 對大肚社的入墾埔里，下一章中將再做探討。

### 三、水裡社

水裡社地域大片土地（新盛庄）開墾之初是以墾區莊的形式，而是否如大肚社之例，一開始便將土地出賣給漢人，或是另行私下代納番餉，因無相關資料佐證，目前尚無法釐清。不過，其他規模較小的土地，是由社番或番社招佃開墾的自墾制，而由目前所收契約來看，乾隆年間起，水裡社人已開始將土地杜賣或典讓給漢人，下表為清代水裡社人杜賣、典讓土地的紀錄：

表 5-2 清代（乾隆迄光緒）水裡社人杜賣、典讓、典賣土地之契約

編號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資料來源
1	乾隆 13 年 (1748)	杜賣田契	水裡社土目甘馬轄、大宇全眾白番	何睿	長興庄厝後	臺史所文書， T29.D29.003
2	乾隆 15 年 (1750)	杜賣田契	水裡社土目甘馬轄、大宇全眾白番	何睿、何戴	長興庄厝後	臺史所文書， T29.D29.004
3	乾隆 35 年 (1770)	增典契字	水裡社番阿六萬荖厘、蒲氏毛龜	戴大有		計文德，清代拓墾大肚臺地以西埔園之土地取得問題初探，頁 168
4	乾隆 35 年 (1770)	典契	水裡社番婦貓干	陳宅	水裡社北勢崙	臺史所文書， T29.D29.168
5	乾隆 50 年 (1785)	杜賣山園契	水裡社番婦貓干	嚴文蔚	石坵仔口烏窰後	同上， T29.D29.013
6	乾隆 51 年 (1786)	杜賣山埔地基契字	水裡崎腳庄何霜榮承父遺下買過水裡社番	賴五行	水裡社北勢崙	同上， T29.D29.015
7	嘉慶 7 年 (1802)	洗找山埔契	水裡社番土目大宇澤全眾白番	賴五行	水裡社北勢崙	同上， T29.D29.022
8	嘉慶 9 年 (1804)	典契字	水裡社阿甲志目	何六叔	羊寮仔庄前	同上， T29.D29.026
9	嘉慶 15 年 (1810)	典契字	水裡社土目阿甲清等人	茄投庄陳最	北勢木崁下	計文德，頁 168
10	嘉慶 23 年 (1818)	開墾永耕字	水裡社番大宇澤	張媽從	新庄仔庄挑龜仔埕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92
11	嘉慶 24 年 (1819)	給墾山埔契字	水裡社番大宇荖、百馬良	張貴、張行	新庄仔崙頭	同上，頁 568
12	嘉慶 25 年 (1820)	永耕山埔園契字	水裡社番業戶瓦厘龜律	山腳庄林丙	水裡社西勢	臺史所文書， T29.D29.32
13	嘉慶 25 年 (1820)	胎典山園契字	水裡社番阿眉安高	賴進仁	社後東勢竹園內	同上， T29.D29.168
14	道光 2 年 (1822)	典租粟契	水裡社番阿媽無私	賴道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61
15	道光 19 年 (1839)	杜賣山園契	水裡社番阿春毛龜	江宗	番社西北勢	同上， T29.D29.168
16	道光 20 年	永耕字	水裡社番大宇澤	何縱	烏瓦窰前	同上，



	( 1840 )					T29.D29.043
17	道光 24 年 ( 1844 )	永耕字	水裡社番阿春毛龜	林四義	水裡社西北勢坐落土名虎頭山崙	同上， T29.D29.168
18	道光 24 年 ( 1844 )	永耕付管山園埔字	水裡社番阿讓高骨	林四義	水裡社西北勢坐落土名虎頭山崙	同上， T29.D29.168
19	同治 8 年 ( 1869 )	永耕契字	水裡社番業戶瓦厘龜律	林元龍	烏瓦窠	同上， T29.D29.064
20	同治 8 年 ( 1869 )	賣番大租契字	水裡社番瓦厘龜律	林元龍	新盛山腳庄後	同上， T29.D29.065
21	光緒 6 年 ( 1880 )	典山園契字	水裡社番阿坤龜律	陳烏智	社後東勢竹園內	同上， T29.D29.168
22	光緒 8 年 ( 1882 )	永耕字	水裡社番婦阿粉四美	山腳庄林榮利	水裡新盛庄	同上， T29.D29.082
23	光緒 9 年 ( 1883 )	杜賣盡根山園契字	水裡社番烏肉阿尾	林美利	社邊北勢	同上， T83.D83.014
24	光緒 13 年 ( 1887 )	杜賣盡根園契字	水裡社番婦阿市	林元龍	社後西北勢	同上， T29.D29.168

依據上表，可發現水裡社人之土地亦透過典讓、杜賣之方式，流失至漢人名下。另外，也發現上表中有 8 件地契，是以「永耕開墾」的名義將土地轉賣給漢人，而可再分成兩種形式，第一種為以永耕或給墾名義行杜賣之實，此包括上表編號 11、12、19 之地契：

- 11、同立給墾山埔契字水裡社番業主大字荖、百馬良，有承祖父遺下山埔一處坐落土名在新庄仔崙頭，.....今因社內乏銀費用，愿將此山埔一處出賣，先問盡社內番親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招與新庄仔庄漢人張貴、張行兄弟出首給墾承買（底線筆者所加），即日同中三面議定時值給墾價銀五大員正。即日同中兩相交收足訖；隨即踏明四至界址，交付與買主張貴、張行兄弟前去掌管，開築成業，耕種收抵為利息，各不敢刁難。.....此山埔一賣干休，如割藤永斷，日後子孫不敢言找贖之理（底線筆者所加）。.....
- 12、立永耕山埔園契字水裡社番業戶瓦厘龜律，有承管下山埔園一崙，址在水裡社西勢，.....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山埔園出賣，先問社內番親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大肚中堡山腳庄漢人林丙觀出首承買永耕

(底線筆者所加), 全中三面議定時值山埔園價銀二十大員庫秤一十四兩正銀。即日全中交收足訖, 其山埔園隨即踏明界址, 交付銀主前去掌管, 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 生端滋事。.....

- 19、全立永耕契字水裡社番業戶瓦厘龜律, 有自己建置得水田大小四坵, 址在烏瓦窯, 年配納番大租粟三斗正。.....今因乏銀費用, 托中引就向與水裡崎腳庄漢人林元龍出首承買永耕 (底線筆者所加), 時三面議定值田價佛銀四十大員庫秤二十八兩正。銀即日全中親收足訖, 其田地隨即踏明界址, 交付銀主前去起耕掌管, 招佃耕作, 收租納課, 永為己業, 自此一賣終休, 割藤已斷, 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之理, 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 (底線筆者所加)。.....

上引三件地契中明確的寫出:「外托中引就招與新庄仔庄漢人張貴、張行兄弟出首給墾承買」、「托中引就向與水裡崎腳庄漢人林元龍出首承買永耕」、「外托中引就向與大肚中堡山腳庄漢人林丙觀出首承買永耕」, 甚且加注「自此一賣終休, 割藤已斷」, 露骨的表露出以永耕名義行杜賣之實。

另外, 第二種形式的永耕契字中, 雖未明言有關「買賣」的字句, 但由實質內容觀之, 實際上與杜賣無異, 上表編號 10、16、17、18、22 之地契便是如此, 茲引編號 10、17、18 地契為例, 以窺其一斑:

- 10、立開墾永耕學番水裡社大字澤, 有承祖父遺下荒埔一處, 坐落土名址在新庄仔庄挑龜仔埕, 每年配納大租粟四斗一升五合。.....今因乏銀費用, 將此園一埕抽出半埕, 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受, 外托中引就與新庄仔庄張媽從出首耕墾, 三面議定備出價佛銀十二大員正。銀即日同中交收足訖; 其荒埔隨即明踏界址, 交付銀主前去掌管, 耕作成業, 收租納課, 永為己業。自此開墾, 葛藤永斷, 日後子孫不敢言貼, 亦不敢言贖 (底線筆者所加)。.....

- 17、立給永耕山園埔字水裡社番阿春毛龜等, 有自己應份得本社西北勢坐落土名虎頭山崙山園一坵, 併帶山埔, .....今因乏銀別置, 將此山園及山

埔托中貓霧揀社番光艷、阿眉突引就給付與漢人林四義觀出首永耕，前去掌管。.....其山園及山埔踏明四至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任其開築墳墓安葬，栽種樹木，永為實業，.....其山園山埔永遠聽銀主掌管，日後不敢異言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 18、立給永耕付管山園埔字水裡社番阿讓高骨等，有承管妻胞兄阿眉毛龜，自己應份得本社西北勢，坐落土名虎頭山崙山園一坵，併帶山埔，.....今因別置乏銀，情愿將此承管山園及山埔，托中貓霧揀社番光艷、阿眉突引就給付與漢人林四義觀出首承管。.....其山園及山埔踏明四至界址，交付銀主掌管耕作，任其開築墳墓安葬，栽種樹木，永為實業，.....其山園山埔聽銀主永遠掌管，日後不敢異言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上引三件地契中，漢銀主在取得永耕開墾權後，可任自「耕作成業，收租納課」，且註明「自此開墾，葛藤永斷，日後子孫不敢言貼，亦不敢言贖」或是「其山園山埔聽銀主永遠掌管，日後不敢異言生端滋事」，在此情況下，熟番不要求日後贖回（言贖），也不要求貼納番餉（言貼），漢人可將田地永久為業，故名義上雖為「永耕」，無異於「杜賣」。<sup>16</sup>

早於雍正末年，水裡社平原區之大片土地——新盛庄——已遭漢人以墾區莊（業戶制）形式招佃開墾。而其他規模較小的土地，係由番社或社番招佃開墾的自墾制，可由上表 5-2 水裡社人杜賣、典讓土地之時間與地點來看，乾隆年間與其後主要集中於臺地西麓水裡社址附近及以東臺地上新庄仔庄；斷層帶以西長興庄、烏瓦窯一帶。<sup>17</sup>綜合上述兩點來看，水裡社土地由雍正末年起，迄乾隆年間大多已流失至漢人名下，而在社番陸續的典讓、杜賣土地，或以開墾永耕名義行買賣之實，土地大量流失下，使得水裡社人與大肚社人同樣面臨生計日蹙的窘

<sup>16</sup> 上引編號 10、16、17、18、22 之地契中，且未見記載是否需每年再配納番大租或番地基錢，因此，「杜賣」的事實似乎更加的明顯。

<sup>17</sup> 參見第四章水裡社地域漢人拓墾之探討中，對長興庄、烏瓦窯地點之分析。

境，也同樣參與道光年間の入埔行動。

## 第二節、沙轆社與牛罵社

### 一、沙轆社

筆者由目前所收清代沙轆社相關契約文書(參見附錄二)的整理，發現杜賣、典讓的情形較之大肚、水裡二社少了許多：

表 5-3 清代(乾隆迄光緒)沙轆社人杜賣、典讓、典賣土地之契約

編號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資料來源
1	嘉慶 16 年 (1811)	賣盡根契	遷善南社番阿百 萬芳、陳眉萬芳	張漢	紅毛井埔	《沙鹿鎮志》，頁 124
2	嘉慶 20 年 (1815)	杜賣山埔園契	遷善南社番業主 瓦籬斗	鄭振鳳	鹿寮後橫山仔	《清代台灣大租 調查書》，頁 718
3	道光 20 年 (1840)	開墾永耕埔地 契字	沙轆北社番阿眉 悅	林天長	鰲栖下魚寮庄	《梧棲古文書史 料專輯》，頁 10
4	咸豐元年 (1851)	永耕海招銀字	遷善南北社眾番	山腳庄 林元龍	梧棲塗葛堀港	臺史所古文書， T29.D29.052
5	同治 2 年 (1863)	胎借銀字	遷善南社土目烏 蚋大甲	楊芳六		同上， T50.D50.019
6	光緒 10 年 (1884)	永耕字	遷善南北社眾番	下厝庄 某號	竹林庄後土名 大崙	《台灣私法物權 編》，頁 369
7	光緒 18 年 (1892)	杜賣盡根永耕 字	遷善南社番嘉基 打毛	蔡太和 堂	竹林庄	台灣公私藏古 文書影本，第 10 輯 150 號
8	光緒 18 年 (1892)	永耕字	遷善北社番文瑞 山悅	陳春	本社後北勢溪 仔邊	《清代台灣大租 調查書》，頁 534
9	光緒 20 年 (1894)	杜賣盡根田契 字	遷善南社番生阿 海	社口庄 楊紹泉	牛罵頭竿蓁林 庄	計文德，頁 167

依據上表，可發現較之大肚、水裡二社，沙轆社人杜賣、典讓土地的情形似不多見；雍正、乾隆年間未見沙轆社人出賣土地的紀錄，要到嘉慶中葉以後，才有杜賣土地的情形發生(編號 1、2 地契)，但嘉慶以後迄清末，杜賣土地的情形亦鮮見。此外，上表也顯示沙轆社人土地流失除直接杜賣外，亦另外透過兩種形式，一為透過永耕開墾的名義將土地出賣(編號 3、4、6、8)，另一為長期出典

收租權（番大租），向漢人借銀（編號 5），茲引編號 3、4、5 地契為例說明之：

- 3、立給開墾永耕埔地契字人沙轆北社番阿眉悅等，有承祖父遺下承管埔地一所及厝地基，坐落土名鰲栖下魚寮庄頭，.....今因乏銀別用，愿將園地出賣，先問社中番親人等不欲承受，外託中引向與漢人林天長出首承買（底線筆者所加），.....即日全中親收足訖，隨將此埔園地基踏明界址，交付銀主林天長前去掌管，開闢成田，以及起蓋大厝，任從主裁，自此一賣干休，割藤永斷，日後悅及子孫不敢阻擋，言及找贖，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 4、全立永耕海招銀字人遷善南北社番等社主六管祿、業戶愛箸春長行、烏蚶山長行、屯目大宇天福、甲首大宇瓦厘，有承祖父遺下海招一帶，坐落土名址在梧棲塗葛堀港，.....今因乏銀公費用，先盡問本社番等不欲承受，外託中引就向與山腳庄漢人林元龍出首承買（底線筆者所加），.....即日全中親收足訖，其海招隨即踏明界址，交付漢人林元龍前去掌管，永為己業，管收海招稅、捕魚蝦餉項抵利，不敢異言生端滋事，自此一賣終休，割藤永斷，日後闔社眾番等不敢言及找贖之理（底線筆者所加）。.....
- 5、立胎借銀字遷善南社土目烏蚶大甲等，今因乏銀公費，托中向就本佃人楊芳六官身上借出佛面銀參拾大員（底線筆者所加），.....即日全中交收足訖，時三面言約每員每年愿貼利息粟三斗，行歷年至六月早季收成之日，將業戶分下土目辛勞應收竿蓁林庄大租粟拾石正，付銀主先扣抵利息粟（底線筆者所加），.....其母銀不拘年限以拾月為滿，聽甲備齊借內字銀，清還銀主，贖回借字，如至期無銀可還，依舊照借字內所約，不敢異言生端滋事（底線筆者所加）。.....

上引編號 3、4 地契清楚顯示土地所有權之轉移，漢人將土地全部權益買斷，社番日後已無權過問。編號 5 地契則說明社番在乏銀費用下，透過典押番大租向佃人借錢，在有可能無能力贖回的情形下，漢佃人將獲得土地之全部權益（大租

+ 小租)。

依據上表，顯示出沙轆社人杜賣、典讓土地的範圍主要在社址附近竹林庄、紅毛井埔、北勢溪邊一帶；西北部鹿寮、竿蓁林庄一帶；近海梧棲下魚寮庄、塗葛堀港一帶。此一杜賣土地範圍不大，未涵蓋沙轆社平原區之大片土地南簡庄及大庄一帶。另外，也可發現沙轆社人杜賣、典讓土地的情形，要到光緒末年以後才漸增多（編號 6、7、8、9 地契），而這樣的情形也持續到日治初期。<sup>18</sup>由此顯示，似乎要到清末沙轆社人土地才開始逐漸流失至漢人手中。沙轆社人土地杜賣情形少，土地流失較慢，此一現象背後原因為何？筆者由漢人本區的開墾類型與方式此一視角切入，認為兩者在某種程度上似乎相關。依據上一章之討論，沙轆社地域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漢人拓墾，主要採自墾制的方式，即由漢人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土地，墾成後繳納一定之大租額。在此情況下，番社或社番可透過業主的身分，向漢佃收取大租，擁有所謂的「田面權」；比較同時期的大肚社（大肚社人甚至一開始便將土地賣斷）、水裡社在業戶制（墾區莊）的運作方式下，大片土地已過戶給漢人請墾陞科，沙轆社人在漢人墾拓初期似乎尚能保有土地之收租權，土地權益未全部流失（只流失田底租，即小租）至漢人手中（乾隆以後杜賣情形仍不多見）。

## 二、牛罵社

下表為筆者整理牛罵社契約文書（參見附錄一）中記載杜賣、典讓之情形：

<sup>18</sup> 明治 31 年（1898）遷善南社番其仔瓦厘將坐落北勢頭庄下埤厝地杜賣與漢人劉罩；明治 33 年（1900）遷善南社番水蓮班將埤底埔園賣與漢人陳克；以及明治 34 年（1901）遷善北社番桂林山將坐落車路埔園賣與漢人蔡清安。參閱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222.D195.008、009、T102.D102.004。

表 5-4 清代（乾隆迄光緒）牛罵社人杜賣、典讓、典賣土地之契約

編號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關係人	地點	資料來源
1	道光 4 年 (1824)	永耕字	阿甲汝夏	同發號	西勢金瓜園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2	道光 16 年 (1836)	賣契	瓦厘目義	同發號	面前厝	同上
3	道光 16 年 (1836)	永耕字	感恩社烏肉悅、媽 成悅	同發號	本社後北勢田 寮庄	同上
4	道光 17 年 (1837)	永耕字	感恩社蒲夢蘭、蒲 文舉	同發號	埤口	同上
5	道光 29 年 (1849)	永耕字	感恩社阿萬甘	同發號	本社後山腳圳 邊	同上
6	道光 29 年 (1849)	永耕字	感恩社眉眉斗	同發號	埤仔口	同上
7	道光 30 年 (1850)	永耕字	感恩社阿萬悅	同發號	埤口	同上
8	咸豐 10 年 (1860)	永耕字	媽愿愛奪、安生愛 奪	楊水信	社前埤口、社口 庄、竿藁圳	《清代台灣大租 調查書》，頁 525
9	同治 7 年 (1868)	永耕字	感恩社蒲夢蘭、蒲 文舉	同發號	埤口、田寮庄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10	光緒 9 年 (1883)	胎借番大租銀 契字	感恩社通事鰲春 華	水碓庄 王登晉		台灣公私藏古 文書影本，第 3 輯 637 號
11	光緒 14 年 (1888)	給風水地字	感恩社番婦為阿 巴禮	田寮庄 許永豐	許厝寮	臺史所古文書， T076.D076.010

依據上表，顯示出牛罵社杜賣、典讓土地的例子同樣較少，有清一代，未見大量土地流失的情形。若就其杜賣、典讓範圍觀之，主要集中在社址附近埤口、山腳圳、西勢、社口庄等地；社址以北田寮庄；臺地上面前厝庄、許厝寮一帶。此一土地範圍並未涵蓋牛罵社地域內社口庄、田寮庄以西、以北之土地，以及大甲溪口南岸高美一帶土地。<sup>19</sup>

上述現象之原因，筆者認為亦與沙轆社相同——應與漢人本區的拓墾類型與方式相關。牛罵社拓墾方式，與沙轆社相同，主要採自墾制的方式，故有清一代，似較能保有土地之收租權益，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

<sup>19</sup> 此外，依據上表，筆者發現道光年間的土地流失，多數以永耕的名義將土地賣與同發號楊舒坤家族。由 同發號同治甲戌年立錄置業號頭抄總簿 中之記載顯示（參見附錄五），同發號由乾隆迄光緒年間陸續在西勢置產，並大量收購平原上之水田，在道光年間為最盛期，此也反映在上述道光年間牛罵社人以永耕名義出賣土地給同發號的現象。

### 第三節、小結

本章主要在透過契約文書之分析，呈現各社土地流失範圍與流失速度的不同，所獲致的現象為：大肚、水裡二社土地在雍正末年、乾隆初年起已開始陸續典讓、杜賣給漢人，有清一代，二社土地已多數流失至漢人手中；而沙轆、牛罵二社則較少見杜賣、典讓土地的情形，且土地流失的範圍亦不大。筆者將此現象與漢人的拓墾方式做一關聯，認為漢人拓墾之初，大肚、水裡二社在業戶制（墾區莊）的運作方式下，大片土地已過戶給漢人請墾陞科，而同時期沙轆、牛罵二社則在自墾制的方式下，似乎較有助於保有土地之收租權，土地權益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

大肚、水裡二社在土地外流嚴重的情形下，生計日蹙，多數社人因此參與道光年間入墾埔里的行動，這也是下一章所要討論之處。另外，下一章中，將藉由入墾埔里的行動，再分析本區的社群聯結關係。



## 第六章、四社遷移與否與社群的聯結關係： 以入墾埔里事件為例

本章首先分析拍瀑拉各社在土地流失下，是否遷移的問題，將以入墾埔里事件為例，探討各社入埔與否與背後之原因。接著分析道光年間本區各社群入墾埔里所顯現之社群聯結，來與第三章討論所得之社群關係做比較，瞭解是否依循原有之社群互動聯結關係而行，還是另有其他的現象。

### 第一節、入埔與否與其原因

#### 一、大肚社與水裡社

上章中討論到大肚、水裡二社迄乾隆年間土地已幾乎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而在原居地土地流失嚴重，「生活空間擠壓」的情況下，<sup>1</sup>使得二社人大量參與道光年間的入墾埔里行動，<sup>2</sup>並在其地聚居，形成水裡城庄、大肚城庄、生番空庄。<sup>3</sup>不過大肚社人雖大量遷居埔里，然並非全數，迄清末（光緒年間）仍有社人留

<sup>1</sup> 鍾幼蘭即認為由於漢人大量入墾，所導致的人口壓力，對平埔族群而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生活空間的擠壓。漢人拓墾導致生態環境之改變，這對漢人而言是象徵更多的生存機會，對平埔族群卻是對原有漁獵游耕生活方式的擠壓，於是許多番社選擇了遷移。鍾幼蘭認為「生活空間擠壓」是當時的歷史情境，而在此時代背景下，「族群遷移」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參閱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頁 108。

<sup>2</sup> 對二社的入埔行動及聯結關係，將在下節中做討論。

<sup>3</sup> 伊能嘉矩於明治 30 年（1897）抵埔里做田野調查，製成一表，紀錄盆地內各部落之戶數與人口。後劉枝萬再參酌諸表，並補述其歷年調查所知，而新訂一表。在劉枝萬的表格中，大肚城庄為大肚社、貓霧揀社人所聚居（9 戶 40 人）；生番空庄為大肚社人聚居處（18 戶 71 人）；水裡城

居原地，收取番租。不過在土地幾乎杜賣、典讓殆盡下，所能收取番租的土地應極有限。由目前所收契約文書，清末同治、光緒年間僅得四件契約記載繳納番大租、地基租的情形，其地點一在茄投庄後下埔仔洋（同治 4 年、12 年），一在頂庄（光緒 10 年），一在井仔頭庄（光緒 11 年）。<sup>4</sup>此似乎反映出迄清末大肚社人所能收租土地已所剩無幾的現象。

而水裡社亦應有社人留居原地，未參與入埔。由目前所收契約文書記載，清末同治、光緒年間收取番大租的記載有五件，不過地點均在烏瓦窯（同治 5 年、8 年；光緒 11 年）。<sup>5</sup>似乎也同樣反映水裡社在土地大量流失的情形下，清末可收租土地所剩無幾的現象。

## 二、沙轆社與牛罵社

沙轆、牛罵二社是否也同樣參與道光年間的入墾埔里？在清代文獻史料中並未見牛罵社與沙轆社入埔之記載，是遷入的年代較晚？或是否兩社並未參與入埔？由於清代文獻未見兩社遷移埔里之記載，若由日治初期（1897）伊能嘉矩對埔里盆地平埔社群之調查來看，記載有大肚溪北之水裡社、大肚社分由頭人 Ora、Agada 率領社人入墾埔里；<sup>6</sup>另外伊能嘉矩對埔里盆地內平埔聚落分布之調查，亦只見大肚城庄與水裡城庄之記述。<sup>7</sup>因此，在 19 世紀末之文獻中仍未見沙

---

庄為水裡社人聚居處（11 戶 46 人）。參閱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8），頁 87-88。

<sup>4</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51、59；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092.D092.040；《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頁 865。

<sup>5</sup> 董倫岳撰文，《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頁 9、15；臺史所古文書，編號 T029.D029.062、064、126。

<sup>6</sup> 劉枝萬認為伊能所謂水裡社頭人 Ora，與道光 8 年 承管埔地合同約字 之戴烏蚋為同一人；而 Agada 音諧 承管埔地合同約字 之愛箸蛤肉，可能為同一人，但仍須待考。參閱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34-35、38。

<sup>7</sup> 伊能嘉矩對埔里盆地的調查參閱 埔里社平原的熟番，《番情研究會雜誌》2（1899），頁 31-55；

轆社、牛罵社有入埔之記載，若再將時間往後推，劉枝萬於 1958 所新考訂之平埔聚落表中，仍只見有大肚社、水裡社之名。<sup>8</sup>綜上所述，由清代文獻迄日治、戰後學者之調查研究，均未見牛罵、沙轆兩社入墾埔里之記載，兩社似乎未參與入埔之行動，原因為何？

劉枝萬曾認為平埔社群入埔的遷徙，並非一次蜂湧以入，而是分批斷續進行，其下限恐時代愈降，規模愈小，故文獻闕如。<sup>9</sup>如依此觀點，牛罵、沙轆兩社可能由於入墾之年代晚，且入墾人數少，故清代相關文獻中未見記載。若上述說法成立，那是否有可能牛罵、沙轆二社入墾年代較晚？若參照伊能嘉矩 1897 年對埔里盆地熟番聚落的調查，卻仍未見牛罵、沙轆二社之記載；伊能之調查距道光年間平埔社群入埔的時間相隔約 70 多年，可信度應極高。由此看來，牛罵、沙轆二社入墾埔里年代較晚之說法似乎無法成立，不過也不能排除兩社入墾埔里的可能性，本文較持之看法為可能兩社或許有少數人有參與入埔，但因應屬零星少數，故相關文獻中未見記載，<sup>10</sup>也未如大肚社、水裡社人之大量入墾，形成水裡城庄、大肚城庄、生番空庄。<sup>11</sup>兩社人為何未大量參與入埔之行動，原因為何？

依前一章的討論，顯示較之水裡、大肚二社，沙轆、牛罵二社少見杜賣、典

---

埔里社的平埔番聚落，《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81（1909），頁 437-440。

<sup>8</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87-90。

<sup>9</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36。

<sup>10</sup> 若依洪麗完對沙轆社的研究，她指出沙轆社或有零星量少的移居者（如移徙花蓮、埔里等地），似未有舉族遷居之舉，多數社民仍留居原地，學習漢人生活方式，因而有關清代嘉道年間中部土著十餘社之大遷徙舉動，相關資料未見沙轆社入埔之具體說明。洪麗完亦不排除沙轆社入埔的可能性，不過她認為多數社民應是留居原地。對牛罵社之研究中，洪麗完則認為部分社人留居原地，部分社人則參與入墾噶瑪蘭（宜蘭）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222-223；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頁 22-23。

<sup>11</sup> 伊能嘉矩於明治 30 年（1897）抵埔里做田野調查，製成一表，紀錄盆地內各部落之戶數與人口。後劉枝萬再參酌諸表，並補述其歷年調查所知，而新訂一表。在劉枝萬的表格中，大肚城庄為大肚社、貓霧揀社人所聚居（9 戶 40 人）；生番空庄為大肚社人聚居處（18 戶 71 人）；水裡城庄為水裡社人聚居處（11 戶 46 人）。參閱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87-88。

讓土地的情形，土地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換另一個角度想，我們是否可做這樣的推論——因此，沙轆社較能保有土地收租權，故多數人迄清末仍留居原地？洪麗完曾謂「沙轆社或有零星量少的移居者，但似未有舉族遷居之舉，多數社民仍留居原地，學習漢人生活方式」。<sup>12</sup>而讓沙轆社多數人不參與遷徙，留居原地的機制是什麼？應該就是土地收租權的保有，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吧！故筆者擬就目前所收之契約文書，來觀察分析迄清末沙轆社人是否多能保有地權，下表為整理清末同治、光緒年間沙轆社人收取番租的情形：

表 6-1 清同治、光緒年間沙轆社人收取番大租之記載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地點	內容	資料來源
同治 2 年 (1863)	典契字	陳元亨	二 榔庄	年載納北社番業主大租谷六石六斗正	臺史所古文書， T102.D102.009
同治 3 年 (1864)	典田厝契字	陳日亨	二 榔庄	年納北社通事大租粟六石六斗	同上，T102.D102.008
同治 3 年 (1864)	杜賣盡絕根契字	紀泰	南簡庄	年配納遷善社大租銀一錢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10 輯 98 號
同治 4 年 (1865)	杜賣絕根田園厝契	紀萬有	三 榔庄	水田年納番業主大租一百文	同上，10 輯 99 號
同治 5 年 (1866)	轉耕字	李番兄弟	沙轆街	歷年十月冬配納遷善南社番業主阿尾德大租銀六角正	同上，10 輯 224 號
同治 5 年 (1866)	繳盡退耕番田契字	王來益	營盤前	年配納遷善北社番業主阿銀、傳來大租粟十二石正	同上，10 輯 225 號
同治 5 年 (1866)	盡根字（五十七號）	蔡朕	陳厝庄	年納遷善北社業戶大租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同治 7 年 (1868)	典田字	林模兄弟	鹿寮庄四甲二	年配納番業主大租谷三石八斗四升	臺灣分館藏 古文書微捲，編號 700487
同治 8 年 (1869)	杜賣盡絕根田契字	陳元亨	榔庄	年配納北社通事大租粟六石六斗正	同上，T083.D083.009
同治 8 年 (1869)	杜賣盡斷根田契字	陳日亨	榔庄	年配納北社通事大租粟六石六斗正	同上，T083.D083.011
同治 10 年 (1871)	盡根字（六十一號）	陳註	沙轆北勢坑	年納遷善南社大租	同上，T002.D002.001
同治 11 年 (1872)	轉繳招耕字	李自守	大車路下、北勢埔	歷年配納遷善南社番卻仔打毛、蒲氏武葛番大租谷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10 輯 227 號
同治 12 年 (1873)	鬮書字	泉成號蔡守素等六房	二 榔庄	年配納遷善北社大租	同上，10 輯 312 號
同治 13 年 (1874)	杜賣盡絕斷根田契字	蔡開枝	鹿寮庄前柳樹溝	年納遷善南社番宇厘支理大租谷二石	同上，10 輯 111 號
光緒 5 年	繳盡招耕	翁位	社口庄	年配納遷善南社番婦阿才支	同上，10 輯 229 號

<sup>12</sup> 洪麗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222-223。

(1879)	字			理大租谷三石	
光緒 7 年 (1881)	轉繳退耕 田厝契字	蔣乞	竹林庄、坑 仔內	年納遷善南社番阿二打毛大 租谷三斗；阿伯妹大租谷三 斗	同上，10 輯 231 號
光緒 8 年 (1882)	繳盡招耕 字	翁從	社口庄	年納遷善南社番婦阿才支理 大租谷三石半	同上，10 輯 234 號
光緒 8 年 (1882)	轉繳退耕 田契字	陳永	沙轆北勢埔	年配納遷善南社番阿觀武葛 番大租谷二石	同上，10 輯 233 號
光緒 8 年 (1882)	繳退耕番 水田契字	蔡禮物	四甲二庄	年配納遷善北社番婦阿二悅 大租粟八斗	同上，10 輯 232 號

依據上表，可發現在清末同治、光緒年間沙轆社人可收取番租之土地仍多，分佈在平原區之南簡庄、陳厝庄、二 榔庄、三 榔等地；社址聚落附近之沙轆街、營盤、北勢埔、社口庄、竹林庄等地；以及聚落北部之鹿寮庄、四甲二庄等地。此顯示出，沙轆社人在清末仍保有許多土地之收租權，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此現象一方面可與沙轆社人杜賣、典讓土地情形少相呼應，另一方面，我們可據此做一合理之推論，即沙轆社因社地未大量流失，在生計得保情形下，毋須大舉外遷，迄清末多數人仍留居原地，收取番大租。<sup>13</sup>

而牛罵社人是否與沙轆社人同樣迄清末仍保有許多土地之收租權呢？筆者整理清同治、光緒年間牛罵社契約文書，列表如下：

表 6-2 清同治、光緒年間牛罵社人收取番大租之記載

年代	契類	立契人	地點	內容	資料來源
同治 4 年 (1865)	胎典借銀 字	蔡神宇	埤口	年配納感恩社番蒲清江大租 谷一斗	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10 輯 486 號
同治 4 年	盡根字（五	紀進香	西勢金瓜園	年配納感恩社業主阿磷大耳	臺史所古文書，

<sup>13</sup> 洪麗完曾透過「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存在，作為戰後尚有部份社民留居今沙鹿鎮的例證。而祭祀公業的設置年代，依洪麗完之考察，大抵不晚於明治 39 年（1906）。由祭祀公業設置年代觀之，或許不必遽下一合理之關聯與論推認為說：沙轆社人迄清末多數仍留居原地，收取番大租，故日治初期便有祭祀公業之設置。不過，換個角度想，「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的設置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沙轆社人並未全面的漢化，仍保有對其「社」的認同。這也讓我們思考到，平埔族人或許在與漢人接觸過程中逐步的「漢化」（這是被動的觀點，由漢人角度觀之），但是否也在面對漢化過程中，有著自行的調適與發展（主動的觀點，由平埔族人角度觀之）；換言之，在討論所謂平埔族「漢化」的討論裡，恐須注意到平埔族人的主動性與本身意願。參閱洪麗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168-170、222。

(1865)	十六號)		庄	大租	T002.D002.001
同治 7 年 (1868)	原轉耕添 借銀字	紀豬	社口尾	年納感恩社番業主大租谷三 十三石八斗	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7 輯 459 號
同治 9 年 (1870)	杜賣盡絕 斷根店契 字	林禮助	鰲頭街營盤 口	年納番業主地基租	同上，10 輯 103 號
同治 10 年 (1871)	杜賣盡根 字(五十九 號)	許柳奇	楊厝寮庄	年納感恩社業主大租谷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同治 12 年 (1873)	添轉招耕 借銀字	蔡守獅	社口尾	年納感恩社番業主大租谷三 十三石六斗	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7 輯 463 號
同治 13 年 (1874)	杜賣盡根 字(六十五 號)	紀萬紫	西勢金瓜園 庄	年納感恩社阿磷大耳大租粟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光緒 4 年 (1878)	杜賣盡根 字(六十六 號)	蔡澳奇	西勢金瓜園 庄	年納感恩社業主地基租錢三 十文	同上，T002.D002.001
光緒 7 年 (1881)	永耕字	媽愿愛奪	埤仔口	每年六月冬應納大租谷一斗	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10 輯 230 號
光緒 8 年 (1882)	招耕字(六 十八號)	楊懋三	楊厝寮庄	年納番業主大租粟一斗	臺史所古文書， T002.D002.001
光緒 10 年 (1884)	給出開墾 字	感恩社通 事蒲炎華	水碓庄	年配納番租谷一斗	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3 輯 258 號
光緒 12 年 (1886)	杜賣盡根 田契字	蔡他	埤口南勢	年納感恩社番清江悅大租谷 三斗	同上，10 輯 135 號

依據上表，顯示出牛罵社人同治、光緒年間收租土地分佈在社址聚落附近埤仔口、西勢庄、社口、鰲頭街（牛罵街）營盤口等地；平原區北部水碓庄；臺地上的楊厝寮庄。此一收租土地分佈數量與範圍，較之沙轆社顯得較少，不過，仍顯示出牛罵社人迄清末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大租的現象。洪麗完曾認為嘉慶年間往墾噶瑪蘭的牛罵社人，應以邊區守隘的屯丁為主，<sup>14</sup>而他們在部落的權力結

<sup>14</sup> 筆者認為嘉慶 9 年（1804）入蘭之熟番諸社以屯丁為主的說法，恐須再商榷。在姚瑩《東槎紀略》有如下之記載：「又有岸裡社、阿里史社、阿東社、東螺社、牛罵頭社熟番遷居其中，荒埔尚未全墾。……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丁」。若入墾者以屯丁為主，筆者將乾隆 53 年（1788）所記載之五社屯丁人數相加（112、119、30、152、27），總數僅為 440 人，未及近千人記載之半，筆者認為此有兩種解讀可能，一為入蘭之熟番諸社，非獨以屯丁為主，有可能多數社人亦參與其中。另一解讀為此 990 餘人之記載，並非只有五社熟番之合計，尚包括其他番社人，可能為文獻記載的缺漏，姚瑩同一書中，便另有以下之記載：「有彰化社番首潘賢文、大乳汗毛格犯法，懼捕，合岸裡、阿里史、阿東、東螺、北投、大甲、吞霄、馬賽諸社番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兩筆記述人數略有差異，記載社名第二則中多出北投、大甲、吞霄、馬賽等社（馬賽

構上，可能居於弱勢的權力邊緣；較能融入漢人社會的社人則未曾參與搬遷之舉。<sup>15</sup>或許融入漢人社會為留居原地的機制之一，但由上述之討論得知，尚須加進牛罵社人土地未大量流失，故迄清末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租的現象。<sup>16</sup>

由本節之討論，顯示出大肚、水裡二社在土地外流嚴重的情形下，生計日蹙，多數社人因而參與道光年間入墾埔里的行動，而或許仍有少數社人留居原地，但在社地多數已流失殆盡的情形下，迄清末所能收取番租的土地實極有限。反觀沙轆、牛罵二社因土地杜賣流失情形較不嚴重，較能保有地權以維持生計，故毋須大舉外遷，迄清末留居原地之社人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租。

---

人包括清代三貂、金包裡、大雞籠三社，故以下馬賽之屯丁總數，是以三社之總合為準〔21、26、14〕。對馬賽人內涵之界定，參閱詹素娟，〈地域與社群：大台北地區原住民族的多群性〉，頁11-16），不過少了牛罵社，若再將這些番社屯丁數目相加（112、119、30、152、128、112、25、61），總數為739人，仍不及千餘人之數。由此看來，上述第二種解讀較無法成立，顯示入蘭行動似乎非獨以屯丁為主，各社社人亦應參與其中，方能達到千餘人之數。參閱姚瑩，《東槎紀略》，卷三 噶瑪蘭原始、噶瑪蘭入籍（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1957），頁71、76。

<sup>15</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23。

<sup>16</sup> 對於熟番留居原地或遷徙的問題，最近在柯志明的著作《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中，與John Shepherd、施添福兩人有精采的對話與理論思辯。書中將John Shepherd與施添福兩人的研究與觀點予以並陳比較，在熟番留居原地抑或流離失所這兩種歷史情境外，提出一新的觀點與詮釋——熟番的「重新配置」(reallocation)。柯志明主要由清廷操控族群政治此一分析視角切入，提出「重新配置」說，他認為熟番離開原居地，但並非流離失所，而是被安頓在特定的地區；而這是因政府為遂行三層族群分布制，利用與熟番結盟的方式，執行隔離生番、漢人的任務。而番大租模式只是清廷利用熟番武力下的衍生物，並非主要的關注點。筆者認為對留居原地、流離失所抑或重新配置的現象似乎不是可截然劃分或整體適用，須考量到研究案例的侷限性與區域性問題，似乎不能遽以概推全臺。以拍瀑拉地域為例，我們可看到水裡、大肚二社因社地幾流失殆盡的情形下，多數人參與入墾埔里的現象（似乎頗符合施添福所觀察之現象），而沙轆、牛罵二社迄清末，在原居地卻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租（似乎符合Shepherd的觀點）。因此，或許當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社群做深入研究後，會有相當的歧異現象產生。另外，番屯政策日後的成效為何？真的有達到熟番保留地的功效嗎？在不同村社間之現象為何？這些問題，都可再做延伸探討。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1-32。

## 第二節、入墾埔里的社群聯結

本節重點在透過道光年間拍瀑拉水裡、大肚二社入墾埔里的行動，分析其所顯現的社群聯結關係，並將其對照第三章中所觀察之社群關係，互為印證，以瞭解原有的社群互動聯結，是否會成為各社人日後在行動選擇時的一種參考或遵循的機制。

關於中部平埔諸社入埔的時間，依學界一般之看法，當不晚於道光 3 年（1823）；<sup>17</sup>且其入墾埔里的特色，是眾社串聯起來集體入墾。以下為道光 3 年入埔諸社所立「公議同立合約字」，記載有眾社集體議定分墾埔地之情形，契字中記載南、北、中大肚三社與水裡社共同參與道光 3 年的入墾埔里，茲將其內容摘錄如下：

為公議同立合約字岸西社原通事潘阿沐、土目潘得慶；岸社總通事阿沐都；貓羅社通事田成發、土目徐明源、隘丁首李甲蚋；南水二社通事轆仔球、土目阿眉錦、烏肉武厘、業戶瓦厘龜律、上港烏義；中北社通事大宇漢泰、社主烏鴉九、土目愛箸武澤（底線筆者所加）；南投社通事吳天送、隘丁首潘八；阿里史社總隊目潘后肉、原通事潘仕安、原屯并阿四老六萬、潘萬成；北投社通事余尉、土目金龍、原屯并乃貓詩、羅良、淡連順、社主朗買亦、蕭榮；貓霧揀社通事高光湖、阿六萬興、土差蒲氏政、六萬成拾捌（底線筆者所加）；另雲社副通潘文格、打必里古老；翁仔社土目潘信文、貴秀；烏牛欄社土目阿打歪肉、阿四老該旦、茅達麻；麻裡蘭社土目潘秀元、朴仔籬等社土目阿沐、阿都奴等切。

.....公同議定合約，凡我同約番親須當約束本社番黎竭力開墾創，所有

<sup>17</sup> 鍾幼蘭指出多數學者常以「公議同立合約字」上的年代——道光 3 年，來推論平埔族群入墾的時間。而鍾幼蘭從「分墾蛤美蘭圖分名次總簿」斷定在道光 3 年時，平埔族群已有分墾埔里盆地內土地的情形，故平埔族群大舉入埔的時間，絕不晚於道光 3 年。參閱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15。



開墾成田成園，按照各社番丁口灶丈量均分，毋許侵入內山擾動生番，毋許引漢人在彼開墾，毋許僱庸漢人在地經營，若有不遵鳴眾革逐，倘有公事應費銀元，議約公同墊出付頭目之番，使費不得退悔，恐口無憑，同立合約字拾肆紙壹樣付各社通士各執壹紙存照。.....<sup>18</sup>

上引契字中之「南水二社」與「中北二社」所指即為南大肚社、水裡社與中大肚社、北大肚社。契字中記錄有南水二社通事轆仔球、土目阿眉錦、烏肉武厘、業戶貴仔龜律、上港烏義與中北二社通事大宇漢泰、社主烏鴉九、土目愛箸武澤等人名。若將上述人名查對相關之契約文書可發現：南水二社通事轆仔球應與嘉慶 20 年（1815）出現之大肚南水二社通事六仔球應為同一人、<sup>19</sup>業戶貴仔龜律為水裡社人、<sup>20</sup>上港烏義為南大肚社人；<sup>21</sup>而中北社通事大宇漢泰亦出現在嘉慶 17 年（1812）之契約中、<sup>22</sup>社主烏鴉九為大肚中社人、<sup>23</sup>土目愛箸武澤為大肚中社人。<sup>24</sup>

<sup>18</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8），頁 39-41。

<sup>19</sup> 嘉慶 20 年（1815）之「杜賣盡根山園絕契」中，出現大肚南水社通事六仔球。六仔球與道光 3 年（1823）之南水社通事轆仔球年代相近，且名字相似，應為同一人。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3。

<sup>20</sup> 道光 2 年（1822）水裡社番與漢人賴道所立之「典租栗契」，記載代筆人為業戶貴仔龜律，與上引道光 3 年（1823）之貴仔龜律應為同一人。參閱《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61。

<sup>21</sup> 道光 17 年（1837）之「轉典契字」中，徐成將原典自上港烏義之園典與陳海，地點在番社後北勢；而同年社腳庄陳埤亦將買自愛箸典之山園賣與陳海，地點在社腳庄。陳海所買之地在社腳庄，而社腳庄一帶為南大肚社所屬地，另典自徐成之園在番社後北勢，故筆者推論此番社所指應為南大肚社，上港烏義極有可能為南大肚社人，且與道光 3 年（1823）公議同立合約字中之上港烏義應為同一人。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8、39。

<sup>22</sup> 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20。

<sup>23</sup> 道光 14 年（1834）有大肚中社烏鴉九、阿百字九與漢人陳養訂立「典大租契字」，與道光 3 年（1823）公議同立合約字中之烏鴉九應為同一人。參閱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32。

<sup>24</sup> 嘉慶 17 年（1812）大肚北社烏肉牛罵與漢人郭理所立之典契，記載保記為大肚中社土目愛箸武澤，與上引道光 3 年（1823）公議同立合約字中之土目愛箸武澤應為同一人。此外，在道光 3 年分墾蛤美蘭圖分名次總簿中也有記載愛箸武澤為中大肚社人。參閱劉澤民編著，《大

由上述社群與社人間的聯結來看，顯示出北、中、南大肚三社與水裡社入埔開墾的聯結關係，是依循原有「大肚四社」內部之社群互動而行，即中、北大肚社之聯結與南大肚社、水裡社之聯結（參見第三章的討論）。以下將再徵引其他相關文獻，對上述之初步推論做進一步的探討。

在道光 4 年（1824）蛤美蘭社番<sup>25</sup>所立 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 中，記載蛤美蘭社因郭百年事件的影響，社番死傷過半，<sup>26</sup>又再遭北來兇番的侵擾，難以安居，因而透過思毛丹社的中介，引進西部地區的平埔諸社來開墾，希望使兇番與漢人不致再來侵擾，得以保安居住。契字中之平埔諸社群記載如下：

平埔打里摺北投社羅打朗、宜帽八；萬斗六社田成發、李加、蚋岸西；  
阿里史社潘禮、阿四老六萬；南北大肚社郭球、愛箸武澤（底線筆者所加），打里摺等。.....<sup>27</sup>

上引契字中出現的南北大肚社郭球與愛箸武澤，其中郭球為南大肚社人，<sup>28</sup>愛箸武澤應與上述道光 3 年 公議同立合約字 之大肚中社土目愛箸武澤為同一人。由此看來，此契字中雖只載明南北大肚社，未見中大肚社，然實際上有中大肚社人涉入在內，故可將之視為南、北、中大肚三社的共同行動。

在道光 8 年（1828）有蛤美蘭社番土目阿密等所立 望安招墾永耕字，與上一件地契相同，仍為招徠西部平埔眾社入墾，以資防衛安居。契字內記載之平埔諸社為：

---

肚社古文書》，古文書編號 19；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59。

<sup>25</sup> 鍾幼蘭認為蛤美蘭社與埔里社為同一社，埔里社是漢人的稱呼，蛤美蘭社則是土著的稱呼。

參閱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頁 106。

<sup>26</sup> 郭百年事件為嘉慶年間漢人大規模的侵墾行動，由於漢人的大肆焚殺，使得埔里社人口大減。對郭百年事件的記述參閱姚瑩，《東槎紀略》，埔里社記略；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131-140；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頁 110-113。

<sup>27</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43-45。

<sup>28</sup> 在 分墾蛤美蘭蘭分名次總簿 有載明郭球為南大肚社人；此外，劉澤民認為郭球可能為南水二社通事轆仔球改用漢姓之故。參閱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58；劉澤民編著，《大肚社古文書》，頁 85。

平埔打里摺北投社巫春榮、余八；南投社吳清；柴坑社陳港、連順；萬斗六社李得思、潘灶生；岸西社潘集禮；阿里史社潘光明；朴仔籬社阿四老、阿新馬下六；日北社陳六關；烏牛欄社潘阿佳；南北大肚社戴烏蚋、蒲氏上港（底線筆者所加）；東柴裡社王阿丹、歐江河；阿束社陳海、林全全眾番親等奉送禮物。.....<sup>29</sup>

南北大肚社戴烏蚋、蒲氏上港為何社人？契字中並未言明，然若再與同年北投等社所立之「承管埔地合同約字」中記載之人名相互對照，可得出答案。此地契記載北投等社入墾蛤美蘭社所管埔地後，劃定各社分墾之地的情形，契字內容摘錄如下：

立合約字承管埔地北投社番巫春榮、余八、陳太監、金瑞玉、羅打朗、淡三申、潘阿旦、巫天來、.....大肚社戴烏蚋、蒲氏上港、愛箸蛤肉、羅愛箸、高元（底線筆者所加）；.....今我平埔番等齊集，社眾相商議將此蛤美蘭社番親所立永耕字內，踏出界管埔地以內，作拾大份均分，.....而南北中大肚社、貓霧揀社、水裡社戴烏蚋，以及眾番等共分得壹大份（底線筆者所加），其埔地壹段在史老榻，拈定伍鬮，東至山腳，西至大車路橫溝，南與阿束份毗連，北與東柴裡份毗連為界，又壹段在北大埔，拈定玖鬮，東至南投份毗連，西至公地毗連至橫車路，北至溪為界。.....<sup>30</sup>

道光捌年拾月

日立合同約字承管埔地

南大肚愛箸蛤肉

北大肚羅愛箸

中大肚蒲氏上港

水裡社戴烏蚋

<sup>29</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46-48。

<sup>30</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49-53。

貓霧揀高元（底線筆者所加）.....

將上引契字與前述 望安招墾永耕字 相互對照，可知戴烏蚶為水裡社人，蒲氏上港為中大肚社人，此顯示 望安招墾永耕字 內記載之南北大肚社雖未言明包括有水裡社與中大肚社，然就人名觀之，兩社其實包括在內；換言之，水裡社與大肚北、中、南三社人共同參與道光 8 年的入墾行動。

再回到上引之 承管埔地合同約字，契字中記載大肚社內有愛箸蛤肉（南大肚社人）、羅愛箸（北大肚社人）、蒲氏上港（中大肚社人）、戴烏蚶（水裡社人）、高元（貓霧揀社人）等人名，顯示出大肚社為一集稱，包括北、中、南大肚社、貓霧揀社與水裡社。五社除合稱大肚社，並共同闢分土地，五社人共享壹大份之埔地。另在 分墾蛤美蘭闢分名次總簿（以下簡稱 總簿）中可更清楚看到上述的現象，總簿 中紀錄道光 3 年平埔眾社群入墾蛤美蘭埔地，各社首次土地分割的情況。各社將所分墾地分成四大份，其內容如下：

壹闢萬斗六 內分貓兒干、阿束等社

貳闢大肚 內分貓霧揀、南大肚、北大肚、中大肚、水裡等社（底線筆者所加）

參闢阿里史 內分岸裡、日北、卜仔籬、西勢尾、烏牛欄等社

肆闢北投 內分南投、柴坑仔、眉裡等社

以上定作四大闢粘定埔地.....<sup>31</sup>

而大肚等社所闢分之地，總簿 中記載如下：

今開大肚五社頭拈定第貳闢之四至及各社頭應分埔地若干（底線筆者所），東至守成份車路為界，西至溪界，南至與萬斗六份毗連；中定車路二丈為界，北至與阿里史份毗連；中亦定車路二丈為界，又將此壹大份之埔地，再作五社頭利分 於後（底線筆者所加）。

壹闢貓霧揀蒲氏政、高光湖、貓興、貓鞭，貓霧揀一社共分埔地壹拾份

<sup>31</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56。

貳鬮南大肚烏肉武厘、高阿六、高阿甲、郭球，南大肚一社共分埔地貳拾柒份

參鬮北大肚愛箸蒲旦、福僕、愛箸全、阿六 鉞，北大肚一社共分埔地捌份

肆鬮中大肚姚漢泰、愛箸武澤、蒲氏上港、阿眉揀，中大肚一社共分埔地玖份

伍鬮水裡洪元、大宇荖仔、阿甲得、戴烏蚋，水裡一社共分埔地壹拾壹份。以上伍社頭刊分作陸拾伍份，每社應分之額開錄分明（底線筆者所加），各鬮各掌不許混爭批明照。再批明五社頭所列之名次係立頭人在內，餘各社眾番難以盡登，後來不得藉有名有份；無名無份之生端致傷和氣，顯係公共之業是又批炤。<sup>32</sup>

上引契字出現有「大肚五社」之稱呼，五社共同分得埔地壹大份，並將此「公共之業」再分成六十五小份，似乎是每人得一份，只是契字中未將眾番人名盡數登錄。由此可見，貓霧揀、南大肚、北大肚、中大肚、水裡等五社人是以「大肚五社」之合稱，共同鬮分埔地開墾。<sup>33</sup>將之與前述道光 8 年之 承管埔地合同約

<sup>32</sup>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 58-59。

<sup>33</sup> 總簿 中陸續記載了道光 3 年後之土地分割情形，筆者將之列表如下，下表引自鍾幼蘭 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 一文（頁 188），其為整理自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一書（頁 82-83）：

年代	分割部分	分割社名
道光 5 年（1825）	覆盆金東部五索份埔地，以北投社居多，其餘所得無多	北投、史社（阿里史）南投、柴裡、日北、萬斗六、大肚、西勢尾、柴坑、阿束、水裡、東螺
道光 7 年（1827）	由四大份撥出柚仔林之地讓與東螺社（包括阿束社一份），共 81 份	四大份疑為萬斗六、大肚、阿里史、北投等四大鬮
道光 11 年（1831）	覆盆金東部四索份埔地，每年需繳租粟五斗，以為關帝爺祝壽之費	阿里史、北投、阿束、柴坑、大肚、柴里、貓裡、東螺、水裡、朴、貓兒干、萬斗六、日北
道光 11 年（1831）	史老塌埔地	北投、萬斗六、貓兒干、阿束、大肚、東柴里、阿里史、南投、草地主玖大股

上引表格可看出「大肚社」一直參與土地的分割，由道光 3 年鬮分四大份，到 11 年鬮分九大份，似乎顯現參與分割的社群增多，故土地分割越精細。契字中雖未列出「大肚社」內是否附

字 中記載相互對照 - - 「南北中大肚社、貓霧揀社、水裡社戴烏蚋，以及眾番等共分得壹大份」之埔地，可見五社確是合為一單位，集體共同入墾埔里，且鬮分埔地。

綜合上述的討論，拍瀑拉地域內之平埔諸社中，大肚北、中、南三社與水裡社聯結東鄰貓霧揀社以「大肚五社」之集稱，於道光年間共同參與入墾埔里，且共同鬮分埔地；並在其地聚居，形成大肚城庄、水裡城庄與生番空庄。而大肚三社與水裡社、貓霧揀社入埔之聯結，是依循原有之互動整合關係，顯示社群間原有之互動聯結，成為各社人日後在行動選擇時（入墾埔里）的一種參考或遵循的機制。另外，也讓筆者思考到在討論平埔諸社入埔的聯結關係上，除考慮到屯地的配置外，<sup>34</sup>原有社群關係亦為一重要之機制，有可能某些社群之聯結為相同屯地的影響，有些則受原有社群關係的影響。<sup>35</sup>

---

有中、北、南大肚三社、水裡社與貓霧揀社，然 總簿 道光 11 年之土地分割中，大肚社分得一大股，地點在史老壩埔地；對照道光 8 年 承管埔地合同約字 記載北、中、南大肚三社、水裡社、貓霧揀社所分得之埔地壹段也在史老壩，似乎顯示道光 11 年「大肚社」此一稱呼，其實包括了上述五社。

<sup>34</sup> 多位學者認為由於番屯之編組，影響了道光年間中部平埔諸社遷移埔里之聯結，亦即養贍地的配置使不同族社間得以有更緊密之聯結，使得在入埔的行動上，能彼此合作。例如鍾幼蘭對埔里盆地開發之研究中，認為共同的屯地促進番社間的交流互動，使得分居不同地方的平埔族群能串聯起來遷入埔里盆地。溫振華也認為各社屯丁之養贍地相連，使得入埔的族社得以有更頻繁密切的聯結，在入埔的行動上能彼此合作。張素玢與洪麗完亦同樣指出番屯制的設計，使得不同族社有機會處在相同的屯地，促成各社群之聯繫與互相瞭解，日後分居不同地方的族社或因此才能串連起來，一起計劃往墾埔里。參閱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關於開發問題的探討，頁 116；溫振華，清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分析，《臺灣文獻》51 卷 2 期（2000），頁 33；張素玢，平埔族群空間地圖的重構與解釋：以東螺社與眉裡社為中心，頁 25；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史研究》4 卷 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75；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21。

<sup>35</sup> 下表為乾隆 53 年（1788）拍瀑拉各社番屯之編組與養贍埔地之配置：

屯名	社名及屯丁人數	養贍埔地及甲數
北投社小屯	北投社 128 名	本社內木柵埔地 128 甲
	南投社 23 名	本社虎仔坑埔地 23 甲 5 分 2 釐
	貓羅社 45 名	本社葛斗六埔地 45 甲
	柴坑社 33 名	水底寮*埔地 33 甲

### 第三節、小結

本章首先分析拍瀑拉各社是否遷徙的問題，以道光年間的入墾埔里為例，顯示水裡、大肚二社因社地流失嚴重的情形下，生計日蹙，故多數人參與入墾埔里，雖應有少數人留居原地，然在土地幾流失殆盡下，清末可收租土地已所剩無幾。反觀沙轆、牛罵二社因土地杜賣流失情形較不嚴重，較能保有地權以維持生計，故毋須大舉外遷，迄清末留居原地之社人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租。

接著再分析本區水裡、大肚二社入墾埔里之聯結關係，所得之觀察為：大肚三社與水裡社之入埔聯結明顯是依循原有之社群互動整合關係，且聯結東鄰貓霧揀社，以「大肚五社」之集稱，共同入埔，鬮分土地。由入埔的聯結關係也顯示社群間歷史上互動往來所生成之關係（或說一種規則與約束），會成為日後人們在行動選擇時的一種遵循機制與限制，或說參考的機制。

阿里史小屯	大肚北社 31 名	水底寮埔地 31 甲
	大肚南社 31 名	水底寮埔地 31 甲
	貓霧揀西社 10 名*	水底寮埔地 10 甲
	阿里史社 119 名	水底寮埔地 119 甲
	水裡社 26 名	水底寮埔地 26 甲
	遷善南社 30 名	水底寮埔地 30 甲
	遷善北社 14 名	水底寮埔地 14 甲
	感恩社 27 名	水底寮埔地 27 甲
	烏牛欄社 32 名	水底寮埔地 32 甲
	大肚中社 47 名	大姑婆寮**埔地 47 甲

資料來源：《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044。

由上表屯地配置可看出，獨大肚中社分得大姑婆寮（今臺中市西屯區大石、大河二里）埔地，不與大肚北、南、水裡等社水底寮埔地（今臺中縣新社鄉東興、中和、福興、慶西等村）相同，不過在入埔的行動上，並不影響其與其他社間的聯結。或許，養贍埔地的共享，並非決定入埔聯結的唯一關鍵，可能尚須審視社群原有之互動關係。不過，上述的觀點仍待更多經驗證據的探討，方能更加釐清，或許當針對各個社群與不同地域做逐一之檢視與探討，會有不同的現象產生。對清代番屯制之研究，可參閱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臺灣文獻》27 卷 2 期、3 期（1976），頁 111-130、59-87。

## 第七章、結論

### 一、論文的回顧

在本論文中，首先簡介清代拍瀑拉地域的自然景觀，接著對拍瀑拉各社社址與社域範圍做一劃分與釐定。在自然景觀的部分，主要描述清代拍瀑拉地域之地形與呈現之自然景觀。在漢人未入墾前，大肚臺地為拍瀑拉人之獵場，平原區為游耕農業地帶，臺地西麓之斷層湧泉帶，則為拍瀑拉人聚落分布所在。對社址與社域範圍的考定，主要是透過各社之契約文書來考定社址位置與社域範圍，發現拍瀑拉各社間的社地常是交錯共有的，尤其在兩社相鄰的情況下，有些地目無法清楚劃分其社群歸屬，而這些社群間之共有地，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社群間的聯結；換言之，社群間的共有地可能隱含了社群互動關係的因子，故對各社社址與社域範圍的釐定，為進一步討論社群間互動關係之基礎。

第三章中，即開始探討拍瀑拉地域內的社群互動整合關係。首先以社餉徵收與番社職位設置為切入點，顯現出水裡與大肚二社間之互動聯結（又可區分中大肚社、北大肚社與南大肚社、水裡社兩互動群體），沙轆與牛罵二社間之互動聯結。再以上述觀察為基礎，進一步藉由契約文書，來分析四社間的互動關係，所得出的社群關係劃分為：（1）中大肚社與北大肚社（2）南大肚社與水裡社（3）水裡社、大肚社與貓霧揀社（4）沙轆社與牛罵社（5）沙轆社與水裡社。而透過對拍瀑拉地域內社群關係的討論，可得出三項結論：（1）社群間的互動可跨越社群、語族間的界線，以及官方的編制（通事／土目制）（2）社群間在地緣接近，或社地共有交集的情況下較會發生經濟或人際的互動關係（3）其互動形式常表現在各社人際間的土地買賣行為，或涉入到彼此的土地契約中，以及有通婚的現象產生。

第四章中，則分別討論拍瀑拉四社地域內漢人的拓墾，重點在分析漢人的拓



墾路線與進程。就漢人拓墾年代觀之，本區雖在康熙年間已有漢人入墾之紀錄（大肚、沙轆），但呈現的是零星少數的點狀式開墾，要直到雍正、乾隆年以後漢人才大規模且全面性的拓墾拍瀑拉各社地域。另就拓墾土地範圍來看，斷層帶附近土地常為漢人首墾並聚居之處，以之為中心，陸續向平原區、臺地區拓墾。而各社平原區的土地乾隆年間大多已全面墾成，臺地區的拓墾相對而言則較晚。

接著，分析漢人在各社地域的拓墾類型與方式，得出地域內部之差異性：漢人拓墾初期在水裡、大肚兩地域主要採業戶制的方式，由墾戶向官方取得墾照後，以設置墾區莊的形式招佃開墾。雖業戶制為主要開墾方式，然亦有少數的土地係採墾佃直接向番社或社番承墾的自墾制。而牛罵、沙轆兩地主要採自墾制的方式，由漢人向番社或社番承墾土地。而無論是向漢業戶或番社／社番承墾之墾佃，在墾拓之初便常取得永佃權，如此，業戶對土地支配的權利逐漸減少，只保留收租權（田面權），實際上的土地支配使用權（田底權）日久便操控在佃戶手中，逐漸形成「一田二主」的地權結構。

而漢人的大規模拓墾，也導致地域內之拍瀑拉各社土地權利逐漸流失，在第五章中，即對此一土地流失問題做探討。所獲致的現象為：大肚、水裡二社土地在乾隆、嘉慶年間已開始陸續典讓、杜賣給漢人，有清一代，二社土地已多數流失至漢人手中；而沙轆、牛罵二社則較少見杜賣、典讓土地的情形，且土地流失的範圍亦不大。文中將此現象與漢人的拓墾類型與方式做一關聯，認為漢人拓墾初期，大肚、水裡二社在業戶制（墾區莊）的運作方式下，大片土地已過戶給漢人請墾陞科，同時期沙轆、牛罵二社則在自墾制的方式下，似乎較有助於保有土地之收租權，土地權益未全面流失至漢人手中。

在第六章中，則對土地流失所導致的番社遷徙問題做探討，以道光年間的入墾埔里為例顯示水裡、大肚二社因社地流失嚴重的情形下，生計日蹙，故多數人參與入墾埔里，雖應有少數人留居原地，然在土地幾流失殆盡下，清末可收租土地已所剩無多。反觀沙轆、牛罵二社因土地杜賣流失情形較不嚴重，故較能保有地權以維持生計，毋須大舉外遷，迄清末留居原地之社人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

租。

接著，再分析本區水裡、大肚二社入墾埔里之聯結關係，所得之觀察為：大肚三社與水裡社之入埔聯結明顯是依循原有之社群互動整合關係，且聯結東鄰貓霧揀社，以「大肚五社」之集稱，共同入埔，鬪分土地。由入埔的聯結關係也顯示社群間歷史上互動往來所生成之關係（或說一種規則與約束），會成為日後人們在行動選擇時的一種遵循機制與限制，或說參考的機制。

## 二、地域內部的差異性

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得出拍瀑拉地域內四大社群間的互動聯結關係，這也影響了日後入墾埔里的行動聯結。此外，得出不同社群地域拓墾方式的差異，因此導致各社土地流失方式與速率的不同，而土地流失現象的差異也部份說明了各社的是否入墾埔里。

由本研究所得之觀察，顯示出拍瀑拉地域雖在自然環境與語族劃分上具有相當的均質齊一性，然在許多層面的探討上，卻呈現出內部社群／空間的差異性。而同一語族、地域內部的差異現象，也讓筆者思考到對臺灣歷史之研究，或許有時須拋開一體同步發展之預設或視角（或說建構某種一體適用之歷史法則），當投射到不同區域、不同人群時，常顯現出多面向之歷史發展過程與特色。<sup>1</sup>

---

<sup>1</sup> 施添福即認為在建構臺灣歷史地理的理論或概念體系上，必須面對來自區域差異的挑戰，以及將歷史現象的空間侷限性（底線筆者所加）正式納入考量，使成為理論的一部份。他提出「地域社會」一詞，強調臺灣歷史地理的區域差異性。參閱施添福，自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7。

### 三、更多問題的提出

本研究容或對清代拍瀑拉社群的研究有一些新的觀察與想法出現，然文中必也有一些疏漏不足，或可再修正討論之處。在研究過程中當然免不了摻雜研究者主觀的選取與判斷在內，文中或許只注意或突顯某些面向與觀點，而有意無意間的忽略到某些面向，因此，尚祈日後更多研究者的指正。另外，由本文的討論，也引發筆者思考一些值得日後再進一步探究之問題。首先對於拍瀑拉各社群社址與社域範圍之討論，筆者認為有一待解決之課題，亦即社址之遷徙與變動的問題。拍瀑拉各社群在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的大量拓墾後，壓縮其生活空間，社地也逐漸轉賣至漢人名下，在此情況下，是否導致社址之遷移與變動？以及各社群之社域空間變動為何？是否遭壓縮？對於拍瀑拉社群社址之遷徙問題，目前只有洪麗完對牛罵社址之遷移作了探討，其餘則無。<sup>2</sup>因此，此一問題有待日後進一步之探討。另外，在釐定各社社址與社域範圍時，有的社群社址位置（水裡社、中大肚社、北大肚社）因無足夠之契約文書佐證，只能援引考古資料作推論。因此，需更多契約文書資料出現，方能更確切的釐定出社址位置。

而在社群關係的部分，文中認為在地緣接近且有共有地的情況下，較會產生社群間的互動，因此水裡社、大肚社與東鄰貓霧揀會產生互動關係。若順此觀點，拍瀑拉諸社群與東鄰之岸裡社在歷史上應也會有互動關係？<sup>3</sup>以及北鄰大甲東、西社？<sup>4</sup>南鄰半線社之互動關係？<sup>5</sup>或許透過再進一步的擴大比較分析，能對清代平埔族社群關係有更全貌的理解。

另外，若引入人文地理學中功能區（functional region）的概念：相鄰近的地區

<sup>2</sup> 洪麗完，〈牛罵頭地域之歷史與族群(1600-1900)：以牛罵社為中心〉，頁 17-18。

<sup>3</sup> 牛罵社曾參與嘉慶年間由岸裡社潘賢文所率領入墾噶瑪蘭之行動，顯示兩社間是否有某種互動關係？

<sup>4</sup> 牛罵、沙轆、水裡、大肚諸社都曾參與雍正 9、10 年之「大甲西社事件」。

<sup>5</sup> 康熙年間到乾隆初年大肚社一直與半線社合併為一稅收單位，合稱「半線大肚社」，其中並附柴坑仔社與水裡社。於乾隆初年以後，兩社始分開徵收社餉。

藉由經濟與政治資源的互補性而聯結，即透過組成部分的日常互動形成一功能區，強調的是地區間的互補性（complementarity）與互動（interactions）。<sup>6</sup>將此概念對照拍瀑拉地域內之社群關係，內部可因地緣相近與互動關係之別，區分不同之社群互動群體，然社群互動群體間之互動生成原因為何？是否存在有經濟資源或政治方面的互補或互相依存？而在此地域內是否有某一統合機制（政治、經濟、社會）？筆者認為此一切入點，為一值得再深入探究之問題。

另外，由第六章之討論，顯示出水裡、大肚二社人因土地流失嚴重，多數遷徙埔里，而沙轆、牛罵二社迄清末卻仍有多筆土地可收取番大租的現象，且相關資料亦未見遷徙埔里的記載。不過水裡、大肚人埔的人數是否佔全社之大多數？而清末留原地者人數又是多少？沙轆、牛罵二社留居原地者又是多少？解答上述之問題，須再翻查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資料，以及更多實地的田野調查，方能補足清代文獻之不足。

本研究各章節的分析，主要運用契約文書來分析各種面向，然翁佳音卻提醒「研究者在引用歷史文獻時，往往忽略文獻背後的意義，以及疏於把文獻放在時代脈落中來應用。研究者在利用民間的舊契約文書時，也是如此」。<sup>7</sup>換言之，翁佳音提醒研究者注意到契約文書的解讀，須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時空脈落，不能逕以字句上的涵義做直接的解讀。這讓筆者思考到本研究在契約文書的分析與使用上，恐有不足與疏失之處，而一時的研究發現，可能只是一個開頭，不代表本研究的終結，翁佳音的看法，也提醒筆者日後可再做修正與探討的方向。

上述種種問題的提出，或許會讓人覺得本研究仍有許多未竟之功與疑惑待解（這也是筆者最後想要說明的），不過，問題的提出，常能藉此呈現出另一種的

---

<sup>6</sup> 筆者此段文字引自 Kären Wigen 對功能區之定義，原文如下：In the present context, the essential task is to identify a functional (or nodal) region: a contiguous area united by a complementarit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integrated through the routine interactions among its constituent parts. (底線筆者所加)。另參見第一章中註 10 對功能區的定義。參閱 Kären Wigen, *The Making of Japanese Periphery, 1750-1920*, pp.16.

<sup>7</sup> 翁佳音，《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2001），頁 11-12。

思考方向，與新的切入觀點，學術研究便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累積與向前。總之，清代的平埔研究應仍有許多值得再努力與待發掘之研究面向，在研究的過程中，一時的結論有時又導引出新的問題，總會有新的疑問一個接一個的出現，驅使研究者不斷探索向前，而這應該也是歷史研究的樂趣所在。